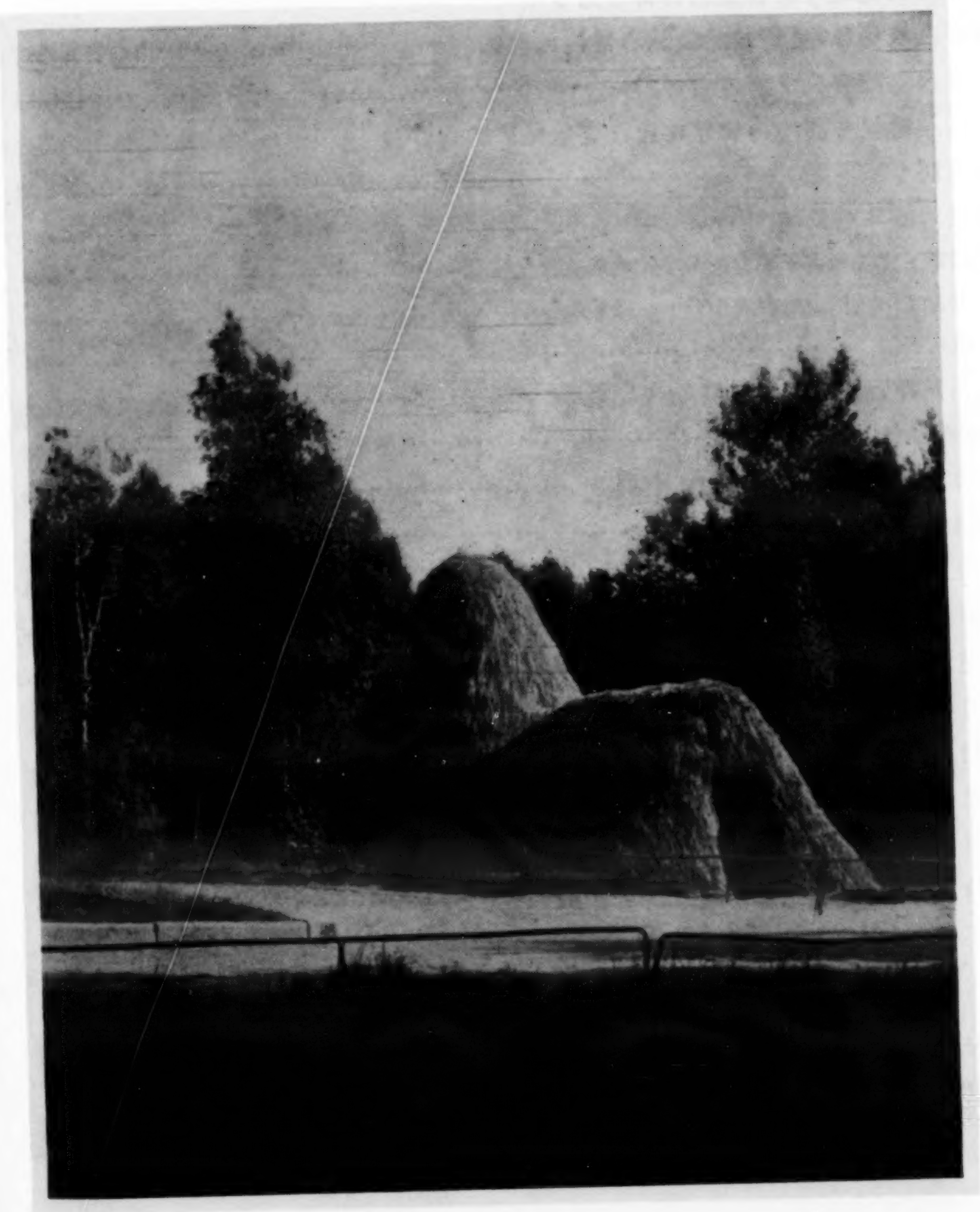
文物参攷资料

一九五七年　第十一期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FAR EASTERN LIBRARY

目　录

一九五七年第十一期　(总第八七号)

要善于和虛心地学習苏联先进經驗……王冶秋　(11)
学習苏联使文物事業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陈　生　(13)
更好更多地接受苏联的經驗和帮助……韓寿萱　(15)
学習苏联先进經驗發展我国博物館事業……博　集　(17)
学習苏联經驗，更好地組織地志博物館的陈列……山东省博物館　(19)
苏联出土的有关中国考古材料……佟柱臣　(22)
苏維埃政权初期的博物館建設与文物保护工作(一)……苏联B. K. 格尔达諾夫　(28)
向苏联专家学習……新　星　(34)

在反右派斗爭战綫上

揭穿了冒牌考古学家右派分子韓維周的反党陰謀……(35)
考古工作队伍中的右派小丑——吳銘生……(36)
讀者来信……(37)
苏州虎邱云岩寺塔發現文物內容簡报……苏州市文物保管委員会　(38)
“檀龕宝相”……顧公碩　(46)
在云南考古工作中得到的几点認識……孙太初　(47)
黃鶴楼……孙宗文　(49)
莆田元妙观三清殿調查記……林　釗　(52)
韓城县所見的元代建筑及其基本特征……何修齡　(54)
黑龙江省的几处文物遺迹……王震中　沙振宇　丹化沙　(59)
江苏文物古迹調查散記……朱　江　(61)
河南上蔡出土的一批銅器……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　(66)
通江县的摩岩造象……陶鳴寬　(70)
訪翠亨村孙中山先生故居……木　日　(72)
文物工作报导(十七則)……(76)

讀者·作者·編者

应該对刊物和讀者負責
作者来信

插頁： 苏联有关列宁的紀念地、遺物及几处博物館

封面： 1917年7—8月列宁在拉兹里夫湖畔避难时居住的刈草場的小草棚

我国博物館、文物工作者
庆祝苏联国庆的賀电

苏联文化部轉

全苏博物館工作者和文物工作者：

兹値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之际，我們——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博物館工作者和文物工作者，謹向你們致以誠摯的祝賀，幷預祝你們的工作在日益繁荣的社会主义文化中取得新的成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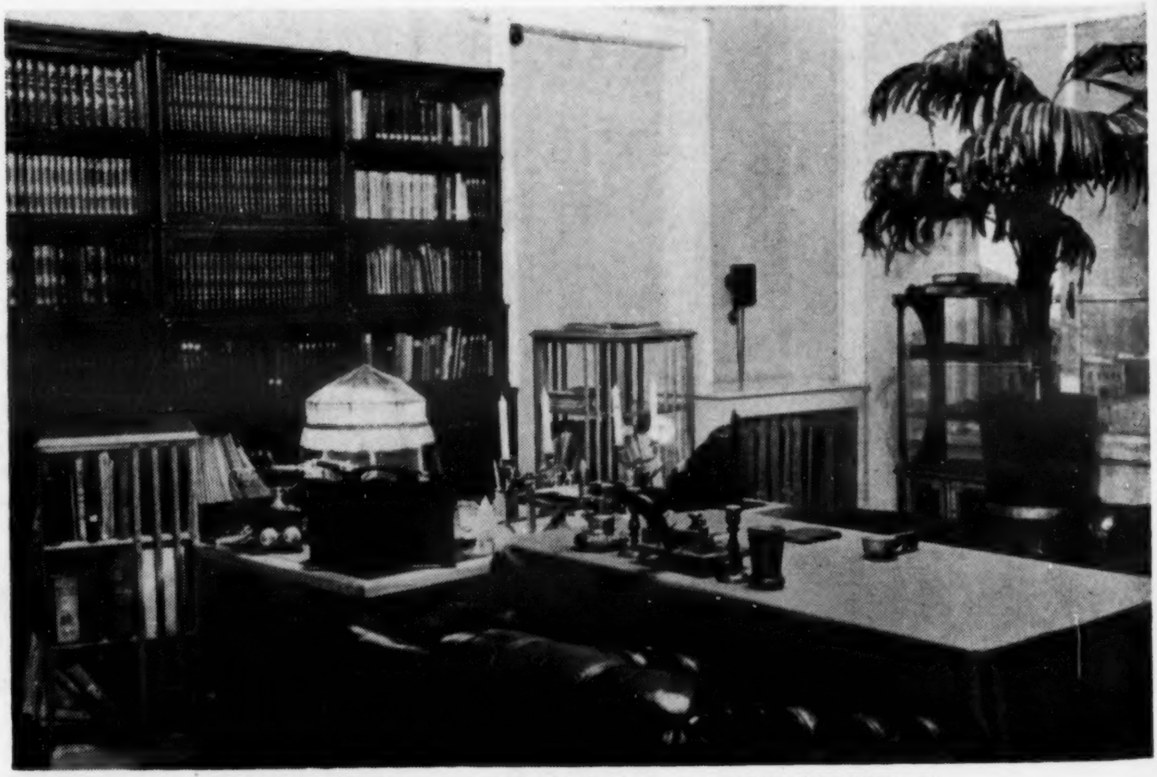
中华人民共和国 博物館工作者
文物工作者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日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IBRARY
FAR EASTERN LIBRARY

МУЗЕЙ В. И. ЛЕНИНА

苏联中央列宁博物館外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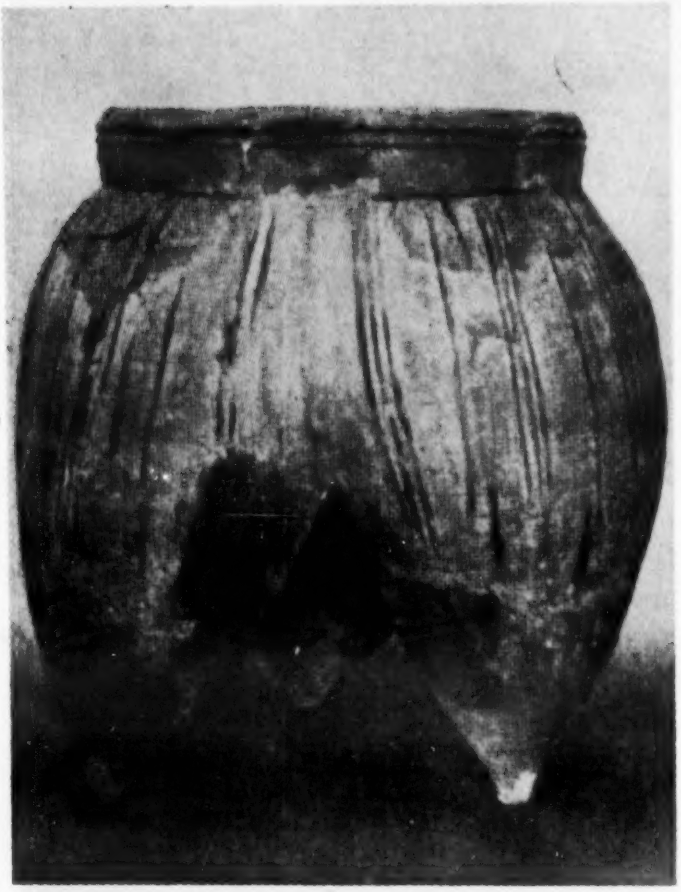


苏联中央列宁博物館按照列宁在克里姆林宮的办公室原狀布置的陈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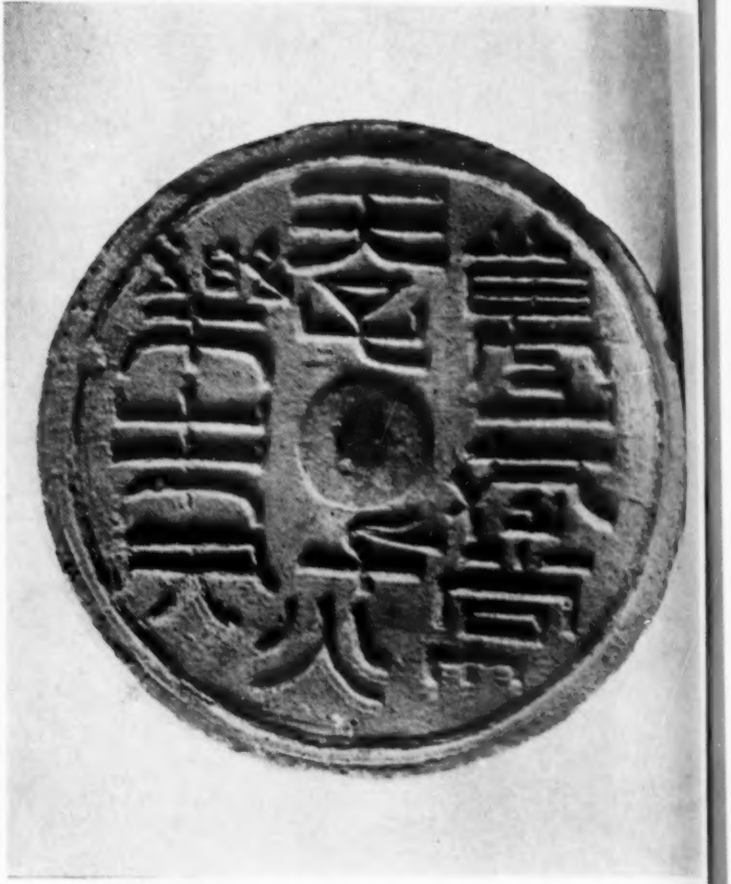
列宁格勒的历史博物館外景

莫斯科的历史博物館內陈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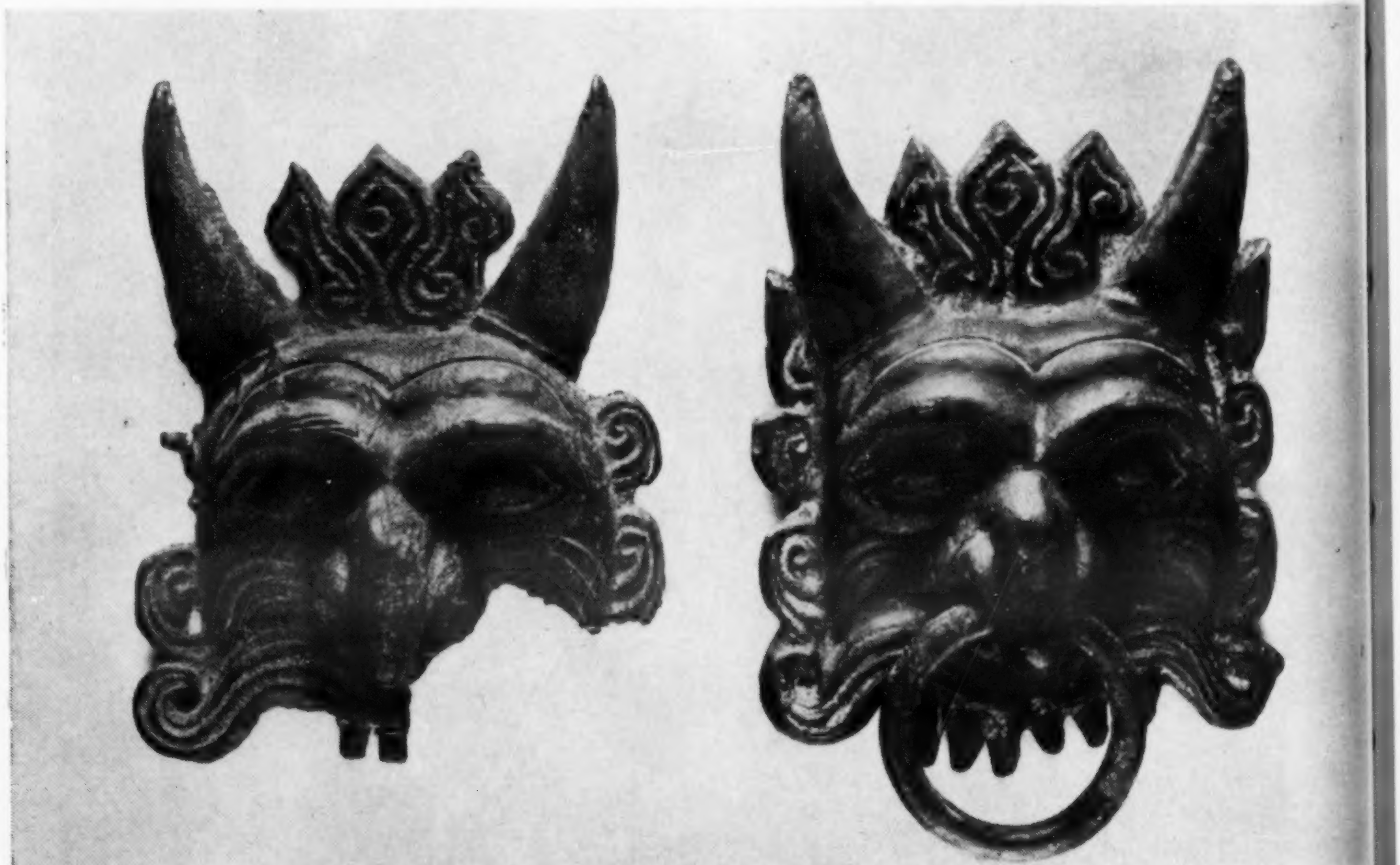
苏联出土的有关中国考古資料 （文見22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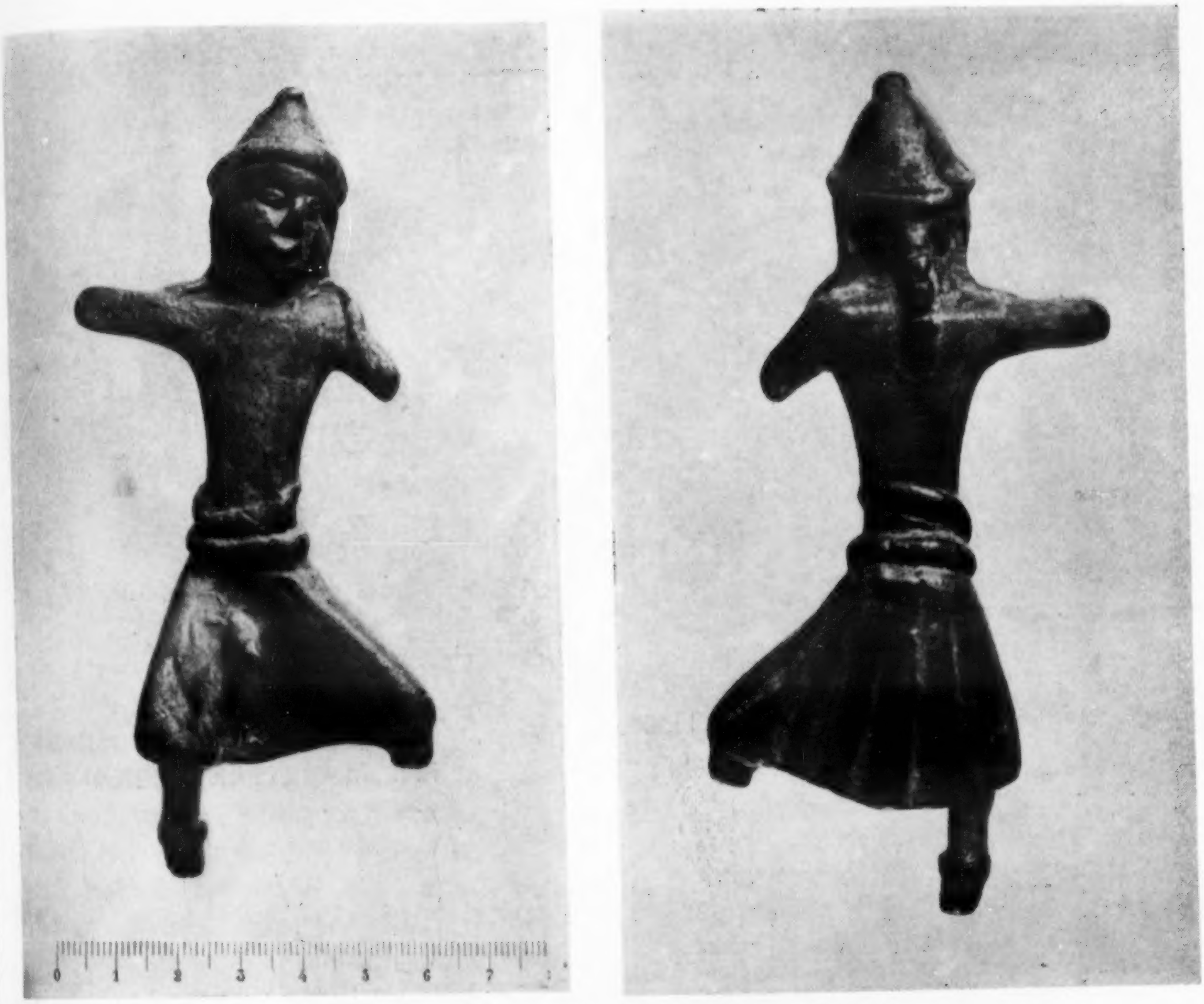
圖一　赤塔亚彥乡出土陶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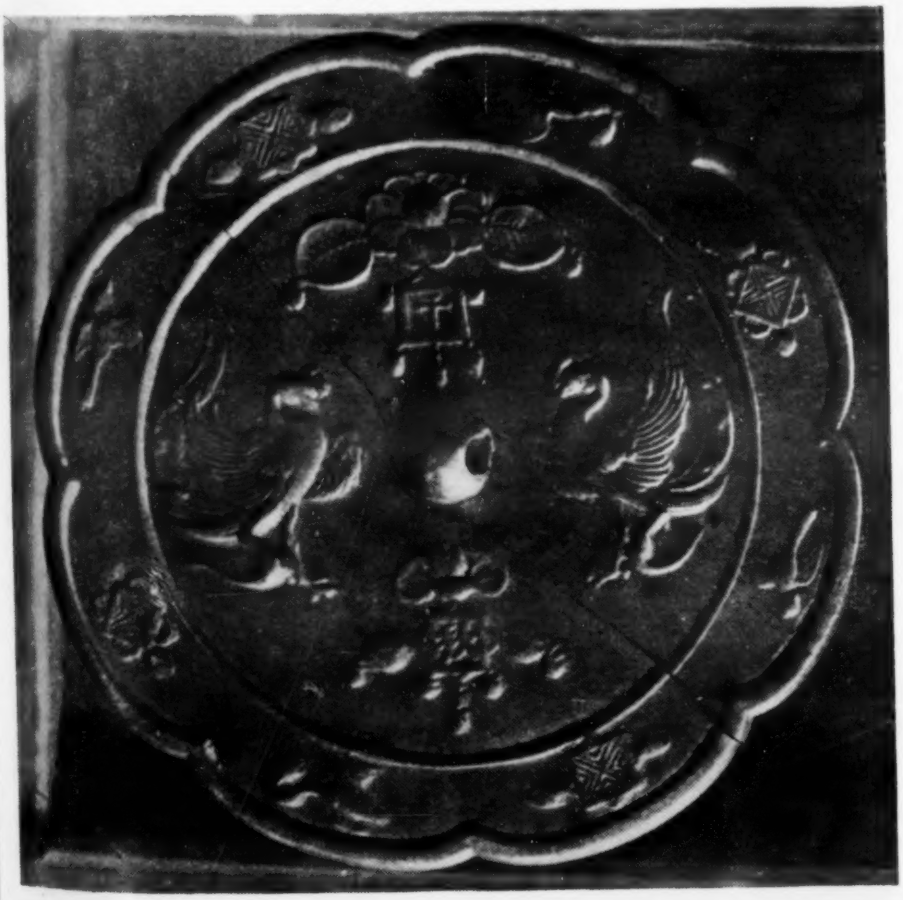
圖二　阿巴干汉代建筑址中出土天子千秋万岁常乐未央圓瓦当正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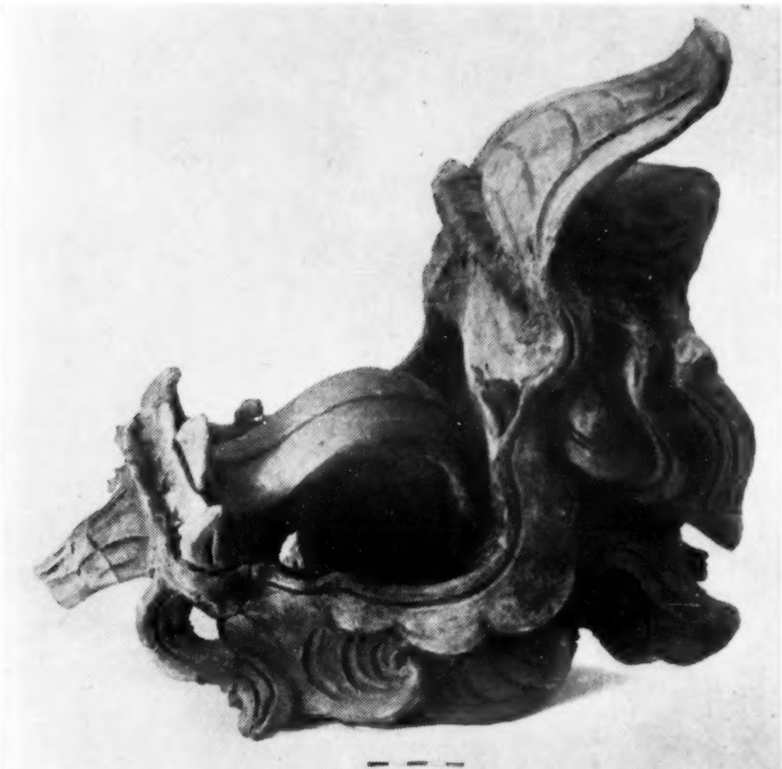
圖三　阿巴干汉代建筑址出土銅鋪首（右为实物，左为另一件模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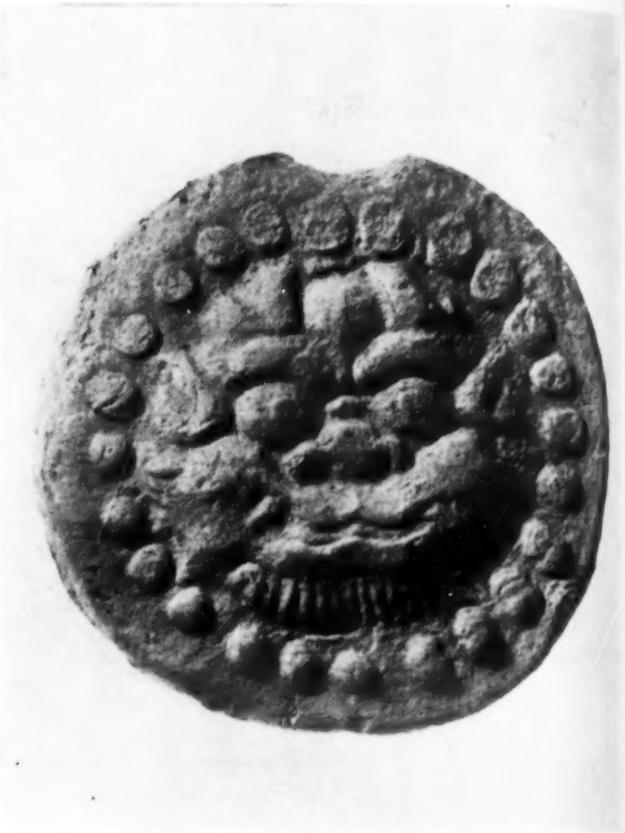
圖四　赫尔松涅斯出土鲜卑族(?)小銅像前面(左)后面(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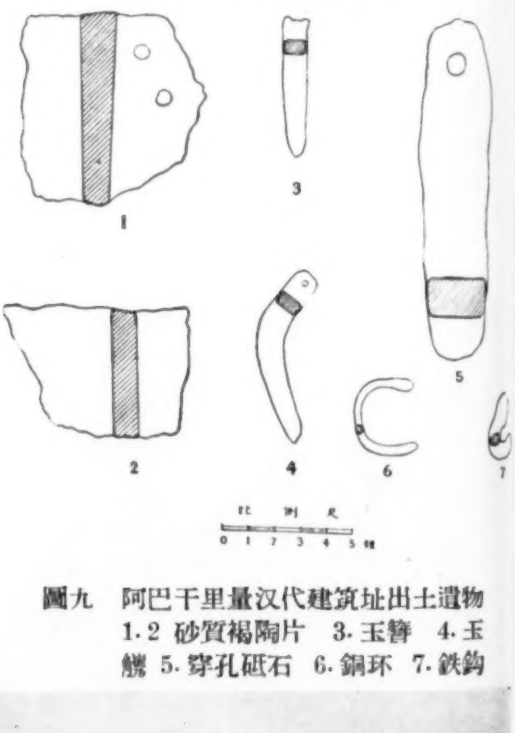
圖五　叶尼塞河右岸舒申斯
克区薩彥村發現唐代
双鸞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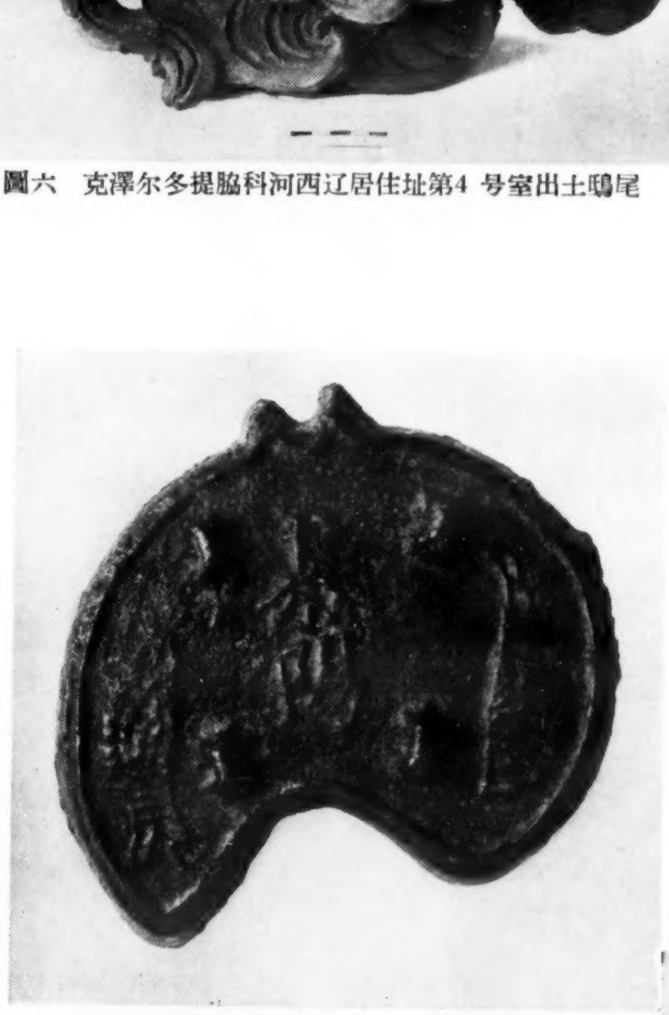
圖六　克澤尔多提脇科河西辽居住址第4 号室出土鴟尾



圖七　第 4 号室出土兽面紋圓瓦当


1
3
5
2
4
6
7
比例尺
0 1 2 3 4 5 糎

圖九　阿巴干里量汉代建筑址出土遺物
1.2 砂質褐陶片　3.玉簪　4.玉觽　5.穿孔砥石　6.銅环　7.鉄鈎



圖八　莫斯科苏联历史博物館
藏元代(或汉代)鉄牌板

圖十　第 2 号室出土宋均窑盘

要善于和虚心地学習苏联先进經驗

王冶秋

一

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詞中說过：“要善于向我們的先进者苏联学習”，又說：“决不应当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在建設上有了一些成績而自高自大。国無論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們的工作得到了極其偉大的成績，也沒有任何值得驕傲自大的理由。虛心使人进步，驕傲使人落后，我們应当永远記住这个眞理”。

这段話一方面告訴我們要善于学習苏联，一方面要虛心的学習。不善于学習，也可能生搬硬套，不能同我們的具体情况相結合；不虛心学習，則是根本学不进去，驕傲自滿，一事無成。

我們的博物館事業、文物事業，在解放前可以說是作为点綴品而存在的。在反动統治时期，虽然我們的博物館工作者、文物工作者是想把这两項事業办好，但是在那种社会是不允許也不可能办好的。——因此，作为接受过去經驗来說，是極为有限的；作为根本的發展方向来說，則是背道而馳的。过去反动統治下的文化事業，是走封建主义、資本主义道路的，是为少数人服务的。甚至就連这也做不到，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成为太上皇，横行霸道，为所欲为，文物大量的被破坏、盗运；博物館半死不活，还有的是帝国主义者直接办的，来奴化中国人民的。

基本的情况是如此，摆在我們面前的是：必須改造，必須学習先进經驗。那么，学習什么样的先进經驗呢？我們所走的道路，是社会主义道路；我們的文化事業，是社会主义的文化事業，不向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学習，向那里学習呢？

苏联在四十年前，在列宁和苏联共产党領导下，把無产阶級革命和無产阶級专政的学說，把科学的社会主义，于一九一七年在俄国的国土上实現了，“由理論和理想变为活生生的現实。”——“这样，一九一七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就不但在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时代，而且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时代。”（見“再論無产阶級专政的历史經驗”）

自十月革命以后，苏联四十年的革命和建設的基本經驗，对于我們来說是極其宝貴的，应当認眞研究和学習的，学習这些（包括某些錯誤和失敗的經驗在內）就可以使我們少走彎路，加速社会主义建設。

苏联的四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設，不仅在經济上获得偉大成就，在文化上也获得了空前的成就。在人类历史上，自从有了阶級社会，从来就是少数人剝削压榨多数人；在文化上也是少数人独占、享受而大多数人变为文盲。苏联的四十年，在經济上把少数人剝削大多数人的不合理制度推翻了；把少数人享受独占的文化变为全民所共有。

也只有在这样的基础和制度的上面，文化才能得到空前的發展。当美帝国主义口口声声叫嚷着社会主义文化落后的时候，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第二顆“人造地球衛星”却由苏联射出，弄得帝国主义者惊慌失措，哑口無言。

在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化事業中，也包括了博物館事業和文物事業的。它在世界上也是最初建立新型博物館和新型的文物保护工作的。——說到我們本行的学習，也是同其他方面一样，要坚决研究和学習苏联的先进經驗。

二

苏联在博物館事業和文物事業中有那些先进的基本的經驗可以使我們学習呢？我曾两次去苏联参观，限于水平和語言文字的阻碍，了解不深，学習不好，我只能談一点粗浅的体会：

（一）苏联的博物館事業、文物事業是以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因此，它具有高度的思想性。

苏联的博物館是作为社会主义文化事業整体中的一部分来举办的，它是在社会主义的軌道上前进的。从决定館的性質、方針、任务、到具体的陈列、保管、群众工作等方面，始終是貫串着馬列主义的思想，它是以辯証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来观察事物，决定問題的，它不是以主观主义、唯心主义来处理問題的。因此，“苏联的博物館和資产阶級的博物館的原則区别就在于：苏联博物館的活动是以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为基础的。这种原則区别也就規定着博物館工作的全部方向。苏联博物館的这个原則区别，在他們的陈列工作中表現更为鮮明。陈列工作开始来解决物品和現象相联系的陈列任务，来解决揭示原因和后果的陈列任务，在陈列中出現了对物品和現象（無論是从靜的方面，或者是从动的方面）加以空間的和时間的闡述。苏联博物館这些新的安排陈列的方式方法不是象从前那样孤立地把博物館藏品展示給参观者，而是在它們相互联

系、相互制約的关系当中来展示給参观者的”。(見“苏联博物館学基础”)

我們看到苏联許多博物館，思想明确，立場堅定，具有充分的說服力，有一定的目的性，它是把客观眞理、事物發展的規律用博物館的語言告訴給广大的观众，而不是罗列文物，罗列現象，胡乱摆出，讓“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苏联的博物館事業所以能眞正成为科学教育机关，其根本就在于此。

（二）苏联的博物館事業和文物事業，是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的，因此它具有高度的科学性。

上述的科学的馬列主义思想貫串在整个事業的活动中，它指导着科学研究。苏联博物館、文物机构中的研究人員是“先紅后专”的，“专”是为“紅”服务的。也必須具有馬列主义的思想，研究才有了“灵魂”，研究才能得到正确的結論。博物館，文物机构收集、保藏、發掘極为广泛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以及自然标本等实物，“这些珍貴的材料常常是研究历史、科学、自然、技术、文学、艺术等部門中極其多样的問題时所使用的特种原始資料。”我們博物館和文物机构要对这些原始資料加以科学的整理研究，然后或以陈列，或以报告等方式，把它介紹給观众和讀者；而不是把“原始資料”端給观众或讀者，或者把这些資料按年代一排，陈列柜中一放就算了事的。——假若是如此，这种博物館不能叫作科学研究机关，它只是一个“古物陈列所”，“文物商店”，或者是“文物倉庫”。

“博物館只能在巨大而深刻的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在無数的社会历史紀念物中和自然历史紀念物中来进行搜集和选擇（这是特别重要的）自己的材料。

“苏联博物館不仅仅是珍貴宝物的儲藏庫。它是进行研究工作的广大場所。在这里，对所搜集来的丰富材料要进行研究和科学加工，因为沒有科学加工是不能为人民的利益从科学上和实际上来利用这些丰富材料的。”(見“苏联博物館学基础”)

我們現在的博物館和文物机构的科学研究工作，可以說剛剛开始，有的还沒有开始。我們許多藏品还缺乏最初的科学紀录、科学鑒定的工作。这第一步的工作不作好，将使我們第二步第三步的工作無法开展。——因此我們必需急起直追。学習苏联先进經驗，来奠定博物館和文物机构的科学基础。

（三）苏联的博物館，是文化教育机构，是人民文化生活中不可少的一个項目，他不同于研究所、圖書館等，它必須使人民易于接受，乐于接受，博物館的艺术設計，是滿足这方面需要的。因此苏联博物館具有高度的艺术性。

它的艺术性，不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不是“形式主义”的；它是为主題陈列服务的，是为加强陈列的感染力而工作的。

苏联博物館的外观常常是朴素大方而并不怎样漂亮的。但它的室內陈列是主題鮮明，气氛調和，把形象的东西更加形象，把眞实的东西更加眞实。我們到了列宁博物館、革命博物館，看到十月革命的部分，就如同置身于十月革命的当时；看到列宁的紀念地点，如拉玆里夫，高尔克村列宁住过的地方，就象是列宁剛剛出去而我們来到这里观看似的。——这种革命的气氛，历史的气氛，生活的气氛，是需要艺术家来完成这个任务的。

“博物館陈列的艺术装飾的任务，便是使观众理解与接受陈列的思想意义。創造性地实現陈列的意圖对于艺术家說来是最主要的一个問題。

“艺术家不能机械地、手工方式地实現陈列計划的任务。他应当創造性地进行建立有充分价値的艺术装飾草案的工作，根据問題的本質并在政治上尖銳地、有党性的帮助展示陈列的內容。

“艺术家应当估計到观众对陈列的理解与接受，以便以自己的专門性手段来帮助他們正确地理解陈列的內容。博物館中的艺术家的任务就是帮助博物館观众在陈列中看出最本質的东西，保証在应有的連續性中进行观察，加强陈列对观众在情緒上的作用，因而才使陈列具有美学的形式。”(見“苏联博物館学基础”)

我們博物館中艺术設計还很差，还停留在“形式主义”的圈子里，还停留在写美术字、摆花盆等方面。这与具有思想性的，为陈列主題服务的艺术設計还有很大的距离。因此，我們也必須学習苏联这方面的經驗。

以上的体会，都很不深刻，只提供参考研究。

总之，苏联十月革命以后，經济建設，文化建設四十年来获得巨大的成就，它給人类指出方向，开辟了前进的正确的道路；她以活生生的事实，証明了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学說；她的富强、繁荣、幸福，給世界善良人类以極大的鼓舞；她的經济建設的飞躍發展，文化、科学技术的高度成就，都証明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最优越的，是最前进的；資本主义、帝国主义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一定要灭亡的。——“人类历史的車輪是按照几何級数加速自己运轉的速度。資本主义的几百年，賽过封建主义几千年。社会主义的几十年又賽过了資本主义的几百年。作为現时代的人与自然之間的关系的特征的，如原子能的普遍利用、星际旅行等等，光荣已經肯定地归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了。历史已經根据自己的規律，安排下今后一个时期內人类相互关系的总的局面：資本主义整个灭亡，共产主义（包括它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統治全世界。两个制度的和平竞賽，結局固然是如此，帝国主义如果一定要打仗，結局將要更快地是如此。”(錢俊瑞：“莫大的光荣”)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五日

学習苏联,使文物事業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

陈　　生

偉大的十月革命把科学的社会主义从理想变为现实，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整个人类历史开辟了一个嶄新的时代。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正是十月革命胜利的繼續。当我們怀着無比兴奮的心情来迎接和祝賀偉大的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时候，不仅应該把苏联人民的胜利当作自己的胜利而欢欣鼓舞，衷心地感謝苏联在我們革命斗爭和国家建設过程中所給予我們的無私援助，而更重要的是，我应該如何認真地学習苏联丰富的各种建設經驗，結合具体情况将这些經驗运用于我們的建設中，从而推动我們的事業前进更前进，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列宁說过："把注意力集中到还没有完成的革命任务上，——这是庆祝偉大革命紀念日的最好办法。"

学習苏联是我們党和政府堅定不移的方針。事实証明，建国八年来，我們各方面所取得的每一項成就都是和学習苏联分不开的。博物館和文物工作亦自不能例外。但是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利用党的整風机会，向党进行猖狂进攻的手段之一就是誣蔑苏联。在我們文物事業范圍內的右派分子和部分具有濃厚資产阶級思想的人，也在这方面發出了不少謬論。他們認为："学習苏联就是教条主义。""八年来博物館事業学習苏联学錯了。""学習苏联主要是經济建設方面，博物館和文物工作沒有甚么可以向苏联学習的。"所有这些，都是必須加以严正批判的。

博物館和文物工作是否可以不必向苏联学習呢？在回答这个問題的时候，我們首先应該解决一个根本立場問題。这就是我們的事業究竟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还是要走資本主义道路？因为目前我們还处在过渡时期，貫串着这一时期的各个阶段和各个方面的基本問題，就是社会主义与資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爭問題。这也是博物館和文物工作所必須解决的問題。苏联人民正是在尖銳的两条道路的斗爭中，建立了巩固的社会主义經济基础和与之相适应的上層建筑，并且在四十年的漫长岁月中，積累了社会主义經济和文化建設多个方面的全面而成熟的經驗。当然其中也包括着博物館和文物工作的經驗。我們旣然要堅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發展社会主义的博物館和文物工作，就必須首先向苏联学習。

苏联的經驗告訴我們，博物館是社会主义文化事業的一个重要組成部分，必須通过其特点使之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它不只是反映过去，而且反映现在和展望将来；更重要的是不仅限于反映，而且起着上層建筑对經济基础的形成和巩固的积極作用。"这就是博物館事業的社会主义道路。八年来我們正是堅持了这条道路，因而使我国的博物館事業有了很大的發展。根据苏联經驗，我們确定了博物館的基本性質是科学研究机关、文化教育机关和物質文化与精神文化遺存或自然标本的主要收藏所。几年来已經把过去少数旧有博物館，从为少数人服务的"古董鋪"，改变为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的場所。同时我們还根据苏联經驗在全国各省、市建立了反映各地方的自然环境、历史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地志博物館以及以紀念历史人物事件为中心的紀念性博物館。这些博物館通过陈列和展覽，在宣傳党和政府的政策方針和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方面起了很大作用，鼓舞了人們参加社会主义的劳动热情。我們認为取得这些成績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学習苏联的結果。

应該承認，我們对博物館事業的总方向，虽然堅持了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真正能够运用馬列主义的立場、观点和方法来解决博物館的各种問題还仅仅是开始。形形色色的資产阶級思想还反映在我們博物館事業中，"脫离政治"、"为学术而学术"的傾向依然存在，甚至在各別单位还表現得相当严重。有些人口头上承認社会主义道路，工作实踐上却又千方百計地堅持自己的資产阶級观点。因此，在博物館事業中两条道路誰战胜誰的問題还没有徹底解决。解决这个問題正是我們今后一个长时期的政治任务。当然在博物館一些没有解决的具体問題上，还存在着客观原因，这就是我們的博物館發展的历史很短，缺乏經驗。因此，很多問題还没有解决，例如博物館陈列思想性、科学性和艺术性的結合問題；历史博物館陈列中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处置問題；为科学研究服务与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关系問題；博物館研究工作与業务工作的結合問題；綜合館与专館的孰主孰次問題都没有得到最后的解决。我們認为堅持博物館的社会主义道路，徹底地解决目前存在的問題，其决定关鍵在于馬列主义思

想的指导。而如何运用馬列主义来解决博物館中的各項問題，我們就必须学習苏联。在这里我們和有些人的意見是分歧的。有人强調苏联的条件和我們不同，馬列主义必须从实际条件出發，所以学習苏联就是教条主义。这种意見是打着馬列主义的招牌来反对学習苏联。我們認为这是極端錯誤的。的确，馬列主义必须从实际条件出發，但是因为馬列主义的普遍眞理絕不是空洞的，它总是具体地因为不同的条件而在各种不同的形式中体現出来。因而我們所要向苏联学習的，也就是苏联运用馬列主义怎样与他們自己民族特点相結合的經驗。因为这才是最生动而具体的馬列主义。我們絕不是原样照抄生搬硬套苏联博物館每項工作的具体成果，而是要学習苏联在創造这些成果的过程中，他們所应用的方法的精神实質。我們要学習他們的不仅是一些具体表現形式，而更重要的是要学習这些具体形式所表現的基本原則。譬如陈列必須具有鮮明的政治傾向，而反对“純”科学、“純”艺术的客观主义观点；陈列必須敏銳的反映現实，并为政治經济中心任务服务；陈列必須深入淺出。高度政治思想性和科学性必須与大众化相結合等原則，就是我們必須学習的。文物界右派分子陈夢家不正是反对这些原則嗎？他誣蔑故宫博物院根据上述原則所举办的陈列是走了錯誤的路綫。他反对陈列上要深入淺出，主張博物館的陈列“不能要求来参观的人都看得懂”。由此可見，我們和右派分子的分歧，正是两条道路的分歧。要进一步發展我們的博物館事業，坚持社会主义的道路，就必須繼續向苏联学習。

文物工作同样存在着两条路的斗爭，我們也必須向苏联学習。苏联是把文物做为全民的财产而加以保护的，并且运用辯証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来进行文物工作，使文物成为創造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依据；成为說明历史的科学資料；并用以向广大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提高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这就是文物工作的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我們不仅要学習苏联对文物工作的指导思想，而且也要学習他們先进的組織制度和工作方法。建国八年来，文物工作密切地結合国家建設虽然有了很大的發展和成績，但是因为我們經驗很少和人少事繁，主观力量与客观需要存在着矛盾，一直沒有摆脫被动的局面。一九五六年随着全国农業合作化高潮的到来，我們根据苏联經驗开展了文物普查工作，并且把建立“文物保护单位”工作做为我們的中心任务。目前全国文物普查已初步完成，全国除北京市二十六个省、市和自治区已經批准和公布了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共达五千五百九十三处，其中有很多重要的發現。第二次文物复查也即将开始。这就为文物工作从被动轉入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我們之所以能采取这一項在文物工作中具有根本性的措施，不正是因为学習了苏联的先进經驗嗎？在这活生生的事实面前，右派分子認为文物工作不必学習苏联的讕言，是会不攻自破的。

苏联經驗告訴我們，保护历史文物，要特别注意表現人民生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文物；同时，不仅要注意对古代文物的保护、整理和研究，而且还要特别注意革命时期的革命文物和今天的文物的收集、整理和研究。这与資产阶級用古董观点来对待文物的态度是有根本分歧的。这样就使我們对文物的概念有了新的認識，因而突破了对文物認識的旧观点，扩大了文物保护的范圍。大家知道，文物是物質文化遺存，是反映历史面貌的重要科学資料之一。因此，注意对近代和現代文物的保护、整理和研究，对历史研究有着重大的意义。人民是历史的主人，这是客观發展的規律。但是在几千年的阶級社会中，历史的本来面貌是被統治阶級隐蔽和歪曲了。因而給后人研究过去的历史时造成了困难。使我們只能根据仅存的古代文献和文物加以推断和分析，来逐步認識了解过去的历史面貌。只有当着人民成为社会的主人的时候，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指导下，人們才开始完全自觉地自己創造自己的历史，使人类从必然的王国进入自由的王国。而且才可能开始自觉地来記載自己所創造的历史。我們今天有計划地注意保护和研究近代和現代的文物，正是自觉地記載今天我們自己創造历史的光荣任务之一。这項有計划而自觉地为将来提供今天历史資料的工作是自苏联創始的，因此，我們必須首先向苏联学習。

綜上所述，为了使博物館和文物工作正确地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繼續学習苏联正是我們今后坚定不移的方向。当然，苏联是第一个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当时沒有其他国家的先进經驗可以借鑒，必須要用自己的智慧和劳动来开辟人类这条嶄新的道路，因而遭遇到的困难必然要比我們多得多，他們有成功的經驗也必然会有失敗的教訓。但是“所有这些成功的和失敗的經驗，对于善于学習的人都是無价之宝。因为它們都可以帮助我們少走彎路，少受損失。”

当我們紀念偉大的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时候，我們应当牢牢記住列宁的指示，把注意力集中到我們事業中存在的問題上，繼續向苏联学習，迅速地提高我們博物館和文物工作水平，使之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設服务。

1957年10月15日

更好更多地接受苏联的經驗和帮助

——为庆祝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而作——

韓寿萱

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創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加强了各国劳动人民爭取革命最后胜利的信心，大大地鼓舞了各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十月革命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十月革命对于中国人民說来更具有特別重大意义。中国人民是在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的影响下找到了眞正解放自己的道路，在偉大的中国共产党的領导下胜利的完成了資产阶級民主革命和基本上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

建国八年以来，苏联不仅在經济上、技术上給了我国無微不至的兄弟般的無私援助，使我們的建設事業飞躍前进，取得了輝煌的成就，而且在各方面的建設事業上都供給了我們先进的社会主义建設經驗。这对我們說来是宝貴而不可估計的巨大帮助。新中国的建設事業在党的領导下貫徹了結合我們的具体情况学習苏联的先进經驗的方針，在八年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黑云压城的日子里，別有用心的右派分子們污蔑我們学習苏联先进經驗为硬搬教条，借此来向党进攻。这些讕言是經不起一駁的。在值此庆祝偉大的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紀念之际，我以历史博物館在学習苏联、苏联的帮助下所取得的成就来說明加强学習苏联先进經驗的必要。

解放前的历史博物館可以說是处于不生不死的状态，它的陈列是杂凑的古董攤，它的藏品很少有科学价值，博物館沒有什么方針任务，也說不到起什么教育作用。当时的工作人員深切感到看門守攤的苦悶，当时的博物館事業是沒有前途可言的。解放后，在短短的八年里，由于党正确領导和关怀，迅速地成长为一个新型的专門性質的博物館。在它的成长里，不但接受了苏联的先进經驗，而且得到了苏联专家的具体帮助。它的工作逐步扩大开展，日益發揮着更多的教育作用，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上貢献了它一定的力量。

远在1952年，社会文化事業管理局便把苏联关于地志博物館經驗总結的专書如“关于地志博物館科学研究、搜集、陈列与文化教育基本条例”、“革命前之部、苏維埃时期之部的地志博物館的陈列方法”等譯出出版。在学習了这些經驗后，我們逐步明确了在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的新型的历史博物館必須宣傳历史唯物主义，鼓舞广大人民热爱社会主义的祖国，动員他們积極参加社会主义的建設。这些經驗从思想上武装了我們，使我們認識到新型的历史博物館应走的正确方向。

1955年文化部应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和俄罗斯共和国文化部的邀請，組織成博物館工作者訪苏代表团赴苏联进行了专業性的訪問，参观了博物館和有关博物館事業单位。这次訪問，对于新中国的博物館事業的發展有着很大的啓發和帮助。历史博物館的工作者通过学習代表团的报告进一步明确了历史博物館的基本性質与任务，即历史博物館必須是一个科学研究机关、文化教育場所和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遺存的儲藏室。这种性質与任务的明确使历史博物館走上了为科学研究服务、为广大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道路。虽然，我們在学習上还存在着不善于結合具体实际等缺点，但我們是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的。

以上是历史博物館在它的發展方向和基本性質与任务方面由于学習苏联先进經驗取得的巨大的成就。在我們的具体工作中，因接受苏联的先进經驗和帮助也有以下的改进：

1. 健全了組織机构

解放前，历史博物館的职工不滿二十人，只有人負責陈列、保管及总务的工作，根本談不到什么部門。1950 年王冶秋局长第一次訪苏归来之后，学習了苏联的先进經驗，历史博物館才成立了各部室的組織。值得我們特別指出的是群众工作部的創設。这一部門不只是历史博物館前所未有的，也是旧中国整个博物館界所沒有的。有了群众工作部的設立，才有了面向工农兵的物質基础。另外，在博物館工作者代表团訪問了苏联以后和普希金艺术博物館館长札莫希金同志在我国作了报告之后，我們明确了在館內設立考古部的必要，于是去年成立了考古部。这样就使历史博物館具备了新型博物館的健全組織，从而为建設社会主义文化更好地服务。

在党的領导下，我們坚決地接受了苏联的先进

經驗，肯定了博物館是学术研究机构，結合了館的具体的情况建立了由館內外专家組成的学术委員会，保証了我館的重要学术問題研究計划以及重要陈列提高到一定的科学水平。为了保証每項工作的科学性，館中一般有关業务的問題，是由館內各部門的专家合組的学术会議进行討論，提出方案，由行政批准实行的。

2. 对征集工作的重視

解放前，历史博物館的每月的經費，除了工資之外，連郵費也不够，根本談不到收購文物資料。解放后，由于党对博物館事業的重視，撥給了我們足够的經費来收購文物資料。通过对苏联博物館的經驗的学習之后，認識到征集工作是博物館最基本的工作，是博物館全部活动的物質基础，征集工作的进行必須根据历史博物館的方針、任务及陈列計划有計划有步驟地进行。目前我們与南京、上海和苏州等地的書店和文物店建立了联系，通过通訊的方式选購我們需要的文物資料。在今年的計划里我們就收集宋、元、明、清的文物，来配合陈列計划；同时着重收集近代史文物資料。这样，使我們的陈列和研究方面所需要的資料得了初步的改善。我們还成立了征集委員会来負責制訂計划、执行計划，使征集工作逐步提高并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之上。

考古部的成立使我們有条件在不久的时期內能补充陈列上、保管上和科学研究上的空白点，使我們的文物資料逐步地可以反映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發展、阶級斗爭和劳动人民生活情况，使我們的陈列能表現历史的全貌。

通过学習苏联的先进經驗和历次苏联专家的报告，使我們逐步地克服了“重古輕今”和“从个人兴趣”出發等的思想傾向，使征集工作开始走向健康的途徑。这种收获充分証明学習苏联先进經驗的必要性，同时証明只有接受苏联的經驗和帮助才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的建設服务。

3. 对保管工作科学性的認識

过去我們認为保管工作只是单純的保护与看管等事务性的工作，对于保管工作的科学性完全没有認識。在学習了苏联的先进經驗以后，才逐步地認識到保管工作的科学性。普希金博物館札莫希金館长的报告給我們更多的啓發，使我們認識到博物館的藏品需要有科学的記录。首先是对它的来源要有正确的記录，然后再进行科学鑒定或艺术鑒定，这样才能使藏品具有博物館意义的科学价值。因此，登記、編目都是科学研究范疇的工作。同时，我們也逐漸地肯定了没有經过科学研究的藏品就不能陈列也不能为科学研究服务的原則。

在修复工作上，过去我們对它的重要性和科学性也是認識不足的。遇有应加修整的藏品，我們只交給技术員，依据他們在古玩商店所習慣的方法进行修复。在接受苏联經驗之后，我們才指定专家会同技术工作者商定修复的方法。在修复的过程里，还照像存眞，使修复工作具有科学記录。这样就使我們的修复工作的科学性提高了一步，有的修复的質量，如銅器的修复已受到了国际間的重視。

4. 对陈列工作重要性的認識以及陈列質量的提高

历史博物館的陈列，在解放前不过是个使少数有閑阶級茶余酒后消遣的破烂的古董攤而已。解放后，在党領导下接受了苏联的經驗和帮助，才使我們逐漸認識到陈列是博物館活动的主要形式，博物館陈列的政治思想水平和陈列中材料的多寡，决定整个博物館的工作水平，陈列必須具有鮮明的政治傾向，有力地把群众导向正确的結論。进而明确了作为历史专業的陈列，必須以历史唯物主义作唯一的指导原則，历史陈列表現历史是劳动人民創造的历史，通过陈列对观众进行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教育。在历次苏联专家的参观里，我們也得到不少的具体帮助，从而也修正了一些严重的缺点，如取消了秦始皇的塑像，縮小了唐太宗的画像，增添了义和团运动中的領袖像和有关辛亥革命的布拉格会議的場面等都是接受了苏联专家的宝貴的意見而布置的。在陈列方面，我們虽取得了一些成績，但还是远远落后于人民的要求，我們还須繼續努力深入学習苏联博物館的經驗才能进一步的提高。

在陈列工作的过程上，我們已初步地建立了一套比較完整的工作程序，即陈列計划的制定、陈列圖稿的繪制和現場布置的方法。

苏联专家阿·伊·米哈依洛夫斯卡婭的“博物館陈列的組織与技术”成了历史博物館美术工作者重要的学習文件，特别是其中的“博物館陈列的艺术裝璜”和“复制陈列品的陈列技术”等篇，对于模型的复制、地圖圖表的繪制和美术加工方面起着指导性作用。

陈列是博物館活动的最主要形式，也是最艰巨的工作。这几年的經驗証明，学習苏联的先进經驗是我們提高陈列質量的重要的方法之一。

5. 群众工作的創建和改进

群众工作在解放前的博物館里是没有也不可能

学習苏联先进經驗發展我国博物館事業

博集

像其他方面的右派分子一样，博物館界的右派分子也在叫嚣着一种謬論，說什么八年来我国博物館事業学習苏联学錯了。这是一个大是大非問題，必須爭辯清楚。

毛主席屡次教导我們要向苏联学習，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开幕詞中，又一次告誡我們說："我們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我們的經驗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須善于学習。要善于向我們的先进者苏联学習，要善于向各人民民主国家学習。"建国八年来各方面的成就說明了这一点的重要，博物館事業也不例外。由于学習了苏联的先进經驗，才能使我国建設事業在短时期內取得如此巨大成就。

苏联博物館情况如何，我們为什么向苏联学習呢？

首先，我們知道，苏联共产党和苏維埃政府对博物館事業是非常重視的。在無产阶級剛剛奪得政权还不久，即在1917年11月里，人民教育委員会为了执行列宁的指示，發出了"致工人、农民、士兵、水兵和俄罗斯全体公民書"的傳单，其中就提到要警觉地保护人民的財富——有巨大教育意义的博物館。在十月革命成功后只两个月，即1918年1月召开的第三次全俄苏維埃代表大会上，便通过了發展国內博物館工作的決議。1918年5月人民委員会成立了博物館局；1930年召开了第一次全苏博物館工作会議。革命后的四十年中，博物館的建設和發展，經常得到苏联共产党和全体劳动人民的支持，所以才能够由革命前的180个發展到1000左右个，建成了布滿全国的博物館网。博物館的增长速度是惊人的。在沙皇时代，少数民族地区、边远地区的博物館是寥寥可数的；而在苏維埃时代，这些地区的博物館的發展特别明显，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省、没有一个共和国是没有博物館的。

其次，我們知道，苏联博物館事業是走的一条嶄新的不平凡的道路，是在改造旧有博物館，向各种錯誤的資产阶級博物館学观点进行斗爭，并建立新型博物館的基础上發展起来的。在革命前，博物館不是屬于人民而是屬于特权阶級的，是为了滿足上層社会少数人的狹隘的求知欲与美学要求而建立的。革命前参观爱米塔什博物館不仅要收特别門票，还要穿一定的服装。当时的博物館談不上什么眞正的科学研究；当然在陈列工作与保管工作上也是杂乱的。对观众、对文物藏品，存在着極不負責任的現象。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博物館事業起了根本性的变化。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論成了博物館活动的基础。博物館的性質、任务与方向和資产阶級时代有了原則的区别。做为党的思想与文化陣地的新型的苏維埃时代的博物館，对劳动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与精神面貌的改变，發揮了它应有的作用，并占据了一个光荣的席位。它面向工农兵大众敞开了自己的大門；把进行群众性的科学教育与思想教育当成自己主要的任务。博物館开始建立了群众工作，組織了"博物館之友"。目前在苏联，每年参观博物館的人有一亿几千万人次，光这个数字就足以說明它的群众基础与教育作用了。

从上述情况里，可以看出，苏联博物館經过四十年的建設，已經取得了十分丰富的經驗，奠定了無产阶級博物館学的基础。尤其重要的是：把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則与方法論应用到博物館的各項工作中去，給我們树立了光輝的榜样。在过去几年里，我国博物館在学習苏联方面，做了一些工作：翻譯印發或轉載了不少有关苏联博物館的書籍或論文，如"博物館藏品的管理"、"地志博物館陈列方

建立的，只有在人民当家作主的年代里，在学習苏联的經驗之后才有創建的可能。历史博物館的群众工作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教育观众，使他們了解历史發展的規律，認識到共产主义社会必然到来，从而使他們热爱社会主义的祖国并积極参加社会主义的建設。远在1952年，我們学習了文教参考資料的宣傳鼓动工作特輯，特别是其中的克魯普斯卡婭的"作为宣傳家和鼓动家的列宁"、加里宁的"論前綫鼓动员的語言"和叶菲莫夫的"列宁斯大林論宣傳員的語言"等論文，認識到講解用語必須是观众能懂得的語言以及依据不同的对象进行不同的講解等基本規律。1954年克利哈諾娃同志对我們作了苏联博物館群众工作系統的报告后，我們逐步地建立或改进了編写講解提綱、試講以及講解方法研究会等一系列的制度，也根据苏联的办法由研究員解答講解員的問題，提高了講解的質量。此外还加强了与学

法”、“博物館陈列的艺术装飾”等等。1955年我国派遣了博物館工作者代表团到苏联进行了一个月的参观学習。1957年又邀請了苏联博物館工作者代表团到我国进行了訪問。此外，两国博物館工作者在对方国家举办展覽会时，我們也利用这个机会进行了参观訪問与交流經驗——这些往来活动，对我国博物館事業的改进和發展帮助很大。

几年来我們学習苏联的收获，主要是：根据苏联先进經驗，結合我国具体情况，明确了博物館的基本性質、任务和我国博物館的發展方向，肯定了博物館是文化教育机构、是科学研究机构、也是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遺存的收藏所。解放前，我国的博物館只是供統治阶級少数人欣賞古物的場所，或是帝国主义者为向我国进行侵略而設的机构。現在的博物館已經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大学。通过博物館的陈列、展覽，向观众进行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思想教育，鼓舞人民群众从事建設社会主义的热情。以故宮博物院来說，解放前每年前去参观的不过几千人，而現在每年参观的达一百五、六十万人次，根本改变了以前的性質和作用。此外，在解放后不久，除对旧有的博物館加以整頓改造外，并学習苏联先进經驗建立了新的类型的博物館——地志性博物館和紀念性博物館。地志性博物館是資本主义国家所没有的，它是以介紹本地区的自然、历史、社会主义建設的成就为主要內容；并以社会主义建設的历史和成就为重点，进行綜合陈列，借以鼓舞观众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积極参加社会主义建設。它成为綜合研究本地区的中心。目前我国已建立了以山东省博物館为代表的二十九所地志博物館（或籌备处），分布在各省、自治区，并将成为發展本地区博物館网的核心。山东省博物館以苏联地志博物館基本原則和陈列方法为榜样，于1956年将自然、历史、社会主义建設时期三部分基本陈列初步布置完成。在1956年5月全国地志博物館工作經驗交流会上，各地志博物館都肯定了这样进行布置的优越性。最近一年来，各省、自治区地志博物館吸取了山东博物館的經驗，开展了陈列展覽工作。1956年內，山东、江苏、湖南、湖北、福建、浙江、山西、安徽、黑龙江、吉林、陕西、河北、貴州、新疆等省（自治区），广州、重庆两市等十六所地志博物館的参观人数共达到4,849,925人次。

紀念性博物館主要是以紀念建筑或遺址为基础，通过原状布置的陈列，来紀念历史上重大事件和杰出人物的博物館，如广州“农民講習所”紀念館，瑞金、遵义、延安等革命紀念館，上海及紹兴的魯迅紀念館等，都是为人民群众特別欢迎的，也是起到很大教育作用的。几年来，我国新兴的地志性博物館和紀念性博物館，正在不断的發展成长，并日益显示出它們的优越性。苏联四十年来博物館事業的發展情况，就数量来論，是地志博物館第一，其次是紀念性博物館。这对于我国博物館事業应如何發展也有很大的啓示。我国解放前博物館不多，都集中在几个著名城市里。內地及边疆地区的城市里，根本没有博物館。今后博物館事業的發展，将是首先發展地志博物館，并大量發展“小型多样”紀念館及小型地志博物館，充实和提高专門博物館。这种發展方向，也是参考苏联先进經驗結合我国具体情况而提出来的。总之，我国博物館事業所以能得到現有的發展和成就，是和向苏联学習分不开的。

1955年在苏联博物館学科学研究所主持下編輯出版了“苏联博物館学基础”一書，集中地反映了四十年来苏联博物館的宝貴經驗。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闡述了博物館的搜集、保管、陈列、群众工作等方面的具体業务，內容極丰富。在我們紀念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前几个月，我国已将这本書翻譯出版了；这本書可以作为我国博物館工作者的工作指南，对于我国博物館工作将会給予更多的啓示和帮助。

当然，我們学習苏联还有許多不够的地方，苏联很多宝貴的經驗还没有被介紹过来；他們早已解决的問題，我們还正在摸索。今后为了加速我国博物館事業正确發展，必須粉碎右派分子的进攻，堅定不移的向苏联学習。特別是我們博物館工作者，只有繼續努力学習偉大苏联的先进經驗，鑽研博物館学的基础知識，才能进一步提高我們事業的水平，更好的为广大人民服务。

校的联系，使我們的陈列在学校教学上起着有力的配合作用。虽然还没有像苏联一样成立学生工作室，由于与学校联系的加强，北京市中、小学校参观历史博物館的陈列已列入教学計划里，使历史博物館的陈列日益發揮着更多的直观教育的作用。

从上述的事实我們可以認識到历史博物館从几乎是廢墟的基础上能在短短的八年里逐步形成为新型的博物館，正如新中国的其他事業一样是和接受苏联的經驗与帮助分不开的。今后我們必須更好更多更堅决地向苏联博物館界学習，使我們的历史博物館在宣傳历史唯物主义上，在建設社会主义文化上發揮着更大的作用和貢献出更多的力量。

我們謹以此迎接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这一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偉大的节日，向苏联的博物館工作者致敬，并表示我們衷心的感謝。最后我們敬祝中苏友誼万古长春！

学習苏联經驗更好地組織地志博物館的陈列

山东省博物館

山东博物館的陈列，大体上說，已初步地組織起来了。这个地志陈列之所以能在短短的一年半（1954年8月——1956年2月）时間之內組成，主要原因除了党和上級机关的支持和領导，以及国內各兄弟館的大力支援以外，同时也是学習了苏联地志博物館的經驗的結果。苏联的經驗給我們指出了地志博物館的性質、任务和組織陈列的工作方法、陈列的原則和主要內容；这样，就使我們在进行这一工作时，避免了多走弯路。

以前，我們对博物館的認識仅是簡单地認为它是一个搜集、保存珍品异物的場所，可供少数专家研究欣賞，也可用一部分东西供一般人参观开扩眼界。自从学習了文化部社会文化事業管理局編印的有关苏联地志博物館的書籍之后，苏联地志博物館的先进經驗給了我們很大的帮助，使我們了解了地志博物館所应具有的性質。“地志博物館，正如科学研究机关一样，从事于地方研究，以及对于有陈列意义的各种物品的搜集、保藏、科学的記述和陈列工作。这些物品是自然与社会知識的第一泉源”說明了地志博物館必須是从事地方研究的机构，同时它还必須搜集保藏有关地方的自然与社会知識的各种作品，对这些物品进行科学的記述。苏联經驗告訴我們，地志博物館必須組織陈列向观众普及地志知識，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而陈列是博物館主要的活动形式。

地志博物館的陈列应該怎样組成呢？苏联的地志博物館是由“地方自然之部”、“地方革命前历史之部”和“苏維埃时期之部”三个部分組成的，我們的地志博物館是否也要按这三种不同的部分来組織陈列呢？当时我們曾考虑到“地方革命前历史之部”和“苏維埃时期之部”是社会發展的历史陈列，“自然之部”主要是自然环境和自然富源的陈列。自然条件是社会發展經常必要条件之一，在“自然之部”陈列里，可使观众了解到人如何利用和改造自然，因此，这一部分独立組織陈列也是很必要的，如果缺乏或縮小它，就难以对地方有一个比較全面的了解，而且这一部分陈列主要是屬于自然科学性質范圍內的，因此，把它同历史陈列分开，組成一个独立部分是很适当的。“苏維埃时期”之部虽然是与“地方革命前历史”之部陈列联貫的，但前者是人类历史的新紀元，它的現实教育意义最大。因此把“苏維埃时期”突出出来作为一个独立部分也是完全必要的。最后我們按照苏联地志博物館陈列組織的方法，把全部陈列分做了三个部分：一、自然之部，二、历史之部，三、社会主义建設时期之部。

自然之部的陈列应該怎样組成呢？在“关于地志博物館科学研究、搜集、陈列与文化教育工作基本条例”一書中說：“自然之部旨在对作为人底变革活动在其中进行的地方自然及其富源加以說明，本部之陈列将根据馬列主义世界观与創造性的苏維埃达尔文主义——米丘林、李森科学說的原理，闡明地方自然之發展，指出地方自然底各个方面与現象的关系与相互关系。

本部的陈列在米丘林学說的原理上，用有关發展的規律性和改造自然的途徑等方面的知識把观众武装起来。”

“地志博物館的陈列方法——自然之部”一書中，具体地說明了一个基本陈列示范的构成。全部陈列共分为两大部：（1）地方自然与自然富源；（2）地方自然历史区域及其典型景观。在第一大部分中又包含着一般地理特性、地質、矿产、地形、气候、水利、土壤、植物界和动物界九个內容。我們最初是按照这种結构方法去进行設計的，但是一开始便遇到了困难，那就是我們没有照顧到山东的具体情况。当时关于山东地方的科学調查研究材料还是很少，如果按这种結构去进行設計，那么在地形、地質、水利……等許多部分都会成为空白或者使得內容非常貧乏，造成組織陈列上的困难。如果把材料少的項目合并起来，例如，把地形与水流合并，就会打破原有的完整次序了。我們發現苏联地志博物館自然之部构成的第一部分九个內容排列得很科学，由無生物到有生物，先后次序，一环扣着一环，如果打破它的次序，那将在說明問題上会造成混乱。但是根据我們的具体情况，某些項目又必

须合并。为了使这些项目合并后仍能說明問題，所以把矿产一項放在土壤的后面，把一般地理特性等許多自然方面的項目合并为一項，称之为"自然环境"，成为一个主題，矿物、植物、动物則各自成为主題，統称之为"自然富源"。关于"景观"方面的陈列，一者由于我們当时对"景观法"的具体方法还弄不明确，再者，选擇典型地区調查研究也不是一时办得到的，因此，这一主題陈列，暫付缺如。于是，原定的自然之部五个主題便成为：(1)山东的自然环境，(2)山东的矿产，(3)山东的植物，(4)山东的动物等四个主題了。当然，这样組織自然之部的陈列，对說明山东的自然界的特点和辯証的發展規律显然是很不够的，今后我們还必須努力儲备材料，充实內容，逐步提高。

关于"历史之部"和"社会主义建設时期之部"的陈列，苏联地志博物館書籍中曾这样写道："地志博物館里的革命前历史之部与苏維埃时期之部，都是用来进行人民与苏維埃祖国馬列史观的科学宣傳的"，"地方的历史陈列，必須指出社会經济制度的每个历史阶段同它的阶級构成，这时应特别注意劳动人民的历史和他們的革命解放斗爭，并須記住：历史科学如果要想成为实际的科学，就不能再将社会發展的历史說成帝王将相的事業，說成'侵略者'与国家'征服者'的事業，而是首先应該作为物質財富生产者的历史，劳动群众的历史，人民大众的历史来处理的。"历史之部的陈列必須是說明社会發展的历史，它不是帝王将相的事業，而是劳动人民創造的。我們在最初也打算按社会發展阶段的方法来組織这部分陈列的主題結构，但一接触到实际問題，便遇到了困难。这些阶段应当如何划分呢？例如：当国內某些地区进入封建社会的时候，山东是否也进入了封建社会？如果没有丰富的考古材料为依据，是無法断定它的历史發展阶段的。由于我們習惯于旧的帝王将相的历史叙述方法，在面对着用社会發展史的方法組織陈列时，便因困难而躊躇了，沒有勇气去尝試进行，于是便采用了部分用社会發展史的陈列方法（如原始社会、奴隶社会一部分）、部分用王朝分阶段的陈列方法。从这种陈列里，我們固能片片段段地看到劳动人民在历史發展上的作用，但是整个說来，我們还是很难看到某个社会發展阶段的經济基础和它的主要特征，很难明显的看出它是物質財富生产者的历史，是劳动群众的历史。当然，用这种陈列向观众进行馬列史观的科学宣傳是非常不够的。因此，我們感到，在历史之部的陈列上，同样地不能畏难，应該很好的学習苏联地志博物館历史之部陈列的基本原則，把它組織成一个能科学地說明社会發展的历史陈列。

苏联地志博物館把苏維埃时期之部的陈列結构分做两部分：(1)苏維埃时期地方历史；(2)地方社会主义經济与文化的成就。最初，我們对这种結构的精神体会不足，認为新中国建国的历史还很短（1954年秋組織这部分陈列），把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一段革命史划归"历史之部"，新中国成立后这一段时間，仅組成"地方社会主义經济与文化的成就"就够了。在拟定計划过程中，發現这样組織陈列，很难說明历史發展的特点，遂又重新对苏联地志博物館把苏維埃时期之部陈列分做两部分的意义和精神进行了研討，認識到苏联地志博物館把苏維埃时期之部的陈列是看做历史的陈列，而不是一个簡单的社会主义經济与文化建設成就陈列。它在第一部分中要展示地方社会主义發展的主要历史阶段，至于当前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設时期，不能算做历史的往事而是現代的事情，应該在第二部分中組織陈列。根据这一陈列結构的組織精神，我們考虑到新中国国民經济恢复时期是社会主义建設的一个完整历史阶段，第一个五年計划建設时期則不是，当时它还未完成，是現代的事，所以我們就把社会主义建設时期之部分做两个主題：(1)国民經济恢复时期（1949—1952）；(2)計划建設时期（第一个五年計划头二年的經济与文化建設成就）。事实証明，只有这样按照苏联地志博物館組織陈列的精神，才能便利于反映出不同历史阶段任务和历史阶段特征来。

苏联博物館組織陈列的工作步驟和方法，也給了我們工作上很大的便利，它把全部陈列工作分做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編拟陈列計划，准备陈列品；第二个阶段是从事陈列品的裝飾設計，并准备陈列品的艺术裝飾材料等；第三个阶段是現場布置。陈列計划的拟定又分为三个步驟，关于这一項工作，阿·伊·米哈依洛夫斯卡婭在"博物館陈列計划与陈列圖式的編制"一文中（文物参考資料1953年第10期）講得很詳細，第一步拟定陈列的主題結构；第二步拟定陈列主題計划；第三步制出陈列圖式。这三个部分，相互联系地組成了陈列計划。按照这些步驟进行工作，工作就能有条理；打乱了步驟或是忽略了一步，往往使工作造成混乱，出現返工浪費現象。

山东地志博物館的陈列开放以后，許許多多观众反映，他們在短短几小时的参观后对山东有了一个具体而又扼要的概括了解。有的观众表示虽然自己是在山东生长大的，但对山东的情况却并不熟悉，看了博物館的陈列才深深地感到山东的可爱，祖国

的可爱。从观众的这些反映上，足以說明按照苏联地志博物館的陈列方向，把地志陈列內容組織成“自然之部”、“历史之部”和“社会主义建設时期之部”三个部分，是完全能够反映出山东的主要輪廓来的，并且对我国地志博物館是完全适合的。

由于我們根据苏联地志博物館陈列的基本精神来布置陈列能描繪出山东的輪廓，尤其是“社会主义建設时期之部”能反映出山东自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新面貌，因此它受到观众的重視，許多机关、团体、学校、部队以及街道居民都組織来参观。而在反右派斗爭中，博物館的陈列成为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最生动最形象的教材。

在組織地志陈列工作中，由于我們对苏联地志博物館各部份的陈列精神体会得还不深，对于許多地志材料又缺乏調查研究，因此所組織成的山东省博物館的陈列內容是还不够丰富、不够科学，距离“苏联地志博物館陈列构成示范”所要求的水平还相差得很远。今后我們仍将繼續堅定不移地認眞地学習苏联經驗，結合中国和山东的实际情况使我們的陈列質量不断提高。

列宁的地下活动

苏联　П·捷洛夫

莫斯科中央列宁博物館收藏着天才的社会主义革命家、全世界劳动人民領袖——列宁的一些仅存的遺物和文件。这些文物反映出列宁在1917年10月革命前夕活动的情况。当时列宁因受資产阶級和地主的临时政府的緝捕，不得不从事秘密活动。

該館展示出一幅庫克尼綏的名画“列宁在拉兹里夫”……是八月里的一个寒冷的黄昏，低低的灰青色的云彩遮蔽着西边發亮的天空，在通向树林的广闊草原上，站着純朴偉大的列宁。他肩上披着秋大衣（这件大衣現挂在該館的橱窗里），头上戴着軍帽，手里拿的是几頁原稿和一支鉛笔，四圍沉寂，但仿佛听見上面吊着提鍋的那堆小篝火在發出折裂的响声。領袖的視綫瞧向东方，瞧向俄罗斯腹地。他的神思跟彼方的革命工人、战士和布尔什維克党融合在一起。圖画显示出对偉大事件的期待。

列宁在地下活动的时候，曾写了60余篇文章、小册子和信件，其中包括“国家与革命”这本經典著作。

在透明玻璃底下，放着有关这本著作的文件。陈列窗的中央放着一小条的紙，写满了微細而均匀的笔迹。这是1917年8月列宁写給瑪利亚·伊里宁齐娜·烏里揚諾娃的便条的复制放大品。原文字体太微細了，只有用放大鏡才看得着——当时秘密活动不得不这样做。

“亲爱的瑪利亚沙！”列宁写道：“給你深切的致敬和問好。我生活得很好，已开始写有关国家的問題，这个問題早就使我感到兴趣了。”

陈列窗內还放有各張原稿和从1917年12月30日眞理报上粘剪出来的“国家与革命”的最初一部分。这兒还有該書初版的封面和一些書頁。

該書列宁結語的旁边放着列宁手拟第七章“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底經驗”的大綱。这章没有完成，因为被十月革命前夕的政治危机“妨碍”了。“这种‘妨碍’只可引为庆幸”列宁在結語里写道：“……作出‘革命底經驗’总比論述革命底經驗更为愉快，更为有益”。

在陈列窗上面，安放着人所皆知的“藍笔記簿”的封面复制品。这个簿子当时对列宁的著作該多重要。列宁留居国外时所作的摘录和笔記是十分有价値的。这些著录的总名称是“馬克思主义論国家”，其內包括有馬克思和恩格斯的重要語录和列宁論述国家与無产阶級专政方面的笔記。

“国家与革命”一書是在1917年9月完成的，那时列宁在赫尔辛基一个芬兰同志阿·布鲁麦維斯特那兒躲藏了一些日子。

后来芬兰共产党員把列宁居住和工作过的那房間的一个模型贈給中央列宁博物館。这份礼物跟反映列宁后期地下工作情况的陈列品一起，不断吸引着館內游客的注意。在这細小精致的房間，家具供应得很周全：安着一盏油灯和一对烛台的書桌；用綉彩隔热板隔热的壁爐；还有各种家具和墙上的照片等物。中央列宁博物館人群絡繹不絕。在接近十月革命40周年之际，游客比平日更众多。国內劳动人民和外国来客都兴高彩烈地观看这些陈列品，因为这些陈列品所反映的，是他的名字正象征着新的世界——共产主义世界的那个人的活动史实。

（朱鎭海譯自1957,10,3 眞理报）

苏联出土的有关中国考古材料

——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願中苏考古学者开展中苏古代文化交流的研究——

佟柱臣

半世紀来，苏、蒙两国出土了不少的有关中国的考古材料；像諾音烏拉出土的汉代漆器与絹繪，阿巴干出土的汉代建筑遺址，鄂尔坤河畔發現的突厥闕特勤碑、回紇比伽可汗碑，伯力發現的明代奴尔干都司永宁寺碑等，已經是我国考古学界所熟知的事了。最近作者借着到苏联学習博物館工作的机会，在莫斯科物質文化研究所C·B·吉謝列夫、Л·A·爱芙秋荷娃、莫斯科大学历史系Л·P·科兹拉索夫、莫斯科国家历史博物館H·B·畢亚梯雪娃、П·Л·瓦尔瓦拉、列宁格勒冬宮博物院M·H·克里切栥娃、C·C·索罗金、列宁格勒物質文化研究所分所C·C·車尔尼柯夫諸学者处，看到和听到了許多有关中国的考古材料。远东自海参崴起，中經伯力、赤塔、烏兰烏达、克澤尔、阿巴干、以迄中亚的吉尔吉斯，凡是中苏两国接壤的地方，都發現了中国的古代遺物，这就充分証明中苏两国文化的交流是由来已久，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誼是有它的历史淵源和基础的。当此庆祝偉大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紀念之际，願中苏两国学者携起手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本文的写出，是承以上諸博士的教益和供給了不少資料，而全苏文化部的A·B·沙文同志、我国的博物館科学工作研究所籌备处的陈婉仪同志均翻譯了有关資料，特向他們表示敬意与謝意。

一

苏联境內發現年代最早而最值得注意的中国遺物，是列宁格勒物質文化研究所A·П·奥克拉德尼柯夫研究員在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黑龙江上游赤塔城亚彥乡發現的陶鬲（圖一），这件鬲通体灰褐色，口緣部分为磚紅色，斂口、直唇，自鬲口下深25厘米处为鬲襠，袋筒結合平整，下有三个深23.4厘米的肥大袋足，袋足外为实足部分，高2.6厘米，呈鈍圓錐状，形近苏秉琦先生对于斗鷄台陶鬲分类的袋足类A型①。胎質內有匀整的小砂，直徑在0.1厘米上下，由于表面打磨光滑，砂粒并不露出，只有在唇部表皮脫落部分，才能观察出来。器唇外面有紋飾，是由凸点与波状曲綫組成的一条花紋带，即在两条曲綫之間，在三处等距离上有三个乳状凸起并列着，曲綫下部有圓点突起，它是从里面用錐向外扎而又未扎透因而在表面鼓起的一种紋飾，林西鍋撑子山的灰褐色陶甕頸部②，就有这样的花紋。器体上更有寬寬的条带紋，自上向下垂，排列很規矩，每当相并很緊的三条条带紋与三条带紋中間距离較寬的部分，則有一条条带紋，当为摹拟皮条的一种紋飾。此器通高50厘米，口徑36厘米，腹徑47厘米，厚1.2厘米。鬲是中国自新石器时代以迄商周的一种固有陶器，那么苏联赤塔地区受到了这种陶器的影响是很清楚的。依据A·П·奥克拉德尼柯夫研究員的意見，定为紀元前两千年物，即相当于我国商代或在商以前，可是两地陶鬲也有以下不同：（1）小屯鬲多折唇，平底或斂足③。赤塔鬲則直唇，袋足很深。（2）小屯鬲灰色繩紋。赤塔鬲褐色皮条紋。所以两地陶鬲的时間应該看作是有区別的。在小屯与赤峰的中間地带如赤峰紅山后，錫林郭勒盟的夏麦諾尔都是出过鬲的，但是赤峰紅山后鬲的下限，已經晚到秦，所以裴文中先生說：“若鬲演变之中心，在山东河南，則此边陲区域之鬲，演变之时間或較晚，而此最后之鬲，或可至汉代矣”④。当然赤塔鬲不会晚到汉代，但是A·П·奥克拉德尼柯夫研究員推定为紀元前二千年也似乎早了些。

时代稍后，西伯利亚南方阿尔泰边区的貝勒魯、卡坦达、錫百、巴澤雷克各地發現了不少的堆石大墓群，这是老斯基泰人的墓葬。如巴澤雷克的堆石墓有的高約2米，直徑約50米，墓內以完整的树干，交木作槨，長約5米，寬約2—2.5米。其中的木棺長約3米，也是刳空半个树干上下扣合。棺外花紋有的直接刻在白樺皮上，也有去皮刻在木質部上的，作虎形圖案，状近安陽武官村大墓出土的石磬上的动物紋。因为这些都埋在冰冻層中，所以尸体保存很好，随葬品也是豪华艳丽，显示了当时的文化高度，自然也暗示了对以后的匈奴文化，不应估計过低了。

棺中的尸体已制成木乃伊，剖开胸腹去肉，內

夹馬鬃，后加縫合，現在皮膚干黑，直肢，上复紅色毛織物，屬蒙古利亚种，有的在肱骨皮膚上刻有动物紋，入墨，为圖騰信仰的遺習。比这个时代稍晚的文献，史記匈奴傳說："汉使王烏等窥匈奴，匈奴法，汉使非去节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廬，王烏北地人，習胡俗，去其节黥面得入穹廬，单于受立。"这段文献对于这种習俗，是可供参考的。

陪葬的馬也成了木乃伊。馬身上的轡、馬勒、垂胸、鞍、鞯、臀飾，都是非常豪华。馬首上飾鹿角形冠，鞍上长鞯下垂約1米，鞯下有黑毛纓长約10厘米，鞯为中国絹，淡黃色，很薄，本身素面無花紋，鞯的上方綉成疏稀鳳凰。

陪葬的四輪車，完整如新，車上全用木榫穿合，不用一根鉄釘，四輪輻条全用独木，輪大而高，两軸两側各联横木，車上有方盖輿，前出双轅，轅上有衡。全长約5米，高約3米上下。

出土地毡，长約5—6米，上織人物，为伊朗作風。此外有各种毛織物，毡衣。鞋有两种：一种是以长寬3厘米方塊小皮綴成的长靴，一种是以紅色毛織物編成的女鞋，鞋底上又以銀絲編成带状紋，带紋上更嵌有貝片或白玉片，十分艳丽。

更有两种乐器，一种为細腰形小鼓，高約20厘米上下。一种近舟形，上有一弦，近琴瑟类，长約3厘米。此外有小桌、木枕等。

关于这些古坟的年代，M·P·古里亚之諾夫定为紀元前后一世紀，相当于汉之盛世。P·G·包露夫卡定为紀元前3世紀。日人梅原末治虽然同意包露夫卡教授的論断，但是他認为这里受到濃厚的汉代文化影响，定为紀元前3世紀尙值得考虑⑤。不过巴澤雷克6号墓中出土了战国四山紋鏡，直徑11.5厘米，冬宮博物院編号为2063—9，弦鈕方鈕座。阿尔泰西麓墓葬中也出土了同样的一件⑥。所以苏联学者把它定为紀元前4—5世紀是对的。C·B·吉謝列夫教授意見說：这种文化虽然与中亚文化的关系比較密切，但与中国文化也發生了一定瓜葛，那么汉書西域傳："汉兴至孝武，事征四夷，广威德，而張騫始开西域之迹"，以为在元狩元年，即紀元前122年才与西域發生了关系，似乎晚了些，所以阿尔泰地方的古斯基泰墓葬，对于中西交通史，又提出了新的材料。

此外Л·P·科兹拉索夫在米努辛斯克發掘了状如汉代陵墓大的大墓，墓高約25米，有羡道、木椰，有奴隶主并殉有奴隶。出土的石磨，为农業文化較高的迹象，显示了在同一时代它与周圍地区文化是差不多的。

二

依据C·B·吉謝列夫即将發表的关于匈奴城市的論文，苏蒙两国境內到現在已經發現了10座匈奴城，如布里亚特蒙古自治共和国的塔里、烏兰烏达、赤塔附近，均已發現，这些城址有的呈方形，有的很大，值得注意的是城址中發見了汉代云紋瓦当，并有陶片。

哈卡斯自治省阿巴干城南8公里，里量农庄附近發現的汉代建筑址，首先引起我国郭沫若院长的注意，他在苏联紀行一書中，对于苏联历史博物館收藏的材料，作了詳細的描述并加以考訂，認为"天子千火万岁常乐未央"圓瓦当中之火字应当为秋字，这在Э·P·雷格迪朗所著"东方銘刻学之五"——文中所介紹此地出土的瓦当上就是写作秋而未写作火字。郭沫若先生的意見是正确的。C·B·吉謝列夫在"南西伯利亚古代史"中作了概括介紹，而周連寬同志又以"苏联南西伯利亚所發現的中国式宮殿遺址"一文考訂为王莽时期遺址。此次作者在莫斯科見到了Л·A·爱芙秋荷娃、П·Л·瓦尔瓦拉两位原發掘人，П·Л·瓦尔瓦拉說：發現这个遺址的，是在遺址东南修路的工人，他們听到了工人的告訴，才去發掘的。因为列宁格勒的A·H·别倫施坦定为14世紀遺址，所以她提出反对意見。室內地面鋪滿連續山字形紋磚，磚下有石砌火道，这种采暖的装置，頗类炕。汉書李广苏建傳記匈奴風俗"鑿地为炊，置煴火"，現在內蒙古的半固定的蒙古包中，也有类似的构筑⑦，都可供参考。"“天子千秋万岁常乐未央"圓瓦当出了几十个，銅鋪首共出土三件，分藏在米努辛斯克博物館、莫斯科苏联历史博物館、拉斯諾亚斯克博物館。

除C·B·吉謝列夫在前書中介紹的以外，还有銀耳环及鉄斧等，兹就在莫斯科历史博物館所見，补記如下：

Ⅰ瓦、磚、

甲、"天子千火万岁常乐未央"圓瓦当1件（編号82170/822—130）（圖二）文为反文，边緣起棱綫，棱綫高出瓦当面0.4厘米，字比棱綫低0.15厘米，中間有扁圓状突起，直徑3.8厘米，它比字又高了些，棱綫到边寬17厘米，扁圓突起上下距字4厘米，左右距字18厘米。当面正圓，直徑19.5厘米，字迹遒勁，是少見的規整瓦当。当面与瓦筒显然为后接合在一起的，筒上有剎痕，里面有捺痕，筒上更有条紋，条寬0.25厘米，这与一件条紋陶片的作法是相类似的。筒厚1.5厘米，筒长16厘米，泥質純灰，表面挂有灰土。更有一件"天子千口(火)

万岁”，“□（常）乐未血”（央）殘瓦当（編号32170/822—128），銘文虽然与前者一致，但并非出于一范，笔划长短，亦与前瓦当有别，直徑約20.8厘米，大于前者，棱綫高出于当面0.2厘米，距边緣寬1.2厘米，中間扁圓状突起直徑4.5厘米，瓦厚1.4厘米，灰胎質似較前者砂粒多些。

乙、磚見到了3塊，無編号，上有平行山字紋，1件綫长12厘米，寬11米，厚2.2厘米，两側用刀切得平齐，就花紋之規整，似亦为用范作出的。

Ⅱ陶片：

甲、灰黑陶1片，即C·B·吉謝列夫著“南西伯利亚古代史”圖版中所見的陶片，表面黑而里面灰黑，質中含有細砂，厚0.6厘米，唇微外折，斂口，片寬11厘米，高11.5厘米，片下有范制痕迹，上部有輪修痕迹，頗近似我国龙山期籃紋陶片作法，可能出自汉代工人之手。

乙、砂質褐陶，其中1片稍紅，表里打磨光滑，但仍为手制，从片上观察，多直唇筒腹器，1片为器腹部片（圖九之2），厚1厘米。1片为头部片（圖九之1），上部厚1.4厘米，下厚1厘米，从作法与陶質看，均与汉陶不同，蓋为当地人民之产物。

Ⅲ銅器、鉄器：

甲、銅鋪首計3件，莫斯科历史博物館藏有未發表的1件（圖三），兽面、云形蓬髮，两兽角斜出，角长10.4厘米，两角相距15.7厘米，其上有錯痕，器面一側高25厘米，一側高25.5厘米，寬为19.5厘米，两側仍有云形象征耳部，口旁两鬚卷曲，分向两側，上顎犹存二齿，齿长1—2厘米不等，齿寬0.9厘米，齿間距离0.5厘米，鼻勾高5.4厘米，鼻孔徑2.7厘米，眼直視，长6.4厘米，寬4厘米，眼球长3.6厘米，寬2厘米。左眼眉端有三条刻綫（并附有另一件模型照片，見圖三）。銅环一件（圖九之6），表有青銹，殘断作半环状，环粗0.2厘米，环徑3厘米。

乙、鉄鈎1件（圖九之7），氧化很利害，表面只見鉄銹土，鈎粗0.3厘米，长2厘米。

Ⅳ石器、玉器：

甲、穿孔条状砥石（圖九之5），青色頁岩，两端圓平，磨制甚光，中間稍向內洼，或为用过部分，全长13厘米，寬3厘米，厚1.4—1.5厘米，上端孔徑0.7厘米。

乙、玉簪殘部1件（圖九之3），綠玉、簪身扁平，上部断去，殘长5厘米，厚0.55厘米。

丙、玉觿1件（圖九之4），乳白色玉，长6.7厘米，厚0.5厘米，上端小孔徑0.2厘米。

从以上的补記中知道出土的遺物是很丰富的，而玉簪、玉觿同样也显然是中国文化的产物。

其次冬宮博物院所藏諾音烏拉的材料，如在紫地茶色紋絹織物上的流云紋、动物紋間，織有“鳳凰群鵠萃昌万岁宜子孙”和“新神灵广成寿万年”等文字，則汉人的吉祥神仙思想也完全反映到絹織物上了。这种絹織物不仅見于蒙古人民共和国，而更見于西伯利亚米努辛斯克的奥格拉克蒂的墓葬中，出土有白樺皮筒长11、筒徑6.5厘米，表面包絳紫色地白藍色寿字动物紋絹織物，可見这些东西已經遍布在西伯利亚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广大地区了。汉書匈奴傳說：元寿二年……賜（匈奴）衣三百七十襲，錦綉繒帛三万匹，絮三万斤。此外史記后汉書的匈奴傳部份，像这样記載也是不少的，所以中国絹織物流入匈奴之盛，可以想見了。

C·B·吉謝列夫就着以上匈奴城的發見，提出了这样的意見：他說：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在历史發展的进程中，一般規律都是差不多的，只是各有其特征而已。这样把匈奴人看作迁徙不定落后部族的看法，是应該修正了。至于阿巴干的汉代遺址，米努辛斯克的汉代絹織物、克拉斯克雅尔斯克的汉鏡，也都証明当代中苏两地文化交流的一面。

三

苏联历史博物館1件舞姿小銅像（圖四）（編号为26943），于1891年在赫松涅斯北岸古城址附近掘获，曾發表于考古学会1891年报告第5頁上，它头戴尖帽，袒上体，下着裙，露出生殖器，値得注意的是背后有髮辮甚长，通高13厘米，H·B·畢亚梯雪娃博士說，全苏境內历史上的少数民族，从無編髮習俗，这件銅像根据她的研究，認为是3—4世紀鮮卑族的貴重資料。此外，在沃罗涅日省彼尔爹卡村附近發現的銅坐像，亦与此有关。

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頓那尔伽特，額尔登尼住庙附近的墓葬中，出土了唐代海兽葡萄鏡，外有絹制鏡囊，在一个絹織物的小袋內有7枚开元通宝，袋上写有“临洮县叔鸞，柏山乡，（押記）大足元年八□□”。恐怕是临洮县柏山乡叫作叔鸞的人，死在武則天的大足元年（公元701年），而葬在了頓那尔伽特地方了。而苏联叶尼塞河右岸舒申斯克区，薩彥村也發見了唐代双鸞鏡（圖五）。

关于西辽的历史，虽然散見于辽史、金史、元史、契丹国志，大金国志、松漠紀聞、元秘史、聖武亲征录、西游录、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归潜志、宏簡录、通鑒綱目、辽史紀事本末等文献。但是关于西辽的物質文化遺存如何，到今天我国还不知道。所以莫斯科大学历史系П·Р·科兹拉索夫教授發見的西辽居住址，确是学术界的一件大事。

西辽居住址在圖瓦自治省克澤尔城南，唐努烏拉山北側，距阿里給斯河不远的多提协科河地方。遺址东南长625米，南北寬250米，究竟是否为城址，尙不能肯定。在河东清理了5个房址，其中4处有炕址，1处官衙址（編号第4室），长約9米，寬約7米，室內鋪磚。

遺物中在第四室內有方座圓形石柱础，座长寬各約1米，更有鴟尾（圖六），高30余厘米，开張大口，曲舌，錐齿，上額上有角，眼球突出，披髮，有鬚分向两側，李誡营造法式說：“汉紀。栢梁殿灾后，越巫言，海中有魚，虬尾似鴟，激浪即降雨，遂作其象于屋，以压火祥，昔人或謂之鴟吻非也”，它是一避邪压胜的建筑裝飾。其次更有狻猊，长40余厘米，高約20厘米，牛开口露齿，髮向后披。布紋筒瓦长30.1厘米，筒徑13.5厘米，寬6厘米，厚1.5厘米。板瓦、前有条状垂叶，叶上部作平行山字紋，下有一条刻綫，垂叶边緣飾扭繩状紋，寬約2.3厘米。

兽面紋圓瓦当（圖七），直徑12.5厘米，中間眉、目、口、齿、髮、耳畢具，凸出精致，兽面周緣有点状突起，点状突起之外更有寬边約2厘米。这种瓦当在我国如辽上京林东白塔子等城址中是習見的。更有唐草紋方磚，状近渤海东京城出土的方磚。

陶片色灰黑，哈里內地方也有这种陶片，有平行条状暗紋，分圓唇斂口甕、直唇小碗等，与我国辽代城址出土物無殊。

瓷片中屬于定窰系統的有鷓鴣斑釉片，黑釉片，黑釉刻花片，釉色光亮，胎不甚厚。此外有粉定一小片，呈乳白色。更有宋均釉片，釉薄鮮藍，直挂到足，并有护胎釉，如第二室出的一件均窰盘，口徑13.5厘米，（編号$^{2}/_{320}$）（圖十）。

更有长柄骨刷，刷毛很短，制作極佳，这种长刷，在林东瓦尔慢哈辽陵，辽陽石嘴的辽墓壁画中都有，而石嘴子墓中更出了一件，这些都是很好的參証材料。此外有鑒金饅首状銅球，白瓷棋子，状如紐扣，这类的棋子在赤峰缸瓦窰的辽代窰址中也曾出土过。此外有鉄釘、羊足骨、粟（一大盒）等，第二居住址更有石磨。

第二、三、四各室出土了七个大定通宝，其中一个，直徑2.65厘米，方孔，长寬各0.6厘米，边緣寬0.15厘米，厚0.11厘米。

更有长3厘米粗質陶胎外面貼金塗紅的殘塊，就現有长度不能鑒定是否为佛像殘片，1号室內也有这种殘片，它們对于推定第四室究竟为官衙址，抑为寺院址，是值得深入研究的材料。

从以上的房址出土的柱础、炕、鴟尾、板瓦、筒瓦、圓瓦当等特征，我們說它为宋辽系統的建筑是無可置疑的，并且因为圖瓦自治省这个地区历史多屬游牧部族，像这样定居村落址，迄今也只發現这一处。

其次当时使用黑定、宋均、骨刷、棋子等与宋辽城址出土的也完全一样，而粟、磨也反映一定程度的农業生活。

綜合这些，我們贊同Л・Р・科兹拉索夫教授推定它是屬于辽代文化系統的西辽居住址。

至于它的时間，从金世宗的大定通宝来考虑，时間約相当于公元1161年——1189年，也就是自西辽仁宗紹兴11年（1161年）至直古魯天禧12年（1189年）即当西辽中晚期，下限距乃蛮王屈出律夺位不过23年。

如果以上推定無誤，它将証实以下两点史事：

1. 因为多提脇科河遺址發現在东經90°—100°之間，北緯52°左右，所以它将把我国一些历史地圖中的西辽疆域向北延长緯度5°多，約合1000多公里。这样就扩大了过去我們对西辽疆界的認識。

2. 耶律大石所率十八部王众，虽然約万余人，但他們所到之处，仍然保持了辽人受汉化的生活方式，而陶器与石磨又可能出自随从的汉人之手的。

此外在薩魯那魯村、白洋科里其科河两地有石虎，长1米余，也是与我国辽金墓前所見的石虎雕刻是一样的。

更在米努辛斯克發見金代海兽葡萄鏡，上有“承安三年上元日陕西东运司官造监造录事任（押）提控运使高（押）”銘文。

四

附带介紹一下在莫斯科物質文化研究所С・В・吉謝列夫、Л・А・爱芙秋荷娃处所看到蒙古人民共和国喀喇和林城址⑩出土的元代瓷片，关于和林在元史地理志与張穆所著的蒙古游牧記中均有詳細記載。

1949年城址經过С・В・吉謝列夫等人的發掘，知道文化層厚約6米，略以1.5—2米厚度共分三層，忽必烈以前約当11世紀为最下層，中間为元代層，上部为明、清層。在下層中出有漆器，上有“长安柳家上牢”銘文，更有壁画殘片，作風朴拙，一个墨髻加金的佛头上，类似西藏密宗，或为辽代物。

中層上層的層位已經受到了犹乱，如一件龙泉瓷片一部分出在小分層的5層，又一部分則出在9層，即为例証。中層中發見了窩闊台的宮殿址，有64根大柱，多桑蒙古史中說，“其前庭立柱两行以承之”，可供參証。

更發現10处炼鉄爐址，为兵器作坊，兵器熔点

为1350°，非依靠鼓風爐不可。除鉄鏃等外，还有車軸头。

这里出土了十余箱瓷片，可区分为自外輸入的与本地燒造的两种：

Ⅰ外地輸入的：

磁州窑　有白釉黑花罐、碗、四系瓶，黑花分三种：一种为簡单流暢的花飾，一种为稚拙的細笔，一种为近似当陽峪的魚形花紋，此外有白釉上刻花着黑彩的，也有黑釉上刻花的。

黑釉片　有鷓鴣斑釉的，酱黄色釉加繪黑釉的，黑釉黃釉兼半的，黑釉外面着一道弦紋的。其中一大部分，是在这里燒造的。器形以碗为多，也有罐类。东方文化艺术博物館收藏的1件（No.390），上有流暢刻花，口徑13.5，高21.5厘米。

宋、元三彩瓷片在白釉上繪以紅花綠叶，非常艳丽，器形以盘为多。东方文化艺术博物館收藏（No.6.8層）的1件，口徑15.7厘米，高3.5厘米。

琺华孔雀綠瓷片　有青藍釉加繪黑花的，有琺华三彩，一件琺华孔雀綠龙紋三足爐上，底部墨書“天长观”三字，旁边似有“兹益?”三二字，在花紋上有分孔雀綠单色的，加黑花的，平面三彩的，琺华有龙紋、兽面紋、花卉等，蓋产自山西澤州。

粉定片　一件为高足碗，口徑約在7厘米上下，一件更有印花。

景德鎮影青瓷片，胎薄坚硬，釉色艳丽稍厚，有的碟上有梅花，周圍有多瓣花，有的刻花，器形有扁壺等。

龙泉瓷片，釉不厚，有的胎灰釉暗，有雕花大碗，印花双魚洗等。多倫元上都也有这类瓷片。东方文化博物館收藏的（No.453）高足碗，高7.5厘米，口徑11.7厘米，中間有刻紋。

宋均窑片，有紫斑灰藍釉单把洗，菱形花式盘等。

辽三彩片　綠釉地上有黄白彩釉，更有刻花的，多圆盘，不及东北地区出土的辽三彩精致。

綠釉陶片　紅胎，上反“水銀浸”，有大瓮及大罐等。

元青花　出土在6層，釉色有的濃有的淡。更有刻官字白瓷片，与赤峰大营子故駙馬贈衛国王辽墓的鑲金口白瓷上的官字相类。

Ⅱ本地燒造的：

这里發現了窑址，出土有仿均窑及黑釉器，均窑的窑片淡灰，釉也較薄，一件大碗高7厘米，口徑15厘米，黑釉器釉色也不十分純正，以碗类为多，無論上述任何一种，在碗下多有押記、草書、签姓等。

这些字可分以下几类：

姓氏：郜　高　秦　張　王四　郭　謝　徐
　　金土（?）王伯ㄚ　（?）赵

年代：元　和三年

店鋪：李茶記

其他：秀才　□三□　風明月、鉄馬

此外有签八思巴文的。

从以上的一些签字中，有汉族的，也有蒙族的。汉族郭姓最多，但是也有王四这样朴素人民的名字，为多桑蒙古史所說：“比汉人街，工匠所居”，作了注脚。至于李茶記或类現代的茶館，天長观或为道教的寺观，綜合起来，和林發掘的材料，充分反映了元代的經济与人民的生活。

关于这些瓷片的年代，当然自外地輸入的那些，可能早到宋代，但是本地燒造的，則有元代晚期物，因为在一件器足上，中間写“赵老”，旁写“至正四年二月二十日”，这时相当于元順帝，即紀元后1344年。

苏联圖瓦自治省距尔克澤尔城70公里的拜塔克地方，出土了二个青銅犂头和四个鉄犂板，上有至元二十三年字样，苏联历史博物館收藏的一件犂板（圖八），两边有双魚紋，中間有㭍陽字样，蓋为元代物，但П·Л·瓦尔瓦拉博士說，最近阿巴干又出土了几件，她推定是汉代的。

最后，高加索馬薩魯城斯透魯巴里斯基地方出土了十四世紀韃靼人居住地址，有磁州窑瓷片，多碎笔稚拙的花紋，更有綠釉陶片等，还有冠状器蓋、磨光石球等。

五

綜合上述考古材料，說明了以下两个史实：

1. 苏联自远东中經西伯利亚以迄中亚凡是与中国毗連的地方，都發現了中国的文物，这就証明了中苏两国文化交流的地域性是非常辽闊的。其次商、周、汉、唐、金、西辽、元各代的文物在苏联均有發現，这就証明中苏两国文化交流的时間是貫串了各个时代。如此地域之广，时代之长，也正闡明了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誼是有它的历史傳統与基础的。我們都为中苏两国在历史上就有了文化的交流而驕傲，我們都为在历史上就有了长远的友誼而欢呼。

2. 苏联赤塔發現的鬲，証实了中国陶鬲的影响范圍很广。巴澤雷克出土的战国四山紋鏡，証实了中西交通的开始时間比汉代还要早些。在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發現的匈奴城，也証实了农業氏族与牧畜氏族發展的規律是差不了多少的，糾正了我們以为匈奴是落后部族的看法。克澤尔的西辽居住

址，也丰富了我們对西辽物質文化的認識，諸如此类，都是苏联考古学者們对中国历史偉大的貢献，都是苏联考古学者們不朽的業績。

最后，讓我們高呼苏联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紀念万岁，祝苏联考古界获得更大的成就，願中苏两国考古学者共同努力，开展这方面的科学研究。（本文插圖見8—10頁）

注釋：

1. 苏秉琦：瓦鬲的研究　斗鷄台沟东区墓葬附录　1948年　圖二。
2. 內蒙古自治区文化局文物工作組：內蒙古自治区發現的細石器文化遺址。考古学报1957年1期10頁
3. 李济編潘慤繪　殷虚陶器圖录　1947年13—14幅
4. 裴文中：中国古代陶鬲及陶鼎之研究　現代学报　1947年　1卷，4、5期合刊，44頁。
5. 梅原末治　アルタイ地方に于ける考古学上の發現（古代北方系文物の研究）　1938年194—196頁。
6. С·И·魯金科：論中国与阿尔泰部落的古代关系（考古学报1957年2期48頁后圖版壹）
7. 刘敦楨　中国住宅概說　1957年圖38。
8. Л·А·Евтюхова: О племенах центра льн-ой монголии В IX В. (Советская Археология1957, 2,205—227 с)

   Л·А·爱芙秋荷娃：九世紀蒙古中部的各个部族。（苏联考古学1957年2号，205—227頁）
9. 布莱資源納德著梁园东譯：西辽史13頁。
10. С·В·Киселев: Древние города монголии (Советская Археология, 1957,2,205—227 с)

    С·В·吉謝列夫：蒙古的古代城市（苏联考古学1957年2号　97—99頁）。

列宁格勒十月革命博物館在最近开幕

筹备二年多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博物館在列宁格勒正式开幕。地址是在从前联共(布)党中央委員会和彼得格勒市委員会的旧址。当年列宁同志和他忠实的战友們，在这里进行了偉大十月革命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列宁曾經在这里接見了無数工人、士兵和波罗的海艦队的代表們。成千成百的人們到这里来領取党中央和市委会的命令。为了紀念这难忘的岁月，光榮的年代，苏联党和政府决定在这里建立博物館。

博物館的筹备工作和無数曾經参加十月革命和內战的老布尔什維克是血肉不可分割的。通过艰苦的工作，已征集到数千件左右实物、文件、宣傳画、旗帜……。目前展出的又有四千件左右。老布尔什維克热情地帮助館的建立而捐献文物、回忆往事、提供綫索……。如C·M·布琼尼，参加十月革命的老同志送給博物館一支那干式七輪手槍(号碼12609)，他在信中写道：“这支手槍是我从1917年起和革命的敌人邓尼金、佛兰格林等作战时用的。它和我的生命紧紧地联在一起，不止一次地挽救了我的生命”。1918年入党，曾参加过內战的老布尔什維克A·A·格罗新，送給博物館他在1920年7月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証；1940年入党的老战士З·П·費林波夫斯基送給博物館一付脚鐐手銬，是他在流放时曾用过的。这些珍貴的实物是有强烈的感染力和說服力来帮助观众去了解这些偉大的历史事件。

观众从用血写成的历史事件中受到阶級教育而去为共产主义事業劳动、战斗。

博物館共分四个大厅。第一陈列室中簡要地叙述了俄罗斯工人运动的萌芽，1883年成立的第一个俄国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列宁为建立战斗的馬克思主义政党而斗爭。主要陈列品有很多原版的“火星报”及馬克思主义著作。

第二个陈列室主要陈列1917年十月革命前布尔什維克党出版的报紙，好几个陈列柜用来陈列“眞理报”的原版。

第三个陈列室是該館的中心，主要是陈列十月武装起义在彼得格勒及俄国其他城市，第二次苏維埃代表大会。这里有很多無价之宝，它們是稀有的实物、文件和照片。在观众面前展示出那英雄年代、战斗的年代。

第四个陈列館叙述了偉大十月革命对世界無产阶級运动的影响和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独立解放运动的影响。

在庆祝偉大的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高潮中，这个新成立的博物館将吸引苏联二亿多劳动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注意和关怀。（罗歌寄自莫斯科）

苏維埃政权初期的博物館建設与文物保护工作〔注〕

（一）

苏联　B. K. 格尔达諾夫

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紀元，同时也为世界上最先进的苏維埃文化建設事業奠立了基础。

苏維埃文化繼承了人民群众在以往历史过程中所創造的一切最进步的事物，而作为这种前所未有的新型文化建設事業的基础和决定性因素，乃是苏維埃的社会制度和国家制度。共产党和苏維埃国家，为了使苏維埃文化的發展配合苏維埃人民建設共产主义，为了使苏維埃文化滿足人民的真实需要，并且协助人民登上共产主义的高峰，做了堅持不渝的努力。

苏維埃文化是在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理論基础上發展起来的。这就保証了苏維埃文化遵循着正确的总路綫發展，使它成为具有高度思想性的、真正人民的文化，使它立足于我們时代唯一科学和革命的世界观之上。

在苏維埃文化的建設事業中，共产党的偉大締造者和領袖列宁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早在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前，列宁就着手制定無产阶級专政建立以后，在建設新的、社会主义的文化的事業中，党和工人阶級所应当遵守的基本原則。列宁提出了在革命的馬克思主义政党的領导下，工人阶級文化的党性和社会主义思想性的原則。

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共产党和苏維埃政府开始在科学、文化和教育領域中进行了巨大的改造工作。在領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設方面苏維埃国家的实际創造活动的同时，列宁对于各种資产阶級和小資产阶級見解的"理論家"、集团和"学派"、干涉者和搗乱分子进行了斗爭，如果不这样做，要想建設新的苏維埃的文化是很困难的。

列宁对苏維埃社会文化的見解，是根据人类文化發展历史繼承性的馬克思主义論点提出的。列宁教导我們，苏維埃社会主义文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前輩們在文化方面創造的一切先进和优秀的事物合理發展的結果。列宁一再指出，已經取得胜利的無产阶級的最重要的任务，乃是掌握过去的文化遺产，使它成为全民的財产，使用旧世界的文化珍品来建設新的、更高級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文化。因此，从苏維埃政权建立的最早的日子里，列宁就号召工人阶級和所有俄罗斯的劳动人民"……夺取旧社会关系所創造和遺留下来的文化，作为社会主义的物質基础。"

遵照列宁对过去文化遺产的估价，共产党和苏維埃政府决定了关于博物館建設和文物保护主要問題的政策。

苏維埃博物館乃是苏維埃文化不可分割的一个組成部分。从开始成立起，它們的任务就是征集、保管和研究文物，使这些文物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科学教育和共产主义教育的泉源。

为了保証人民能够充分掌握过去的文化遺产，使那些过去为剝削阶級私有、专利的偉大文化瓌宝，今天能够为劳动人民所享有，共产党和苏維埃政府在苏維埃政府的初年，对于博物館建設和科学、历史和艺术文物的保护工作，做了許多艰巨而复杂的工作。

在这些年代里，建立了保护文物的严格、周密的制度，将所有最重要的古物和艺术品、所有最重要的科学珍品收归国有，使博物館成为国家文物的主要收藏所。

正是在这个时候，博物館以空前的規模發展了文化教育工作，成为教育劳动人民的真正基地。

苏維埃博物館事業在这些年代能够有这样的成就，是与列宁的經常关怀分不开的。在他的直接指导下，共产党和苏維埃政府根据新的社会主义的原理在保护文物和籌建博物館方面，頒布了許多重要的法令。

在列宁指导下制訂的，苏維埃政权关于博物館建設的主要法令，决定了我国博物館事業进一步發展的道路，使这个事業成为世界上最先进、最民主的事業。

因此，研究苏維埃政权初年博物館事業的历史，在学术上和政治上都是有益处的，对于博物館建設事業，具有現实意义。

* * *

从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初年起，共产党和苏維埃政府，为保管文物采取了紧急的有效措施。在所有大型博物館和首都的皇宮中都派遣了专任的政府委員，他們的任务是組織艺术和历史珍品的保护工作。

人民教育委員卢那查尔斯基，根据人民委員会的法令，領导了前宮庭部的所屬机关，埃米尔塔什、俄罗斯博物館、彼得格勒皇宮以及它的城郊的一些博物館。卢那查尔斯基同志以苏維埃政府的名义，告誡这个机构的所有职員：“为保护人民在皇宮和博物館的財富，必須对革命政权負責。”

政府委員的职責是监督人民財产的保护工作，如“有严重違反人民利益的情况”，则撤消其前宮庭部負責人的职务。

冬宮的修整工作受到人們的特殊注意，因为資产阶級临时政府曾企圖在这里以武装和起义的人民作最后的抵抗。

領占冬宮以后，苏維埃政府立即頒布了加强冬宮保衛工作和清点冬宮財产(其中包括許多历史和艺术的珍品)的法令。担任冬宮保衛工作的，有近衛联队的衛兵和赤衛軍的特别派遣队。1917年11月5日（1917年的日历均按旧历計算），政府对“1917年10月25到26日夜間坚守崗位，保护冬宮全民財产的宮庭服务人員”，明令表示感謝。随后，在1917年11月8日又公布了“前宮庭部艺术文物和古代文物的保护办法”，明令登記普查彼得格勒各庭宮、皇村、加特欽那和彼得果夫的所有財产，編制“一切值得注意的优秀艺术作品和具有历史意义物品”的清册。

苏維埃政权把文化珍品的保护工作，看成劳动人民的切身事業，劳动人民应当用主人翁的态度对待这个事業。苏維埃政府認为必須向工人和农民們說明十月革命給了工农群众过去为統治剝削阶級所私有的一切物質和文化的珍品。

1917年11月3日，人民教育委員部頒布了致“工人、农民、士兵、水兵和俄罗斯全体公民書。”在这个文件里，有这样一段話：“除了自然財富以外，劳动人民还繼承了巨大的文化財富：华丽的建筑物，博物館，充滿着稀有的、絕美的、能够丰富精神生活的物品，保有了許多精神食粮的圖書館等等。

所有这一切現在已經眞正屬于人民了。所有这一切将帮助穷苦人民和他們的子女，迅速超过以前統治阶級的教育水平，使他們成为新人，旧文化的拥有者，前所未有的新文化的創造者。

同志們，我們应当珍惜这份人民的財产！”

許多事实証明，人民正确理解了苏維埃政府关于保护文物的措施，以异常珍惜和热爱的态度对待文物。

純朴的人民为了保护文物而自我献身的例子，可以从夺取冬宮的赤衛队員們身上看到。如所周知，在攻击临时政府借以作为要塞的冬宮的时候，許多工人、水兵和士兵冒着生命危險，不但尽量保护冬宮本身，而且去保护宮中的珍品。結果冬宮沒有受到什么損失，而埃米尔塔什博物館才能完好無缺的保存到今天。

在十月革命最初日子里，有一个与埃米尔塔什历史有关的故事，是人民对待文物态度另一生动的例子。一天清早有个水兵走到埃米尔塔什，拿出一个銅制小立像給博物館登記，这个銅像是他在軍委領导下占領塞尔基耶夫街一个公館时發現的。后来一看这个銅像不过是工厂大批制作的物品，当然，这位水兵并沒有想到这点。

在英勇的赤衛軍的战士中，像这位無名水兵拿着小銅像到埃米尔塔什来的，还有許多，正如人民委員卢那查尔斯基代表苏維埃政府所指出来的那样，“在珍重人民宝庫的事業中，赤衛軍是值得崇敬的典范。”

由此可見，在苏維埃政府的最初日子里，苏維埃政府和全体劳动人民对于过去的文化遺产就采取了珍重、热爱的态度。

* * *

苏維埃政府，把保护文物，集中文物在博物館里以供科学和文化教育工作全面利用，看成是国家的最重要的任务，为領导我国的博物館建設事業，曾經責成人民教育委員部建立专門的国家机构。

根据依·埃·格拉巴里的回忆，人民教育委員部遵循列宁的指示，于1917年11月設置了俄罗斯博物館和古代艺术文物保管事業委員会。参加这个委員会的，有科学和文化界的許多知名人士。委員会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这两个大型博物館集中的城市，設立了常委会。

1918年5月，人民教育委員部附設了博物館局，領导全国博物館工作和文物保护工作。

在地方先是設立俄罗斯博物館管理委員会，1918年12月开始組織县立的博物館和古代艺术文物保护事業处，这个处附設在地方人民教育局的下面。这个时期，全国各城市差不多都有的地志学会，在發展地方的博物館事業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紅軍与白衛軍、外国干涉者作战地区，文物保护工作，由前綫司令部和軍区司令部所屬单位負責。

参加博物館建設事業的，还有科学院和1918到1919年設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和物質文化历史研究院。

这样就保証了文物保护与博物館建設工作在苏維埃时期的組織領导与学术領导。

苏維埃国家不仅把一切优秀文物看成了人民的財产，而系統地、有計划地使博物館的珍貴文物收归国有，并且使这些文物为文教和科学事業服务。

首先归国有的，是以前沙皇的宮殿，也就是彼得格勒、莫斯科及其近郊的博物館。

然后，对于收归国有的宫庭財物中具有博物館意义的藏品，进行了紧張的挑选工作。这件工作的規模可以从下列的資料判断：1919到1921年，仅从冬宮移交給博物館、俱乐部、幼兒园、学校的藏品，如瓷器、洋磁和銅器，就超过两万九千件，其他日用品（如衬衣、連衣裙、家俱等）也有七万五千多件。

由以前皇宮挑选出来的艺术和历史文物（傳世品），則用来充实埃米尔塔什博物館、俄罗斯博物館、其他中央博物館及地方博物館。

随着宮庭博物性質的珍品收归国有以后，列宁倡議将社会上和私人收藏的重要文物捐献給国家。格拉巴里回忆地說到：“人民教育委員部博物館事業和古代艺术文物保管局的首要任务，是制定关于私人收集的艺术文物国有化、关于艺术作品的登記和保管、关于特罗伊茨·塞尔基耶夫修道院收归国有的法令。这些法令的倡議人正是列宁。有些法令是我們先拟好，交給他批准的，有些法令如像私人藏品和修道院收归国有的法令，他还亲自修改，这就大大加强了保管工作主要負責人的責任心。”

在解决某种博物館收集品国有化問題时，列宁的着眼点是对于發展社会主义文化，由国家建立統一的、受到苏維埃政府領导和指导的博物館网有無利益。与此同时，列宁認为博物館珍品的国有化，乃是保存这些珍品和利用它們为文教事業服务的最好方式。不难理解，国有化所着眼的，只是那些最优美的古代艺术文物。某件博物館收集品的国有化的事实本身，就意味着苏維埃国家認定这件收集品在科学上、历史上或艺术上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人民委員会关于特列契雅可夫斯基与苏金斯基画廊收归国有的法令，就更加充分地体現了列宁的观点。

在1918年6月3日（旧历5月21日）人民委員会的法令中，說明了特列契雅可夫斯基画廊收归国有的理由：“鑒于莫斯科特列契雅可夫斯基画廊，按其文化和艺术上的意义，乃是一个能够起到全国教育作用的机关，工人阶級要求特列契雅可夫斯基画廊納入全国博物館网，使其全部活动受到人民教育委員部的指导，本委員会决定：

1、莫斯科特列契雅可夫斯基画廊收归俄罗斯苏維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教育委員部管轄，其办法与一般国家博物館相同……。”

1918年11月5日人民委員会关于苏金画廊收归国有的法令，也同样体現了列宁的原則，也就是将在人民教育事業中具有全国意义的有高度艺术价值的文物轉变为人民的財产的原則。

按照苏維埃政府在1918到1919年頒布的法令，在莫斯科收归国有的有馬罗索夫等著名人收藏的文物。

与此同时，彼得格勒大地主和大資本家尤斯普霍夫等人私邸和公館所收藏的历史与艺术文物也收归国有。

在将莫斯科、彼得格勒和国內其他城市的重要文物收归国有的时候，苏維埃政府还将地主庄園里收藏的历史艺术文物收归国有。

1917年10月25日第二次苏維埃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的关于土地的法令，沒收地主土地上的私产，同时要把“貴族之家”集聚的文化珍品交給人民。

列宁非常重視地主財产中珍貴文物的保护工作，使它們随着苏維埃政权的建立变成劳动人民的財产。1918年11月8日在致农民的信中，列宁号召农民珍視过去地主的珍品，因为它們現在已經轉变为全民的財产，人民应当自己起来保护它們。”

列宁要求地方苏維埃政权在收地主財产为国有的时候，要遵守严格的制度，对于一切文化珍品应詳細登录，要把这些珍品保存在不受損坏和盜窃的房屋中，任何劫掠企圖应受到革命法律的严格制裁。例如，1917年12月6日致奥斯特罗果什苏維埃主席的电文中，关于保护地主領地上珍品一項，列宁写道：“詳細登記珍品，置放在安全地点。必須对保管工作負責。庄園就是人民的財产。如有偷盜情事，必須明令法办。”

在一般的收归国有的地主庄園之中，有520个具有特殊文化价值的貴族庄園选作博物館机构。拥有文物的庄園，大部分都在莫斯科省（占155个）。其中知名的庄園博物館，有阿尔汉格尔斯克（前尤苏波夫）等等。

其他各省受到博物館机关保护的庄園，有庫尔斯克省伊凡諾夫村巴拉金公爵的庄園以及格魯津（前阿勒克契耶夫）等人的庄園。

在列宁直接領导下苏維埃国家所进行的历史艺术文物国有化的工作，以大量的具有历史和艺术主

要价值的文物丰富了博物館的藏品，使得博物館成为国家保管文物的主要場所。

• • •

苏維埃政权关于文物保管和国有化的措施，引起了已經被推翻的剝削阶級的瘋狂抵抗，他們把历史文物和艺术文物隐藏起来、拍卖掉、运往国外。

1917年10月革命前夕，地主和資本家們慑于革命的發展形势，开始拍卖自己資产的最貴重的一部分。結果市場上出現了許多古代艺术文物：武器、圖画、瓷器、水晶、家俱、宝石制成的艺术作品、金屬艺术制品等等。

十月革命以后，历史和艺术珍品的拍卖和走私的情况达到了更大的規模。各种投机分子和买办，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大肆收买古物，其中包括古代俄罗斯的聖像、圖画、水晶，十八世紀后半叶和十九世紀初俄罗斯工厂制造的、欧美評价很高的瓷器，以便运銷国外。

苏維埃政府，对于古代和艺术珍品走私帶給国家的严重威胁，不能置之不理。1918年5月30日在人民委員会会議上，前侯爵夫人美歇尔斯卡娅企圖将十五世紀意大利波奇切尔画派大师的作品“馬多娜”运到国外去的案件，作为重大的国家案件展开过討論。对于这个問題，苏維埃人民委員会作出了以下的决定。“根据确鑿証据，美歇尔斯卡娅企圖将所收藏的波奇切尔（东多）名画运出国外，鑒于此画具有特殊重要的艺术价值，人民委員会决定：此画收为俄罗斯苏維埃联邦共和国所有，交由国家博物館保存”。这个决議指定人民教育委員部拟訂“关于禁止将圖画和一般具有高度艺术价值的文物运出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国境法令的草案，并将此草案呈交人民委員会批准。”

随即，人民教育委員会撥出专款，在市場上收購可能被物主运銷国外的艺术文物。

从上述苏維埃人民委員会的决議可以看出，列宁重視文物禁止出口的工作，認为必須采取紧急措施，因此他給人民教育委員部三天时間来拟制适当的草案。然而人民教育委員部耽誤了拟制这个草案呈交給苏維埃人民委員会的时間，因此“关于古代艺术文物禁止出口”的法令直到1918年9月19日才經由苏維埃人民委員会审查批准。

这个法令，对于說明苏維埃政权对文物禁止出口的政策，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論証：“为了防止具有重要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的文物运出国外，造成人民文化宝物的損失……。”

这个法令禁止“将古代艺术文物运离加盟共和国国境外販卖”，事先征得人民教育委員部博物館局的許可者例外。法令还責成进行古代文物貿易的商店、寄卖行和古董商人，或間接进行此种貿易的商店和个人，在这一法令公布后三天以內到人民教育委員部博物館局去登記。如有違犯此法令的情况，“应受到革命法律的严格制裁，由沒收財产到判处徒刑。”

苏維埃政府借这个法令粉碎了資本家和地主用文物走私的企圖，使年輕的苏維埃共和国免受損失。

苏联文化建設的需要、苏維埃科学和人民教育的發展，要求清点、登記与保护我国一切文物。

1918年10月10日人民委員会頒布了“关于私人、社会团体和机关所收藏古代艺术文物后进行登記、驗收和保护”的法令。这个法令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将一切文物收归国家保管，而不論其原所有者为何人的法令。法令責成博物館局担負起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凡紀念性和实物性的古代艺术文物，不論物主何人，亦不論系成套抑或单件，均应代表国家进行登記。”从此一法令公布之日算起，在一个月的期限內，古代艺术文物物主必須持文物清册呈交博物館局。法令指出，非經博物館事業管理委員会的許可，不得轉讓（包括販卖）、移动和修理經过国家登記的文物。对于已登記文物的物主，發給专用的保护执照。法令明文規定，非經国家許可，已登記的文物轉手給新物主者，应予以沒收。法令并且允許博物館局在私人不能提供必需的文物保护条件的情况下，可以从私人收回古代艺术文物。

法令中所規定的上述措施，旨在保护、研究，并使人民群众充分認識我国的古代艺术文物。从而使一切文物轉变为全民財产的事業推进更其重要的一步。

紧跟着古代艺术文物的国家登記和保护法令，还頒布了列宁的关于保护科学珍品的法令。这个法令經列宁于1918年12月5日簽字，指出：“为了保护科学珍品，并防止受到可能的損失，正确使用和正确分配，人民委員会决定：

1. 責成人民教育委員部科学局，采取必要措施登記和保护俄罗斯共和国領土上的一切科学珍品，如：科学博物館、搜集处、保管所、实驗室和构筑物，科学設备、仪器、参考書等等，并且把它們交給适当的科学或教学机关管理，或由自己直接管理。

2. 如有不执行科学局决議，不貫徹此一法令的失职人員，应受到革命法律的严格制裁。”

由于这一法令的頒布，国家可以采取統一的措施，保証一切文物無例外地經过严密的登記和受到

保护。

苏維埃国家，史無前例地宣布了文物作为人民的財产不可侵犯的原則，直接保护一切文化遺产、人类天才的創造物，所有的科学与技术的作品以及所有古代艺术文物。

* * *

苏維埃政权初年关于文物保护的一些法令，是在国內战爭和外国軍事干涉时期，进行残酷的阶級斗爭的条件下实現的。

地主、資本家及其僕从，千方百計地設法盜窃、隐藏文化珍品，使它們不为人民所有。然而广大的劳动人民群众却滿怀热情地支持这些法令，对于实現这些法令給了国家机关巨大的帮助。城市中的工人，农村中的农民对于資本家和地主藏匿、偷运文物保持了高度的警惕性。

全俄肃清反革命非常委員会的机构，在这些年代中对于防止文物受到偷盜，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根据人民委員会的指示，肃反委員会也注意了文化保护事業。

全俄肃清反革命非常委員会通知了各省、县、边疆区的肃反委員会“与盜窃人民財产的無耻行为作坚决的斗爭”，在發現贜物和藏匿文物的情况下，应“予以沒收，送交有关苏維埃部門，如果苏維埃無此部門，則可通知人民教育委員部。”

标題为“反对盜窃艺术文物的措施”的傳单，就是由全俄肃清反革命委員会印發国內各地的，它們引起了自觉的苏維埃公民們的注意，并动員他們去与盜窃文物的人作斗爭。苏維埃的公民們在这件工作上也对地方的肃反委員会表現了积極的援助。

由于有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同情和支持，有着地方苏維埃和全俄肃反委員会机构的积極协助，博物館局才能做好許多重要的工作，如挑选、登記文物，把大量的历史艺术文物、科学珍品，集中在博物館和其他国家的保管单位里。

这些措施是很及时的，因为在許多私邸和庄园中，珍貴的文物置于听天由命的境地。有些物主抛弃自己的住所时，把許多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物与艺术文物封塞在屋里，或埋藏在地下室中，如不及时發現，就会因潮湿和冷冻等等遭受損失。例如在彼得格勒，就發現有大量的物品封閉在尤苏波夫、苏瓦洛夫的私邸中，在莫斯科新巴斯曼街公爵哥里津的住宅中，經全俄肃反委員会搜查，發現13普特的黃金，約莫10普特的銀器，这些銀質器皿都有很大的艺术和历史价值。在这些器皿中甚至还有十七世紀的东西。

从彼得格勒的官邸中，博物館部門收集了三万件以上的具有艺术或历史价值的文物。此外，在这里面發現了許多由金屬和宝石制成的艺术制品。例如，在尤苏波夫家中，找到了70普特各种銀制品和33鎊金器，四大箱貴重物品；在舍列蔑切夫家中找到了7普特以上的金器，44普特銀器；在斯特罗甘諾夫家中找到50普特銀器；在波别林家中找到2普特金器等等。

現在所有这些貴重物品均保存在埃米尔塔什武器陈列館和其他国立的保管所中，如果苏維埃政府不采取及时的有力的措施来查出和保存这些貴重物品，国家就会遭受到不可弥补的損失。

在調查博物館性質的珍品时，对于古玩商店也非常重視。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两地調查过25家古玩商店。首都博物館部門的专家从中排出了22139件具有博物館意义的文物，交給国立博物館收藏。

人民委員会的法令“政教分立，教堂与学校分立”頒布以后，博物館局执行了这个法令的第13节，即将教会和宗教社团的所有財产收归全民所有，登記教堂和寺院中收藏的优秀的俄罗斯艺术文物。在1918到1923年五年之內，調查了2350多个教堂和寺院，清点了一万多件俄国古代繪画作品，两万五千件俄国古代实用艺术品。

人民委員会于1918年10月10日頒布的，关于国家登記和清点古代艺术文物的法令，首先考虑的是文物的保护工作。但是由于已被推翻了的阶級抗拒这个工作，为了国家机构便于調查、清点文物，苏維埃政府在許多情况下应当把那些起先沒有国有化的具有博物館意义的和私人收集品掌握到自己的手中。首先对于那些对苏維埃国家藏匿文物、轉卖文物或盜运古代艺术文物的人，应当采取这些措施。

应当特別指出，苏維埃政府并不允許把屬于劳动知識分子所收集的古代艺术物品收归国家，而且認为这种作法是錯誤的，因为学者、作家、演員、艺术家等等需要从事創造性的活动。根据上面所讲的1918年10月10日人民委員会的法令，对于掌握文物收集品的劳动知識分子，应授予特別保管执照，并且給他們各种帮助，替他們創造保护这些收集品的必要条件，例如修繕房屋、优先領取燃料、供应保存与修复所必需的工具和資金等等。

在国內战爭和外国軍事干涉的艰苦条件中，文物必須从作战地区和接近前綫的地带疏散。这里应当說到紅軍的指战員和战士对于文物的深切的关怀。在这一方面，紅軍繼承了赤衛队的光荣傳統。紅色游击队員对于保护博物館珍品也起了模范作用。

为了疏散价值最高的文物，全俄罗斯博物館和古代艺术文物保护事業委員会，命令地方的代表，在紅軍部队、地方苏維埃和社会团体的协助下，正尽艰苦地把文物护送到安全地带。

特别要紧的是从已經收归国有的地主庄园中疏散文物。在国内战爭时期，共有250个貴族庄园，将三万册書和五万件实物运往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博物館藏品保管庫中，在这些文物里，有135种圖画、木刻、瓷器、銅器、古錢、紀念章等大宗收集品。

在疏散的文物之中，有非常珍貴的考古收集品，許多古籍書和手稿，优秀的艺术作品，其中有罗科托夫、特罗比宁、吉別林、巴罗維可夫斯基等著名俄罗斯艺术家和西欧的艺术家的圖画。

这些具有博物意义的收集品，多数都面临着丧失的危險，因为它們都放置在直接作战的地区，往往是在白軍占領当地以前几小时里运走的。如所周知，在杰尼金和高尔察克軍队占領区里，祖国文物遭受到了多么可怕的破坏。搶劫、运走、毁坏苏維埃政权时代已經成为人民財产的珍貴的文物，在白軍匪帮看起来，是一种"神聖的"天职。我們記得，馬蒙托夫的襲击时期，許多具有高度艺术和历史价值的文物，几乎瀕临毁灭的境地。

苏維埃政府在对苏联各族人民和俄罗斯人民的文物，进行国家保护的同时，也采取相应的措施保护革命前屬于俄罗斯帝国的波兰、立陶宛、烏克兰和其他民族的文物。

苏維埃国家把文物看成人民公有的財产，認为必须保存并且归还以前受到帝俄压迫的各族人民的文物。这些文物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上的价值，它們是在沙皇专制时代被沙皇夺走的，或者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迁运后方的。对待民族文化和历史文物的这一政策，乃是共产党对于民族問題总政策的一部分。

共产党和苏維埃政府对于民族历史文物、民族遺物十分尊重态度，明显地表現在1917年11月24日工农兵代表中央执行委員会所通过的决議中。决議規定将历史文物：旗帜、将軍旗、敕書等叶凱德林二世在位时期沙皇制度从烏克兰夺取的历史文物，归还給烏克兰人民。

1918年元月19日人民委員会頒布了"关于保护波兰人民古代艺术文物"的法令。法令声称："鑒于俄罗斯共和国西部和西北部諸省許多城市和庄园中，有波兰籍的居民保存的、对波兰人民有重要艺术价值或历史价值的物品，这些物品多数是在俄罗斯軍撤退时和撤退前疏散的，为了把这份物品完好地归还給全体波兰人民，为了革命政权領导人民委員会作出决議如下：

1. 古物和艺术品，圖書館、档案处、圖画和一般具有博物意义的物品，……在轉交給波兰人民博物館之前，不論位于何处，作为波兰人民的民族財产，一律受到工农政府政权机关的保护"。地方苏維埃負責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波兰的文化珍品，并且尽可能协助将此类文化珍品运至政府所指定的地点。对于这个法令执行情况負責的，有民族事务人民委員部和人民教育委員部。

根据这一法令，人民教育委員部和共和国人民財产委員部責成俄罗斯苏維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所有博物館、宮殿、圖書館和其他艺术品和科学保管所，清点战爭时期疏散的波兰人民的文物，并通知他們的民族事务人民委員部。

1918年11月19日人民委員会"关于自立陶宛疏散撤退国立、公立和私立机关、企業、財产、資金等項"的法令得到通过。法令指出应将一切"科学和艺术物品，具有历史意义的物品"移交給民族事务人民委員部，以便将这些物品归还給立陶宛人民。

〔注〕 1917—1920年

（偶冰节譯下期續完）

向苏联专家学習

——新　星——

世界人民喜庆的节日——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节四十周年紀念日来临了。全世界的劳动人民，都以無比兴奋的心情来庆祝这个偉大的节日。

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紀元。它首先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苏联，摧毁了資本主义制度，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引向人类进步的灯塔。它的光輝的照耀着全世界人民为謀求解放，擺脫貧困压迫、奴役的道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領导下，沿着这条道路，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并且今天正滿怀信心的建設着自己的社会主义社会。毫無疑問，这些成就的取得，是与馬列主义在中国的胜利、苏联的無私援助分不开的。

从我国的博物館事業来講，也無例外地，和其他方面的建設一样，得到了苏联先进經驗与专家同志們的帮助。例如我国的第一个新型的地志博物館——山东省地志博物館，就是吸取苏联的先进經驗結合我国具体情况办起来的。

我国为了进一步学習苏联博物館方面先进的經驗，曾于一九五五年組織中国博物館工作代表团去苏联訪問。苏联又在今年四月組織以B·B·巴甫洛夫同志为首的苏联博物館代表团来中国訪問。在这些广泛地接触中，不仅互相交流了經驗，尤其对我們来說，学到了更多宝貴的知識，这对發展我国博物館事業与文物保护事業上有很大的帮助。而且加强了中苏两国人民之間的友誼，尤其是两国博物館工作者之間的友誼。

在这次苏联博物館代表团来我国訪問期間，我曾参加过一段工作。时間虽然只有几天，但专家們認眞的工作态度，却給我留下了深刻不可磨灭的印象。我願借此庆祝十月革命节的机会，将記忆中的片断介紹出来，作为我們学習的榜样。

专家們留給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一切为了工作。他們要求自己能在比較短的时間內，給中国同志以尽量多的帮助。他們总要求自己多看些，多听些，多与中国同志們接触，而不願意多休息。他們說："我們准备回答你們一千个問題，一万个問題"。又說，他們来我国的任务是学習和工作，并不是游覽和旅行。为了工作，不顧疲劳的精神在专家身上是表現得很突出的。例如在上海工作时，他們一天連續工作过十四小时，回答过四十个問題。在北京参观了明十三陵（他們都是五、六十岁的人）步行了不少路程之后，仍不顧疲劳，又繼續参观了中央自然博物館。一天在北京参观玉器与漆器工厂后，还有两处要参观，一处是徐悲鴻紀念館，一处是西郊动物园。漆器工厂离西郊动物园是很近，而B·B·巴甫洛夫同志又是很喜欢鳥的。但是当时根据所剩下来的时間，只能看一个地方，二者必舍其一，結果专家去了徐悲鴻紀念館而沒有去西郊动物园。为了能密切美术学院与博物館在培养干部方面的联系，他們亲自訪問了中央美术学院同志，向他們說明美术学院应为博物館培养干部和博物館也是美术学院学生实習的最好場所的道理，并介紹了苏联的学校与博物館之間建立非常密切的联系的情况。

总之一句話，他們把我們的事業就看作为他們的自己事業一样。当他們了解到中国博物館在解放以来做了不少工作以后，感到非常高兴，为博物館中的丰富的藏品感到驕傲。他們說，根据这些材料，可以重写中国的艺术史。他們在临行前的座談会說："如果談的話对中国博物館同志有帮助的話，才算完成了我們的任务"。

苏联专家留給我另一个印象是他們的学習精神。他們在参观北京历史博物館时，看得很仔細，常提出許多問題要中国专家作解釋。例如他們提出了。商代銅器的花紋很精細，为什么到了周以后就簡单朴素，孔子在中国历史上評价如何等問題。对重要的文物时代、来源、特征等都作了記录。有时还将圖表模型画下去，晚上回到宾館中进行整理与追記。就是在安排休息游覽的时候，他們也非常关怀中国古迹文物保护工作。如他們在南京参观了六朝古迹，在苏州参观了园林和宋代古塔，在杭州参观了六朝、宋、元石刻造象，在北京也游覽了天壇、十三陵等地。这样做的結果是既游覽了也工作了又学習了。

苏联专家們所留給我的再一个印象就是节儉的精神。三位专家，我們原为他們准备了三間房子，但他們只要了二間，他們說二位女同志住一間就可以。坐小汽車也是如此，加上翻譯工作人員經常就有四个人乘車，比較挤，我們为他們准备两部小汽車，但他們只肯要一輛。

这些，虽然只是专家們工作、生活中的一些片断，但足可以說明专家們对我們的深厚友誼和他們的优良工作作風。因此，不仅值得我們感謝和永志不忘，而且更值得我們学習。

在反右派斗爭战綫上

揭穿了冒牌考古学家右派分子韓維周的反党陰謀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的冒牌考古学家、右派分子韓維周，一貫地反对共产党的領导，抗拒历次政治运动，誣蔑党的干部政策，反对中央制訂的文物工作方針，否定河南省文物工作成績，并企圖要党“下台”，揚言要收拾“殘局”。这个政治野心家的罪恶陰謀已为文物工作队全体职工所揭穿了。

一、韓維周反对共产党对学术机关的領导

韓維周一貫仇視党。在整風运动初期，有人劝他給党提意見，他憤忿地說：“再提意見，还不是共产党的領导！”說：“机关所以搞不好，是因为学术机关，政治領导”，“党上不懂業务”；“外行不能領导內行；省文化局不能領导文物工作队；文物工作队需要中央一級的专家領导才行”。在大鳴大放中，他毒恶地攻击党，說：“想發揮非党知識分子（实际上是指他这位冒牌专家）的作用和搞好党群关系，領导上必需首先撤掉‘崗’”等等。（指省文化局文物科和文物一队里的党、团員和积極份子，“撤崗”是指撤消党对文物一队的領导）他企圖搞垮共产党后，由他出来收拾“殘局”。

二、反对中央制訂的文物工作方針，企圖使資产阶級的考古学复辟

几年来，河南省根据中央所提出的配合基本建設进行文物發掘保护的方針，保护了大量珍貴文物，而韓維周却長期反对这个方針。他說：“郑州的考古發掘没有重点，没有計划”；“不能光跟着基本建設跑”；“新社会給考古工作带来了不可克服的矛盾和困难。”他反对省文化局提出的“文物工作不能影响基本建設”的口号。他想在河南省恢复資产阶級的考古学，坚持为考古而考古，使考古工作不为基本建設服务。他想使人民的考古事業倒退到国民党反动統治时期那种極其悲慘的境地。

三、誣蔑党的干部政策，謾罵領导干部

韓維周說：“共产党培养奴才，不培养人才”，又說：“服从党的領导，积極工作的人是奴才；反对党，消極怠工的人是人材。”他并反对党培养新生力量的措施，拒絕給青年同志修改稿件等。他的目的是企圖控制河南考古發掘的資料，給自己爬上“考古专家”的宝座鋪平道路。

四、抹煞河南文物工作成績，并在同志之間挑撥离間，制造分裂

省文化局抽調文物一、二队的同志組成河南省文物編輯組，編纂近年来考古發掘材料，准备分批分期出版。他就造謠說：“这是調虎离山。”又說：“把我們这几个旧知識份子弄在一起，工作搞的好，領导上說我們是小集团；搞不好，領导上說‘就知道你們旧知識份子搞不成’。”他一方面誣蔑領导，另一方面离間非党知識分子与党的关系。因为1952—1954年郑州基本建設任务很大，一时抽不出来力量从事發掘报告的整理，韓維周即利用有人希望編写發掘报告的要求，挑撥队內同志与省文化局陈局長的关系，說陈局長不叫写报告，企圖使队內同志对陈局長不滿。

从去年下半年到現在，河南开展了文物普查工作，90%以上的县、市都开展了全面普查，共發現了古文化遺址四百余处、古墓五百余座，在1956年公布了第一批六一九处重要文物古迹保护名单，而韓維周却說：“河南文物普查搞糟了！要重新来一次。”全盘地抹煞了文物普查的成績。

郑州商代古城的發掘，他一直恶言攻击，否定这一重大的發現，否定商代古城的相对年代；然而，他却向人民日报記者夸大吹嘘他个人在發現和發掘商代古城的作用，把集体的荣誉劫为己有。

五、冒牌专家和他的丑恶历史

韓維周是个十足的伪学者，很少到發掘工地里去，偶尔去一趟，竟躺在工地睡大觉。平时狂妄自大，目中無人，对工作上表現極不負責的态度。

1952年他在白沙水庫負責發掘古墓，發掘了各代古墓四百余座，但没有一座合乎科学發掘規格（因为没有挖墓道），致使这批具有历史意义的資料直到現在不能进行整理，使国家財产遭到很大的損失。他曾經把郑州的商代遺址当作新石器时代遺址向新聞界报导。韓維周甚至連每个普通考古工作人員必須具备的攝影和繪圖等最基本的技术知識也没有掌握。当他的“专家”外衣被揭开以后，反認为“怀才不遇”，“英雄無用武之地”，声言要往山西、南京等地投靠其他右派分子，幻想与其他右派分子一起把持河南的考古事業。

韓維周是鞏县人，地主阶級出身，曾参加过国民党，干过甲長、鞏县督学、伪县参議会議員和代秘書、伪党政軍第四次会报会議决定的县情报組員，

并代表鞏县官僚慰問过国民党反动派的軍队。1952年土地改革时，轉移斗爭果实，家藏三千余斤粮食和两个戒指，拒絕归还給人民。他的地主家庭被斗后，对土改不滿，拒絕接受改造。在鎭反运动中，人民政府根据鞏县人民的要求，鎭压了罪大恶極的反革命分子張中甫（伪县参議长，韓的老师），他却如丧考妣，痛哭流涕。

他的罪恶事实和他的狡猾抵賴的丑恶行为，激怒了全队的全体职工。目前工作队正进一步揭露和声討韓維周的右派言行，繼續向他展开斗爭。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通訊組、郑州商代古城發掘小組）

考古工作队伍中的右派小丑——吳銘生

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員会在反右派斗爭中，打垮了以陈浴新为首的反动集团以后，最近又获得了一項新的胜利，一个民盟右派小丑——吳銘生被揪出来了。他披着青年考古工作者的外衣，潜伏在革命队伍中，一貫进行反党反領导反社会主义的罪恶勾当。

吳銘生在1942年就参加了三青团，1945年爬进了伪“攸县民报”当編輯，积極从事反动宣傳，并加入了国民党。1946年在反动軍队中任中尉軍需，行为貪污腐化。解放前夕，随蔣匪帮逃竄，被我解放軍俘虏回乡后，混入了革命陣营工作。1952年到文管会工作，他一貫处心积虑来夺取文物清理工作队的領导职务，对每个工作队的負責同志，都恶毒地进行誹謗誣蔑，打击抗拒。他無耻的到处吹噓自己“業务上有一套”、“工作能力强”等，以抬高自己。并發出了：“現在的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的發展”的謬論，意即現在的領导領导不了我吳銘生，因此，生产力（吳銘生）就会要“革命”来突破这种“生产关系（党的領导）”。另外，他抓住一切机会，故意制造矛盾，造成混乱，利用唆使别人来反对領导。他的另一个手段是“上書言事”，“毛遂自荐”。省文化局的每一个新任局长剛一到职，他便利用新任局长一时不了解情况，上書言事，夸夸其談，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进步”的“聖人”，甚至还露骨地要求撤换原任队长。还有一个最陰險的手段是在政治上进行投机，他隐瞞了自己的反动历史和罪恶，申請入团，还向党遞上了“入党申請書”。今年九月，他怀着个人野心又加入了民盟，企圖以此抬高自己的身价。

今年五月，吳銘生与其他右派分子互相配合，对党發动了猖狂的进攻。他对当时轉到資产阶級方向的文匯报、光明日报上所登載的反共文章表示拥护。为了煽風点火，并曾企圖控制机关的黑板报。他在“民盟”支部座談会上，对党和省文化局进行了全面的攻击和誣蔑，提了五十多条所謂“意見”。在工作队的座談会上，也提了三十多条“意見”，并策动要以全队名义向省文化局提出。他首先誣蔑省文化局不懂文物，不能領导文物工作。其次，他論証了儲安平“党天下”的謬論完全正确。

吳銘生誣蔑党和省文化局宗派主义严重，說什么用人唯亲，用人唯党等等。在群众中煽动說：“現在的工作眞沒搞头，我們搞死了都是空的，只有党員提拔加薪都很快！”以挑起群众对党不滿。

他还高唱外行不能領导“內行”的謬論。要党讓位給这些所謂懂得業务的“內行”来領导。他对解放了的中国人民已享有充分的广泛的眞正的民主和自由，誣蔑說“不自由”，“不民主”，“新聞封鎖”。

对党的政策、政治口号、机关制度，他总是抵制和反对的，如当中央明确提出必須坚决貫徹“重点發掘，重点保护”的文物工作方針时，他在群众中煽动，說：照这样搞，我們快要失業了。”总之，在同志之間撥弄是非，制造矛盾，是吳銘生司空見慣的伎倆。

吳銘生为了圖名圖利，是不擇任何手段，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掠夺别人的劳动成果的。例如别人写好的稿件，他拿来順手增減几个字，就在执笔者后面添上了他自己的大名，稿件發表后稿酬就必須分一半。如1956年“文参”第十一期“长沙黃泥坑第20号墓清理簡报”一稿，墓是張欣如同志清理的，簡报也是由張欣如同志写的，吳銘生仅仅增減了几句話，就变成两人合作的。又如1954年12期“文参”上發表的“长沙左家公山战国木槨墓”的簡报，全部插圖是罗敦靜同志繪的，而稿費却被吳銘生独吞。

1956年中央召开全国第一次考古工作会議，湖南文管会写了一篇題为“长沙战国墓”的专題报告，报告执笔人沒有出席，由吳銘生参加了这次会議，对报告执笔人大肆攻击，想把报告全盘否定，他回来又欺騙領导說“中央的意見要重新改写”。今年考古学报第一期的“长沙出土的三座大型木槨墓”就是吳銘生从别人已發表的报告中摘抄一下，凑在一起而成的“新作”。

吳銘生还經常在群众中恬不知耻的夸耀自己的“才能”和“学問”，儼然以“青年考古专家”自居，今年分配他上工地，他却躲在机关里，叫一个新来的同志天天上工地向他彙报，發現“好墓”就去看一下，簡报都由吳銘生来写。对于他認为無名利可圖的墓，有时便打个电話要队里另派人去画圖，或者把快要出器物的墓室填了了事。破坏文物，浪費国家财力、

人力，他是在所不顧的。从以上这些事实中也就可以看清这位“青年考古专家”的眞实面貌了。

通过一个多月来群众的揭發和駁斥，在鉄的事实面前，吳銘生这个頑强的右派分子，也不得不繳械投降，低头認罪了。（高至喜　文道义）

讀者来信

編輯同志：

讀了你刊第八期上揭露右派分子陈浴新的罪恶事实的文章，我們感到無比的憤怒。陈浴新他盗窃国家的珍貴文物，壟斷科学研究資料，明目張胆的破坏国家文物政策法令，公开的濫掘古墓?毁坏文物，使我們的文物工作遭到了巨大的损失。在大鳴大放期間，他竟敢猖狂的向党进攻，夺取党对文化工作的領导，企圖从实現其复辟反动統制的陰謀。作为一个爱国的公民，特别是一个文物工作者，誰不气憤塡膺！我們要控訴他、清算他的罪行，向他索回国家的財产，坚决和他斗爭到底！

湖南的文物工作成績是巨大的，这些成績的取得是由于党的正确領导和全体文物工作者們辛勤劳动的結果。而陈浴新竟厚顏無耻顚倒是非别有用心的說成是自己的功劳，企圖从文物工作中打开缺口，由夺取党对文物工作的領导以遂其推翻党的目的。然而这只是梦想，党的領导、人民的江山是坚如磐石，文物工作的队伍亦坚不可摧的。

我們都到过湖南，还在1952年底和1953年初，前中南軍政委員会文化部为了支援长沙近郊基建工程地区古墓葬的清理工作，曾抽調了广东、广西、湖北、江西四省和武汉、广州二市的文物工作者十余人参加“长沙近郊古墓葬清理工作队”的工作。我們之中就有人当时参加了这一工作。当时我們目睹陈浴新、陈粹劳等雇用土夫子盗掘古墓毁坏文物后的一些現場情况，都極感憤恨。我們对于党报（长江日报——当时是中共中央中南局的机关报）的批評衷心拥护，曾希望他們深刻反省。可是陈浴新之流竟因此更对于中南文化部所發动組織与派人具体領导的工作队的工作故意刁难阻撓。我們曾經参加了他們的所謂檢討会，当时認識不深，覚得極不深刻，以为不过是一些推諉搪塞而已，今天才知道原来他們是别具用心，有意破坏。对此，我們今天再一次表示，要他們坦白交持，并建議政府徹底追查。另外我們还想起了一件事情，大約是1953年元月，清理工作队的同志們在郊区清理工作中，發現了因为建筑部門收購古墓磚而刺激了市郊居民濫掘古墓磚的严重事件，并及时反映到湖南省文管会，但是作为該会主任的陈浴新却置之不理。同时，又有某建筑工地的工人、干部直接找到文管会反映情况，作为該会秘書的陈粹劳不仅一推了之，而且对来訪者态度極为恶劣。后来直到工作队的負責人将此情况反映到湖南省文化局，工作队根据文化局的指示在四郊作了深入調查后，才由文化局作了严肃的处理，党报（新湖南报）并为此發表了专題报导文章和評論。事后，从中央到长沙市各級党政机关，都从这些事件中吸取了教訓，采取了坚决保护的措施。我們不禁要問，右派分子陈浴新之流，你們就是这样对待文物保护工作的嗎？

从揭發的事实不难看出，陈浴新之流是混进文物工作队伍中的敗类，是人民的敌人，他們妄圖从文物工作队伍中打开缺口，向党进攻，直至“白刀子进，紅刀子出”，“杀共产党人”，“推翻党的領导”，“破坏社会主义建設事業。”我們要和他們坚决斗爭到底，我們坚决要求把他們从文物工作队伍中清洗出去！要求政府向他們索回被盗窃的文物圖書，徹底清算他們的罪行并依法治罪。

湖北省博物館籌备处　譚維四
白紹芝

編輯同志：

看了你刊今年第八期上刊載了楊华、李正光等同志揭露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員会右派分子陈浴新的丑恶面目一文后，我感到非常气憤！

記得1952年的冬天，我曾在长沙参加过几个月的清理工作，我們的工作是由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員会直接領导的，可是作为該会主任委員的陈浴新对长沙近郊的古墓清理工作漠不关心，不但没有到市郊工地去看一下，連在市內的队部也没有到过。

曾經屠杀人民，滿手血腥的軍閥陈浴新，解放后，鬼混到湖南省文管会里，不但不痛改前非、立功贖罪，反而利用党整風的机会，組織反党集团，瘋狂猙獰地向党进攻，眞是可恶已極！

我認为不能再容忍这种敗类繼續猖狂下去！为了整肃我們社会主义队伍，为了更好更快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像这样穷凶極恶的右派分子，必須給以迎头的痛击和严厉的懲处！

程欣人

苏州虎丘云岩寺塔發現文物內容簡报

苏州市文物保管委員会

苏州虎丘云岩寺塔，始建于五代末年，完成于北宋初年，此后修理和改建記录，可考者仅元至正和明永乐两次。崇禎末年，曾一度改建塔之第七層。清乾隆中叶，在寺之西南一带，起造行宫，塔亦可能在此时期修理一次。咸丰十年（公元1860年），太平天国克苏州战爭中全寺淪为廢墟，塔亦毁損，傾斜裂縫，岌岌可危。1956年冬，苏州市文物保管委員会在中央文化部、江苏省文化局和苏州市人民委員会支持領导下，更得到国內建筑专家和上海、苏州二市建筑工程部門协助設計，开始进行搶修。本年三月三十日下午，工人王菊生在塔之第二層正西門口边沿灌浆时，屡灌不滿，覺其中似有空隙，揭开一部份磚砌（約60.5公分深处），發現孔道，探身进入，見有直南直北（約长1004公分），直东直西（約长1140公分），闊68公分，高63公分十字形空衖一条，中間放有长方形石函和其它文物多件，即予取出。因缺乏經驗，兼暗中摸索，不免使函身拆散，伤及經箱底板，以至箱中絹楪之类，有所毁損。嗣后我会又在五月五日配合工程进行，于塔之第三層中央进行發掘，約在70公分深处發現一个65公分見方、深73公分方窟。壁上都圬土紅色，內中有石函、銅鏡等文物一批。六月十六日，在塔之第四層中央配合工程进行發掘，約在104公分深处發現一个十字形空衖，长約265公分，高約58公分，闊約53公分，內中磚泥零乱，經过清理，获得当时所遺留下来的木制泥刀三柄。又在塔之第五層乱磚鳥粪中清理出残缺的石造像四件。以上各件并原始建筑的有关材料等，先后送会整理，妥愼保存，現在将整理結果叙述如下：

甲　第二層中間發現的文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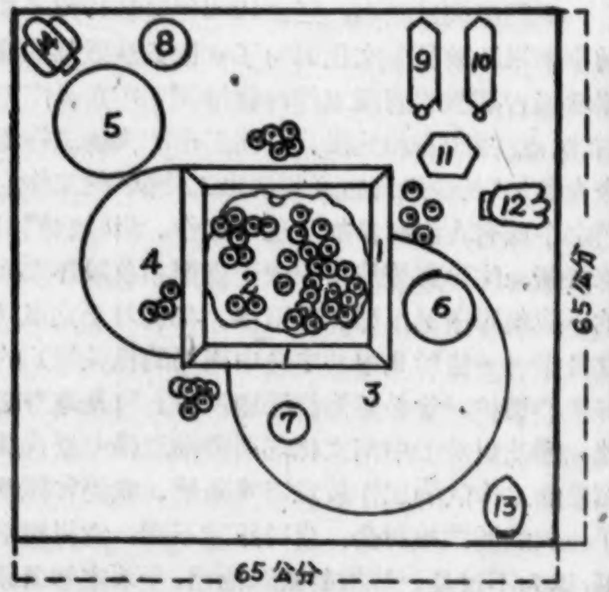
1. 石函（圖一）：

石函长方形，是用六塊硯石，做好榫头合成的。函身每面浮雕佛像五尊。底部四周，刻云紋花边。函蓋背面，塗成漆地，用銀朱写“□信心造□□盛众□金字法华經”等字，其余若干字，因漆地剥落，不易辨明。

2. 經箱（圖二、三）：

开啓石函，即为經箱。箱蓋上放有已朽的錢囊和散开的銅錢（見后节），箱底則墊有絲織物。箱身系楠木所制，外塗广漆，各部接縫处都鑲包銀質鎏金花边，或作蓮花，或作鳳尾，極为工細。边上并列釘有凸形圓釘。箱口搭連上扣有鎏金鏤花俗称爆仗鎖一把（圖五），鑰匙扣在鎖上。箱蓋上面，分釘鎏金角形蓮花四朵（一朵已脫失），中心有交飞状鳳凰一对，已脫失，只存痕迹。底座四周木边，雕有鏤空如意头。附近边上，横鑿小字一行：“建隆二年男弟子孙仁朗鏤，願生安乐国为僧”（圖四）。箱底露外部份，有毛笔写下列字迹：“弟子（已剝落）曹細招（細招二字左偏旁已剝落）舍凈財造此函盛金字法华經。弟子（已剝落）孙仁遇舍金銀并手工裹，弟子（已剝落）孙仁朗舍手工鏤花，辛酉岁建隆二年十二月十七日丙午入塔”（入塔二字已剝落）（圖八）。箱后鉸鏈，作萤形，內面有双鈎鑿“孙仁詒”

虎邱塔第三層方窟平面示意圖



1. 石函。2. 殘錢囊。3. 陆七娘銅鏡。4. 十二生肖鏡。5. 銅鏡。6. 青瓷碗。7. 九角銅杯。8. 銅坐佛像。9. 10. 銅十一面覌音。11. 六角銅座。12 鐵鑄佛龕。13. 三佛銅造像。14. 檀香木彫三連佛龕。

三字。

3. 經卷（圖六）：

箱內放有現已硬化作黑色（磁青紙）經卷七卷。每卷长26公分，每卷两头伸出銀質鎏金包头之軸。卷端描有金花圖案，以金写出“妙法蓮花經卷第□”字样，卷端并扣扁形絲帶。在貯放中，每卷外面用絹襆包裹，一块至四块不等。現在將每卷經卷外形和包裹状况，分記于下：

第一卷　卷面写“妙法蓮花經卷第一”，外用已泛作灰綠色絹襆包裹（約46公分見方），絹上印有似淡黃色圓形花紋十六朵。中間用毛笔写有“女弟子于八娘捨裹金字法华經永供养”字样，一角有飄帶二条。

第二卷　卷面字剝落，剩“蓮花經”三字还可辨出，外用絹襆三块包裹：第一块色澤已泛作檀香色，拉花織紋（約44公分見方），上面分三行毛笔写：

“武　丘
弟子曹二娘捨裹妙法蓮花經卷
塔　上”

第二块色澤亦已泛作檀香色，拉花織紋（約50公分見方），上面毛笔書写“李氏六娘舍裹經”字样，角上飄帶有“李氏六娘”四个小字。

第三块色澤亦已泛作檀香色，拉花織紋（約48公分見方），襆上有毛笔画簡单花枝十六朵，中間写“顏氏八娘太君捨”字样。

第三卷　卷面字剝落灰化不明，外用拉花絹襆二块包裹，均已泛作檀香色。第一块（約44公分見方），中間分三行毛笔写：

“永充
亡楊氏二娘
供养”

此卷开时內中并放有約一、二公分見方和各种不同花紋之綾絹數十块。此襆未有針縫边，与它襆稍有不同。

第二块襆上有簡单毛笔画花枝（約50公分見方），中間用毛笔写：“朱氏九娘太君捨裹經”字样。襆一角上有灰綠色飄帶二条。

第四卷　卷面写“妙法蓮花經卷第四”，外用絹紋稀疏微見方形廻文并已泛作檀香色之襆子包裹（約45公分見方），中間用毛笔写：“徐□捨裹金字經”，一面写：“充供养”三字。襆角有飄帶。

第五卷　卷面字已灰化不明，外用絹襆三块包裹。第一块已泛作檀香色（約50公分見方），有簡单毛笔画花枝，中間写：“彭城县君錢氏三十八娘捨”，絹边有同样小字一行（圖七）。

第二块亦泛作檀香色，拉花織紋（約45公分見方），中間毛笔写字二行：

“永充
弟子楊公兒捨”

第三块已泛作灰綠色，有淡黃色印花痕（約46公分見方），中間用毛笔写：“女弟子高十娘太君捨裹經”字样。

第六卷　卷面字已剝落剩“第六”二字，外用拉花織紋絹襆包裹，已泛作檀香色，（約45公分見方），并有簡单毛笔画花枝，中間用毛笔写：“女弟子馮氏十一娘捨裹金字法华經入武丘山寺塔內充供养”字样。

第七卷　卷面字已灰化不明，外用絹襆四块包裹。第一块已泛灰綠色，上有淡黃色印花（約46公分見方），上面写毛笔写字二行：

“女弟子錢四十二娘
捨裹金字經”

第二块为薄如蟬羽之紗，色已泛灰綠，殘破不堪，中間只存毛笔写：“金字經”三字。

第三块已泛作灰綠色，上有淡黃印花痕迹，拉花織紋，中間毛笔写：“弟子郞承謖捨裹經”字样，飄帶上亦有“郞承謖捨”四小字。

第四块絹紋稀疏，已泛灰綠色，中間毛笔写：“捨裹金字經”字样。

4. 紙卷，錦包竹帘，殘綉紋，殘錦，牙牌，珠飾等。

和上面七卷經卷同放的，还有一卷白紙的紙卷（长28.5公分），因質地已酥烂，無法展开，头上露出部份，上写：“弟子孙仁遇……金花銀裝經函一”等字。再从剝落的紙卷碎片看，紙卷內都是人名（圖九）。在紙卷外面，有綉襆包裹（綉襆已殘），顏色已泛成灰黯。在綉襆的夹里上面用毛笔写：“弟子徐仁誨”等字样，經箱內有殘花錦包竹帘一块（圖十）。另有破殘綉襆四块，皆刺綉花卉，針法不甚細致，却古朴大方，部份色彩犹可辨明。綉襆質地較粗，一块已泛焦黃色，上用毛笔写：“丘山寺宝塔上”字样（圖十一）。一块作深栗壳色，上綉金黃蓮花。一块紫地綉菱花蓮花（圖十二）。一块深紫紅地，亦是綉菱花荷花。另有殘錦一块，金黃地黑色花紋。以上各件，如何作用，因放置部位已被掏乱，不易明了了。另有长方形象牙牌一块，色已泛黃，上刻“弟子顧超捨願三世亲生父母疾証菩提佛道”字样（圖十五）。以外尙有銀絲珠串一圈，計：串在一起的小眞珠七粒，木珠一粒，菩提珠一粒，瑪瑙質穿孔圓形挂飾一粒，菱形挂飾一小块。眞珠光澤，尙屬瑩潔。

5. 石函外分放各件：

在貯藏上述石函之十字衖內，除石函外，在石函頂上放有灰陶碗形香爐一只（口徑 14.5公分，底徑 8.2 公分，高 11.7 公分）。爐中竪放檀香木香一枝。香木两头抹有紅漆（圖十四）。在石函前（南面）一公尺处有青瓷碗一只，內放一油盞，碗內积有油垢（圖十三左）。另一只青瓷碗，在石函后（北面）一公尺处無油盞，但积垢相同，并已有裂損（圖十三右）。

6. 錢幣：

上述放在經箱盖上之錢囊，已朽腐。計散存錢幣 3.5 公斤。錢幣有“开元通宝”、“乾元重宝”、“唐国通宝”、“大唐通宝”、“永安五銖”、“太貨六銖”、“周元通宝”、“半两”等，中以开元、乾元为最多。

乙　第三層中間發現的文物

1. 石函（圖十六）：

石函質地同上面藏經箱的一样，也是硯石制作，但作正方形，下广上窄，分五节叠成，無雕刻。它是放在方窟的中央。

2. 鉄函（罩形）：

石函里面，竪一鉄函（函底板 20.1 公分見方，下面函口 19.1 公分見方，頂部 10 公分見方，通高 34.2 公分）。罩和底板相連处，每面用二根銅絲扣住。罩上并放有絹襆，已殘破不整，并泛作鉄銹色，中間有一小塊外方內圓的制錢形組件，是用綫訂上去的。当石函开啓时，見石函鉄函空隙間，塡着不少黃色粉末，是否防銹除虫，作用不明。

3. 鉄鑄金塗塔（圖十八）

再把鉄函开啓，即見有絹襆五塊，复盖着金塗塔一座（圖十七）。絹襆大多朽烂，比較完整的一塊（約 53 公分見方），色已泛成淡黃，上面有毛笔写字二行：

“□□惠朗舍此襆子一枚裹
迦叶□来眞身舍利宝塔”

其余有織紋如葡萄纈者一塊，已泛作豆沙色，字已模糊不明，一角綴有飄带。殘絹一塊，織有花紋，上有殘剩毛笔写：“辛酉岁題”四字。一塊已泛栗壳色，上面殘剩有毛笔写“舍永充”三字。一塊亦有花紋，色泛深赭。另有一、二公分的各种小塊綾絹数十塊散置塔面。

襆下即为金塗塔。塔頂相輪等已朽酥成小塊，不可收拾，四周翹角除三只傾折外，一只尙屬完整。自塔身塔座至翹角，均滿鑄佛像，極工細。塔身中空，在塔座中心，凹一洞，內放一金鑄小瓶。瓶口有盖，口中塞着紙团。根据襆上文献，此瓶可能即藏舍利（圖十九）。

在金塗塔塔頂上，亦即复盖于殘襆中的，还有一小木塔。形制如我們所常見的喇嘛塔相仿，外塗黑漆，但同时以赭漆勾画塔座，壼門和相輪（圖二五）。同时有一玉質方幢，在鉄函开啓时已傾仆在金塗塔座下。按照木塔內痕迹，似此玉幢即放于塔心內，大小亦頗恰合。玉質不甚瑩潔，已微泛作象牙色。

4. 附放石函以外其他文物：

一　越窑青瓷蓮花連座碗一只，下承以托，亦作大瓣蓮花圖案，釉色明潤，光澤如玉，当是越窑稀有的精品（圖二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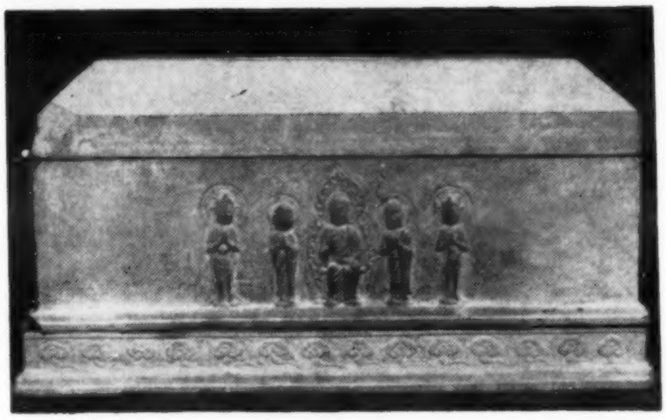
二　銅佛像四件。一件作盘膝而坐形（圖二七）。二件均为立像，是十一面观音（一头已断），足踏蓮座，一手持柳，一手执瓶，衣飾珞瓔，均頗工細（圖二八）。另一件則是群像。在藕节上，穿出蓮蓬三个，中間一个較大，一佛捻指盘膝而坐；左右二个較小，作立状，首后并有光輪。三像連綴起来，成一个群像圖案（圖二九）。

三　鉄鑄蓮瓣形佛龕一具。質地已酥烂，花紋亦多模糊。龕內鑄着或坐或立的佛像大小数十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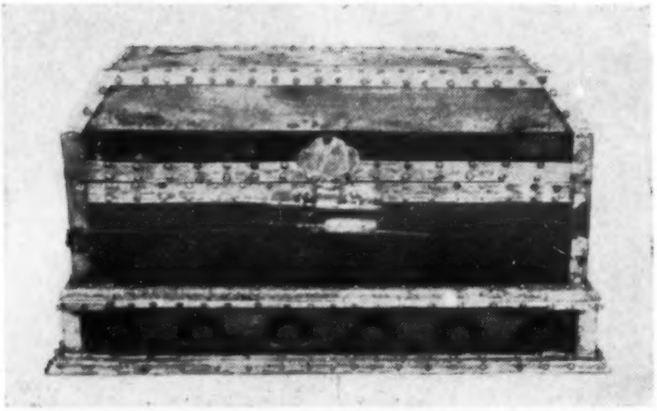
四　檀香木雕三連佛龕一具。此龕下面是一蓮座，蓮座上有三塊合成的圓龕，打开后即現出中間和左右佛龕三座。中間一座，雕着观音立在一枝藕上。另外穿出的一瓣蓮花上，有善才童子对他作合十膜拜。此龕部份已裂縮，其余左右二龕，每龕上下各雕佛像一个。此項作品，全屬立体雕刻，并部份描金，眉目衣折，極为工細，是有高度艺术性的文物（圖二十）。

五　銅鏡四面。一面最大型的，背面有毛笔字，上写：“女弟子陆七娘敬舍大鑒一面入武丘山塔上保佑自身淸吉□諸□□眷屬团圓身富淸健□再□供养降建（建隆之誤）二年三月日題”字样（圖三十上）。一面（直徑 23.7 公分），背面是八卦和十二生肖花紋。一面（直徑 16 公分），背面無花紋。另有小銅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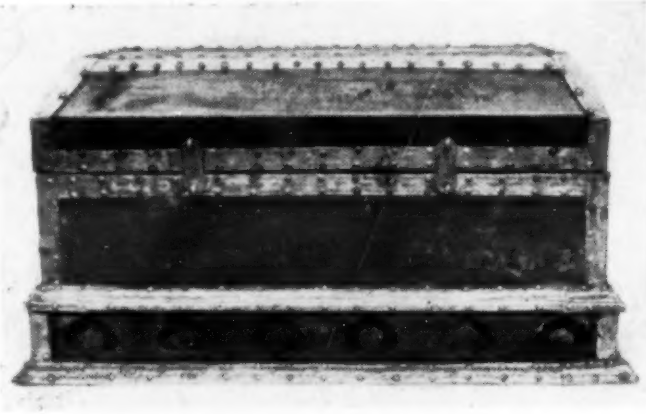
塔磚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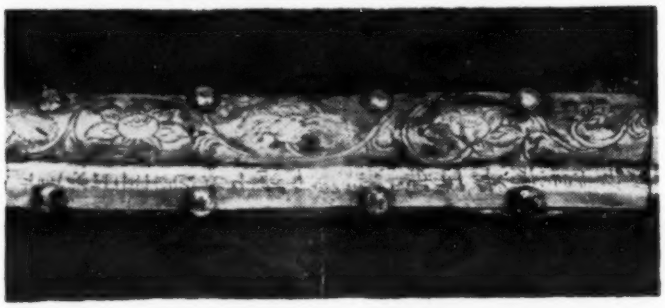
圖一　石函正面　长 46、寬 26.5、高 25 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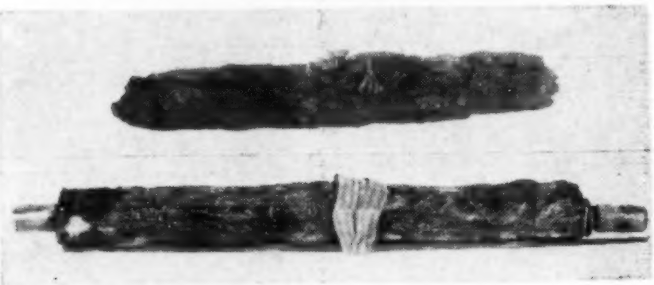
圖二　經箱正面　长 37.8、寬 19.2、高 21 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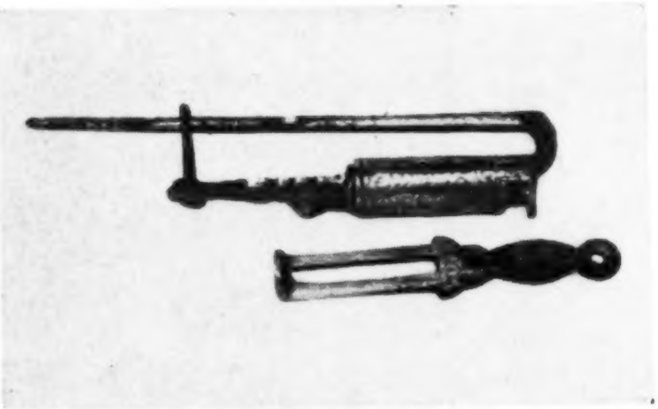
圖三　經　箱　背　面



圖四　經箱正面边沿上所鏨字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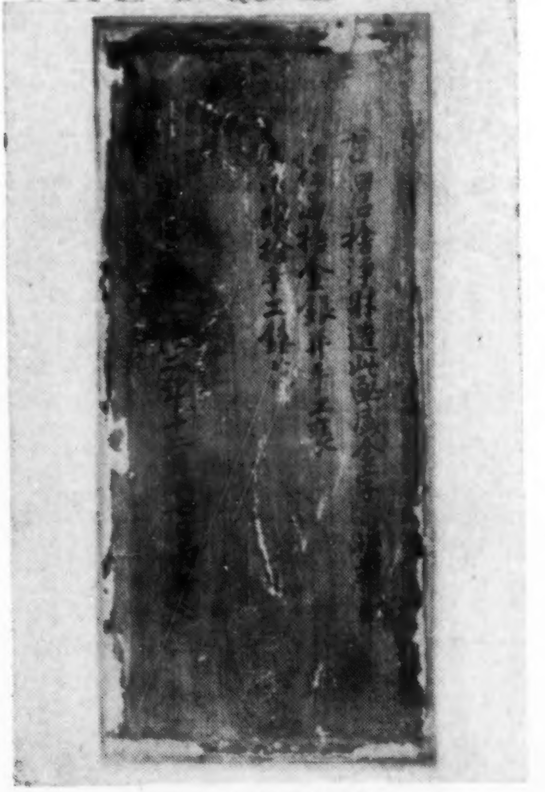


圖六　經卷上的字及花紋　銀質鎏金軸长 2.3 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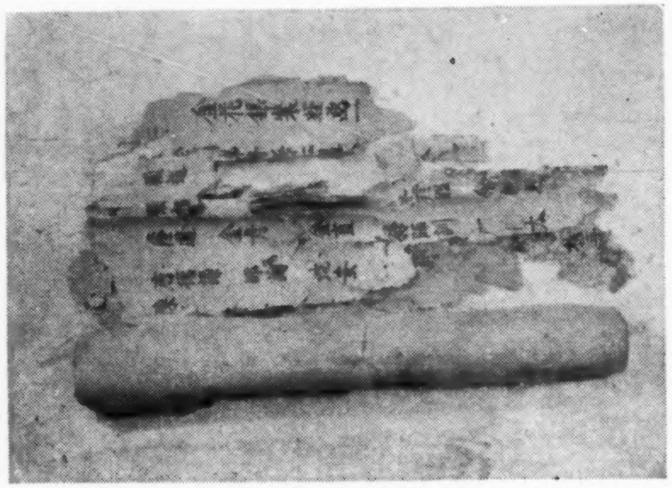


圖五　鎖及鑰匙　鎖长 10.6 公分，鑰匙长 6.3 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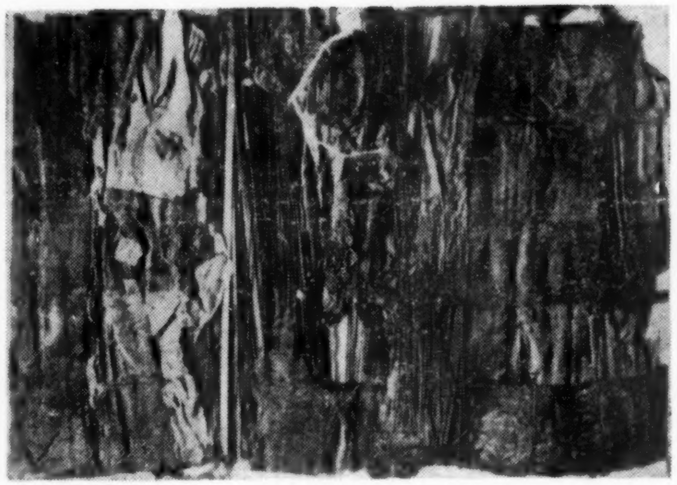
圖七　裹經絹襆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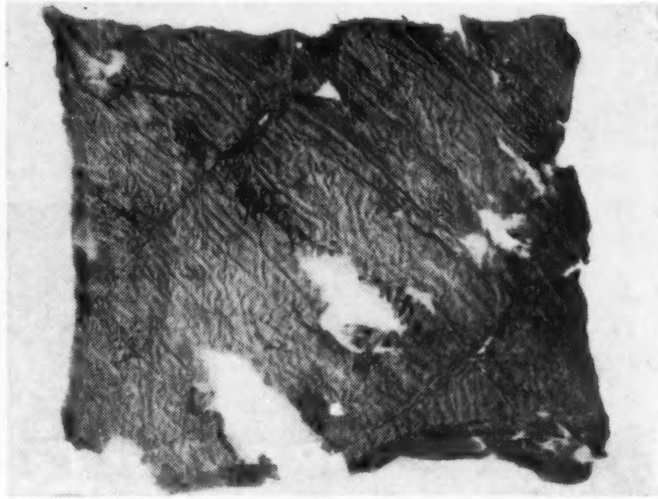
圖八　經箱底部字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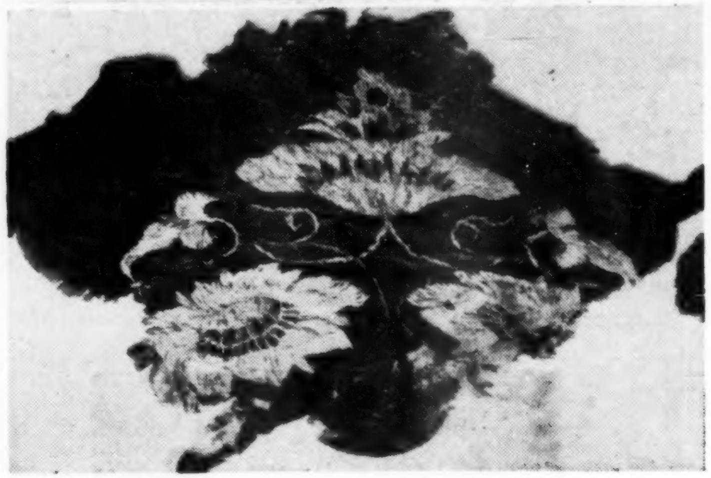
圖九 紙字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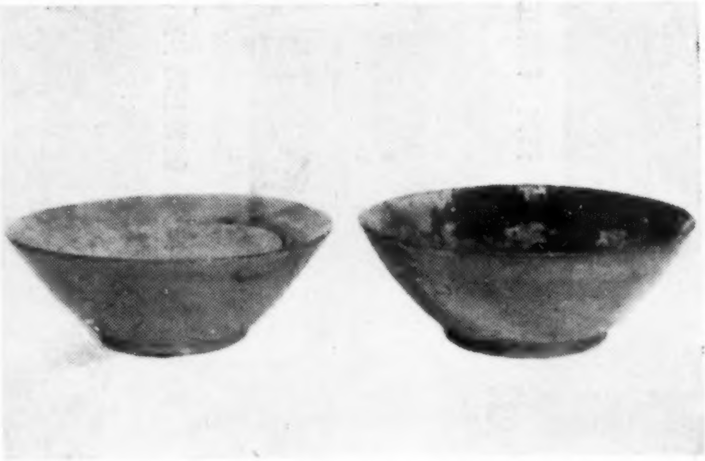
圖十 錦色竹帘 长約47、寬32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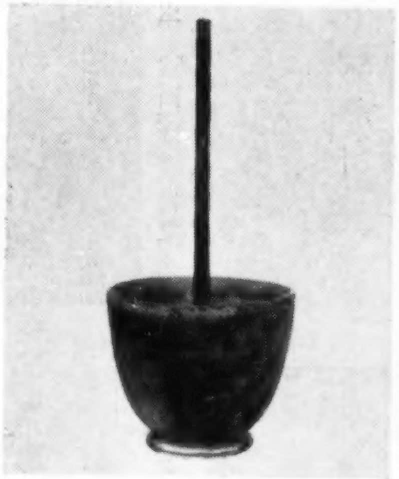
圖十一 殘綉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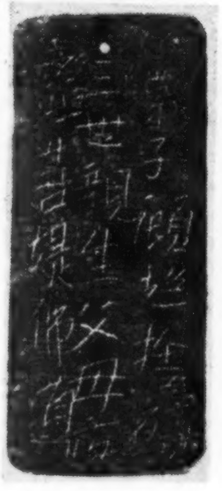
圖十二 殘綉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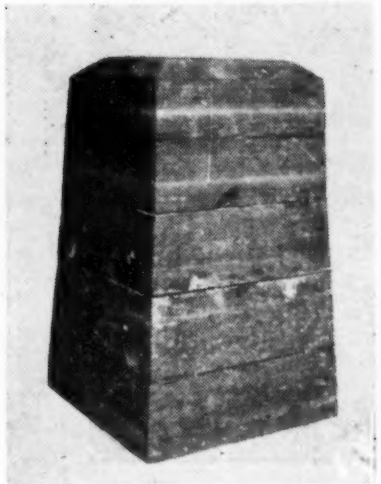
圖十三 青瓷碗 口徑17、高6公分(左)
口徑17.7、高6.3公分(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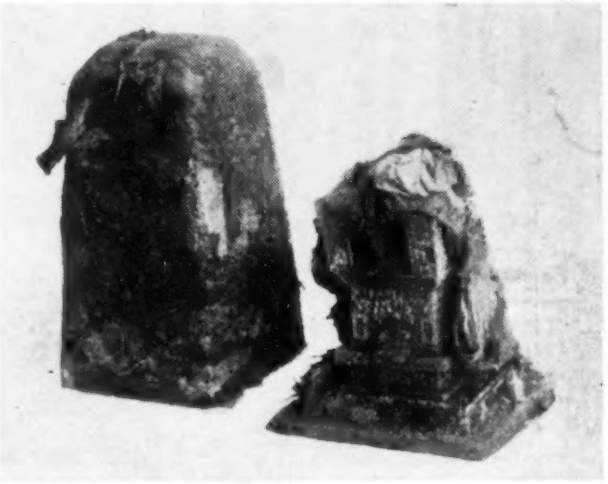
圖十四 香爐及木香 爐口徑14.5、底徑8.2、高11.7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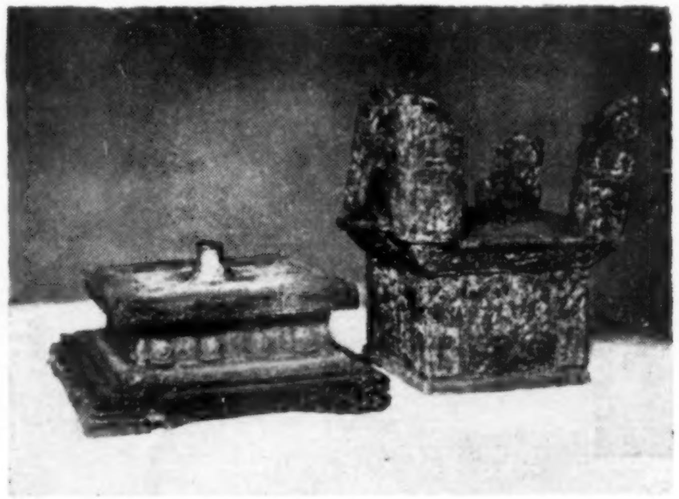
圖十五 牙牌拓片 长6.2、寬2.7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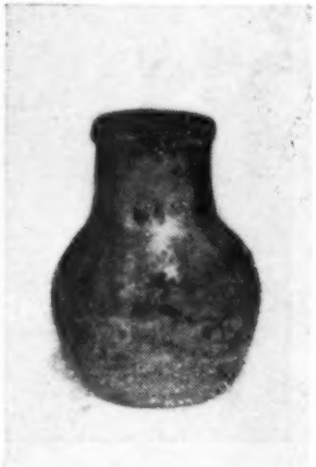
圖十六 石函 底層27×27.6、頂層22.4×22.5、通高44.1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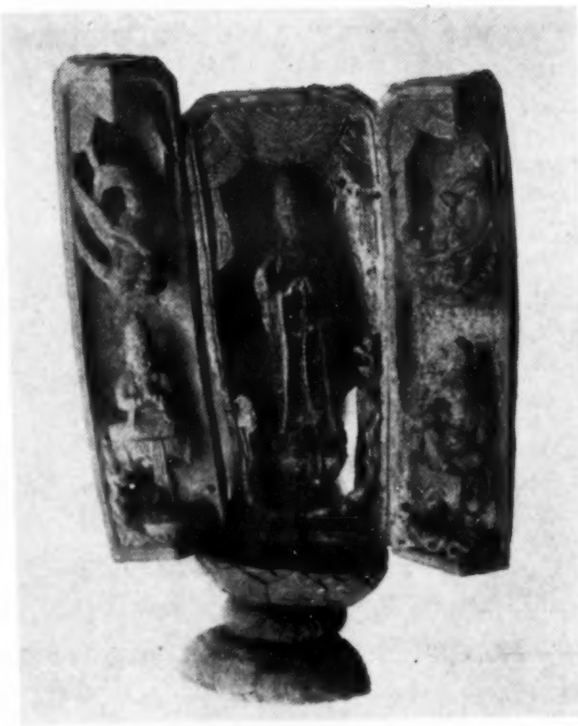
圖十七 鉄函初开时的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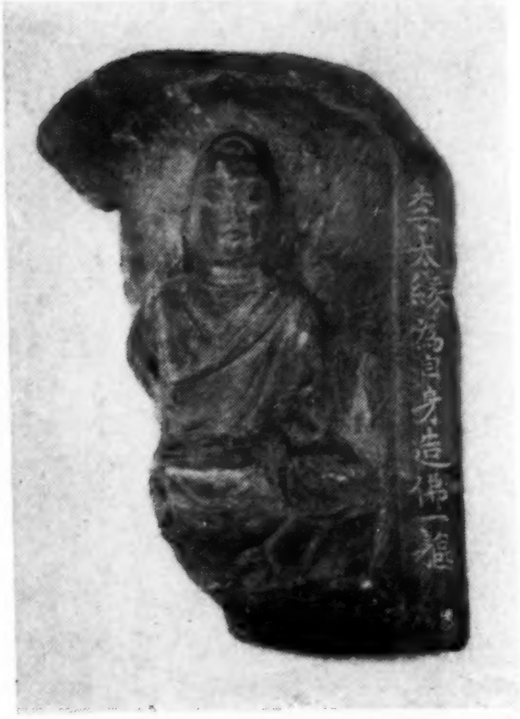
圖十八 鉄鑄金塗塔 塔座高4、底 11公分見方，塔身高7.8、寬11.2、翅角高6.8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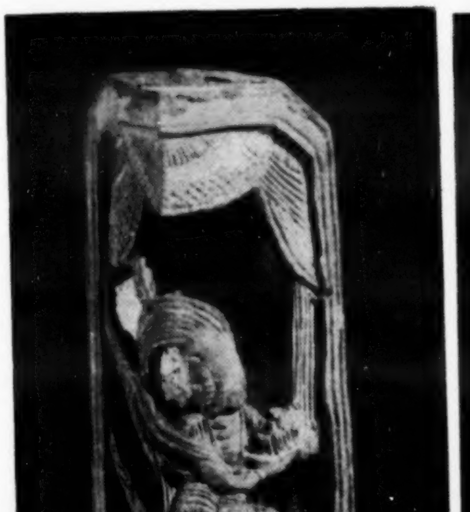
圖十九 金塗塔中的金瓶高2.9、腹徑7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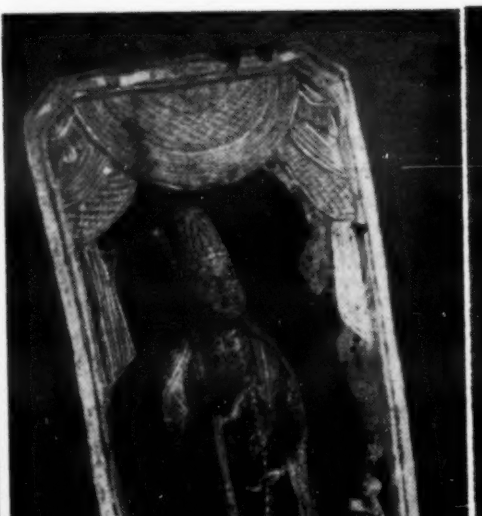
圖二十　开啓的檀木佛龕　連座高 19.3、寬 6.3 公分，左右二龕高 16、寬 4 公分


李太緣為自身造佛一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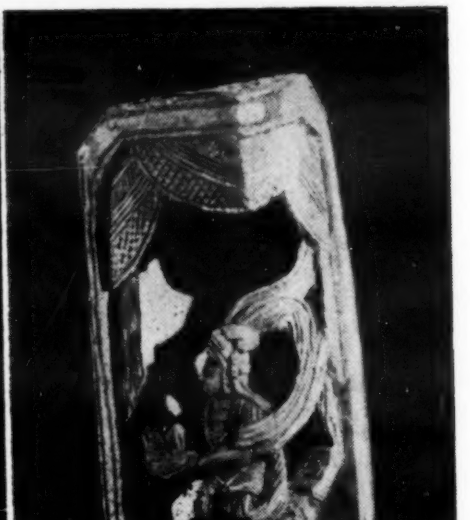
圖二一　残石造象　高 24.5 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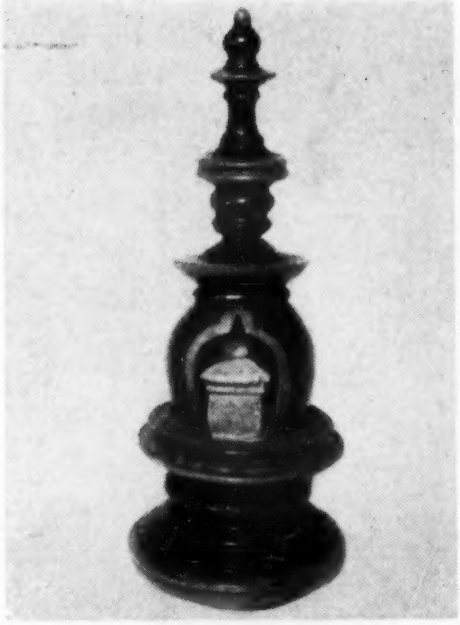
圖二二　檀木佛龕扉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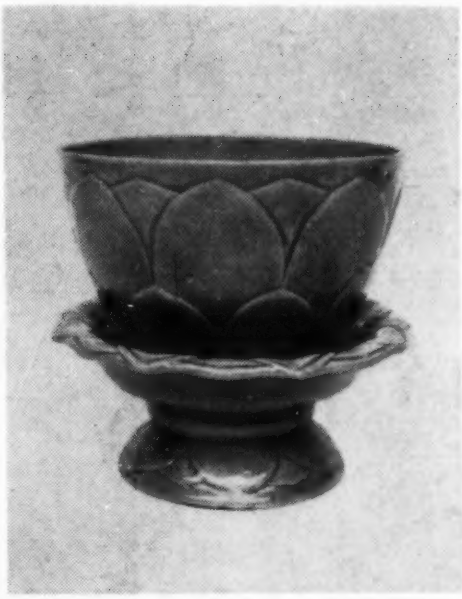
圖二三　檀木佛龕主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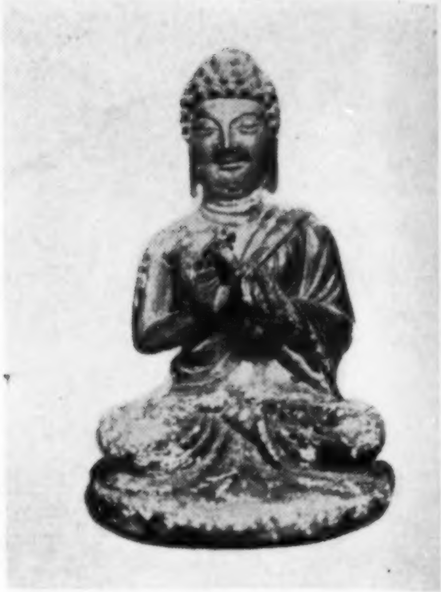
圖二四　檀木佛龕扉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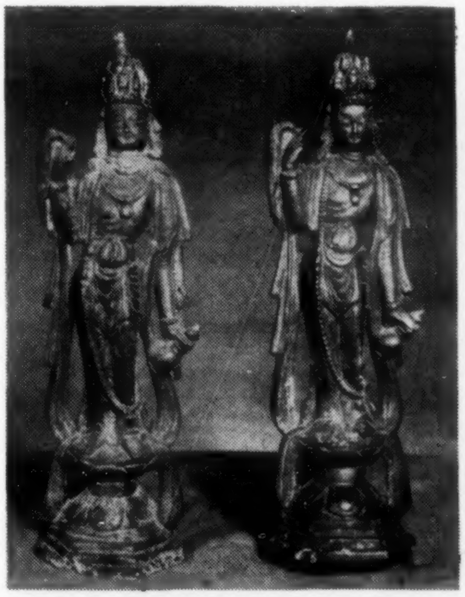
圖二五　小木塔 高 10、底徑約 4 公分
小玉幢 高 2.8 底徑 1.4 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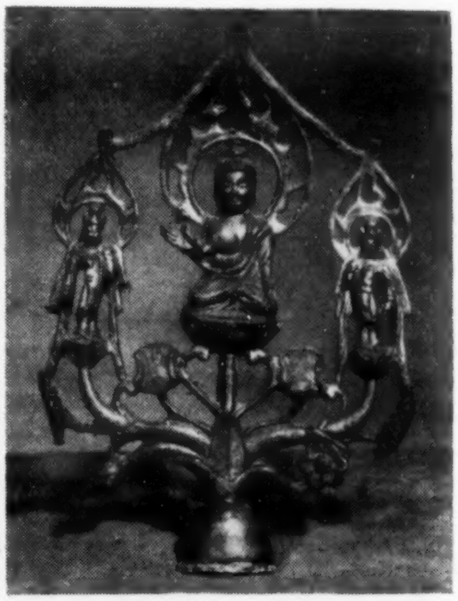
圖二六　蓮座青瓷蓮花碗 通高 13、
口徑 13.5 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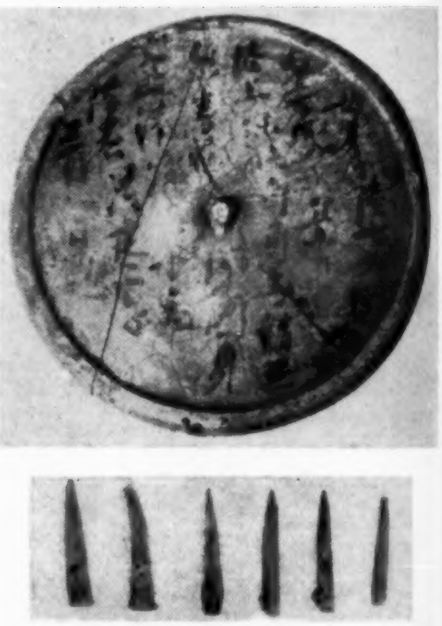
圖二七　銅佛像 高 19.2 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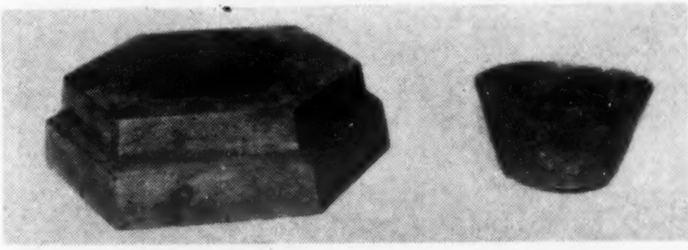
圖二八　銅佛像(十一面观音)
高 23.5 公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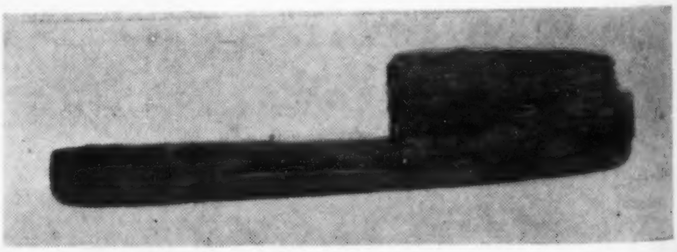
圖二九　銅群佛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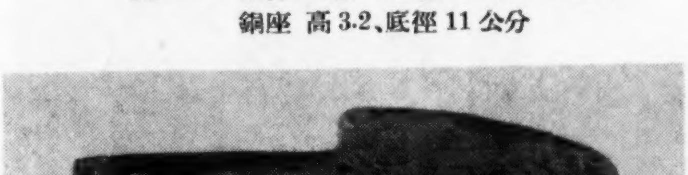
圖三十　大銅鏡 直徑 33.6 公分
(上)、竹釘(下)



圖三一　銅杯 口徑 6、底徑 4.2、高 2.8 公分
銅座 高 3.2、底徑 11 公分



圖三二　泥刀之一　长 37.5 公分



圖三三　泥刀之二　长 34.3 公分

圖三四　泥刀之三　长 49.5 公分

一面（直徑 2.6 公分）。（大鏡及十二生肖鏡已破，被压在石函之下）。

六　九角形小銅杯一只（口徑 6 公分，底徑 4.2 公分，高 2.8 公分）（圖三一右）。

七　六角形銅座一只，作用不明（圖三一左）。

八　錢幣。計十公斤，原有錢囊，放于石函上，但已朽腐。錢的种类比前一批發現者多“宋元通宝”一种，其中亦是以“开元”、“乾元”为最多。

九　殘存大小木質佛珠計 52 粒。瑪瑙佛珠一粒。

丙　第四層及其他地方發現的文物

1. 木制劳动工具：

这些木制劳动工具，是当时泥水工人使用的泥刀，一柄是方头的，和現在使用的鉄制泥刀形式一样（圖三二）。一柄象箭头形（圖三三）。一柄狹長形，头部尖銳（圖三四）。在工具上，还都带有泥痕，可能是当时造塔时遺留在里面的。

2. 無头石佛三尊：

無头石佛三尊，在塔上第五層鳥粪乱磚中發現，原放何处未詳。內二尊屬同式（通高 31.5 公分），手捧經卷，立于方形座上；另一尊手捧如意（通高30.5 公分）。座下有圓榫头，似作插鑲用者。

3. 殘石造像：

殘石造像一个，在塔同上地位發現，已毀二角，龕边刻有“李太綠为自身造佛一軀”。此造像原在何处未詳（圖二一）。

4. 竹釘：

在塔壁泥灰中，釘有不少約長 4.5 公分不等之毛竹釘，上粗下銳，帽头并繞麻絲。它的作用，想是拉紧灰泥和磚面的粉刷面。此法在古建筑中罕有發現，竹头在泥灰中千年不朽，足为研究建筑材料者之参考。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和上海建筑工程局技术研究所都曾派員来調查研究，認为在中国建筑史上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圖三十下）。

5. 磚：

在修整工程中，我会并收集了各种不同形制的磚，有文字的是：“弥陀塔”，“已未建造”，“福祿寿”，“天王”，“大”，“福寿”等几种。

这次虎丘塔中發現的文物，是相当丰富的。从上面的文字記載，确定了建塔的时期（始建于公元959年——周显德六年己未，完成于公元 961 年——宋建隆二年辛酉），了解了当时造塔的目的（供奉迦叶如来舍利）。其余在建筑、雕刻、絲織、刺綉、陶瓷、工艺各方面，都提供了可貴的历史艺术資料。此后我会将进一步加以整理保管，并希望国內外专家予以重視和研究。

整理者及执笔者：錢鏞　范放　黃正祥

（上接48頁）作中可得到充分的証明，我們在昭通、魯甸、昆明的“梁堆”中都曾發現过人的遺骸和隨葬的馬和犬的骨骼。

关于这些“梁堆”的时代，也可以从墓室結构和出土物中得到啓示。比如，过去在昭通一带“梁堆”中發現的有年款地名的銅洗，全部都是东汉的紀元，而沒有更早或更晚的；其它如五銖錢、陶灶、陶俑、画像磚等物，也都是四川一带东汉墓葬中常見的东西。从墓室結构上来看，拱頂花磚墓也是东汉时期最流行的一种形制，昆明的复斗形磚石混合墓，則似乎要晚一些。因此，我認为这些“梁堆”的时代，可能早至东汉，晚至两晋南北朝时期。其中昭通区域的似乎要比曲靖、昆明的早一些。

从这些“梁堆”的埋葬制度和遺物的風格上看，它跟四川的最为接近，和河南、陝西等地的也沒有多大的差异。因此可以进一步推測此种“梁堆”的死者，在葬仪上与汉族有着共同的風尙。結合当时云南的历史情况分析，我認为这些死者可能就是当时汉族移民过来的“南中大姓”。我們在昭通一“梁堆”中曾發現“孟騰之印”一方，孟姓正是最著名的“南中大姓”之一。至于晚期的“梁堆”，也有一部份是所謂“爨”氏的墓葬，这从爨宝子，爨龙顏諸碑的發現情况上也能够說明。“爨”氏亦为“南中大姓”之一，其渊源亦出于汉族。

綜括以上所說各点，可以确信云南境內的所謂“梁堆”就是东汉以至南北朝之际的“南中大姓”的墓葬。过去認为它是“徭人”的住宅，是举烽火的“狼墩”，是諸葛亮的“謊粮堆”，是元代梁王的墓葬等等不同的解釋及傳說，現在看起来都是不符合实际的了。

“檀龕宝相”

——苏州虎丘塔中發現的文物——

顧　公　碩

苏州虎丘塔的加固工程，已近完成阶段。在施工中曾發現很多文物，其中一件叫做“檀龕宝相”的文物，值得特别加以介紹。

“檀龕宝相”是一种用圓柱形檀木精雕的小佛龕。它的制作，一般用一尺左右的圓柱形檀木，照丁字形縱剖为三塊⊖。半圓形的一塊是主龕，雕主奉的佛像。其余两塊带三角形的作为扉龕，一般是雕脇侍像。龕木边緣上下有小空，用繩联系，可以开合，开时是三連形的佛龕，折合时依然像一段圓柱形的枕木，因此日本人称这类佛龕为“枕本尊”。(本尊，即主奉的佛像)。

隋唐时代，佛教盛極一时。雕鑄造像，成为专門行業。这种“檀龕宝相”旣便于教徒宣教时的携带，又适宜于民居案头供奉，風行一时。但文献上記載不多，初唐大文豪卢照邻有过一篇“乐相夫人韦氏造檀龕宝相贊”。唐宪宗元和元年(八〇六)日本僧空海（七七四——八二五)一即弘法大师一，唐宣宗大中元年（八四七）日本僧圓仁（七九四——八六四)，先后从中国归日本，在他們带回的宗教文物的目录中，都有关于“檀龕宝相”的記載。現存的日本高野山金剛寺一座，据說就是空海当时带回的。又普門院和严島神社也藏有这类龕佛，大約也是同时代的作品。此外，在美国奈尔逊艺术博物館据說也有。国內現在究有几座，則不得而知。又从唐太宗貞观时的“断卖佛像敕文”中也可以零碎地了解一些当时情况。他的敕文是这样写的：

“敕旨：佛道形像，事極尊严。伎巧之家，多有鑄造。供奉之人，竞来买贖。品藻工拙，揣量輕重。买者不計因果，止求賤得。卖者本希利潤，惟在价高。罪累殊深，福根俱尽。違犯經教，并宜禁約。自今以后，工匠皆不得預造佛道形象卖鬻。其現成之像，亦不得銷除，各令分送寺观，令寺观众徒，酬其价值，仍仰所在州县官司檢校，敕到后十日內使尽。”——見广弘明集卷卅五。

这里所謂“預造佛道形像卖鬻”，当然不会是大型的造像，分明是一种待价而估的小型造像，而且也必然包括这种“檀龕宝相”在內。所用材料，不外金屬与檀木之类，因为这些都是当时名貴的材料，所以买卖时要“揣量輕重”。唐天宝二年(七四三)，我国高僧鑒眞(六八八——七六三)第一次預备东渡日本(后遇風雨未果)时，在他的随从的一百多位技术工人中就有专門“雕檀”的工人。这就說明自从印度輸入檀像以后，我們的雕檀艺术就逐步發展成为独立門戶的一种手工業，而这种“檀龕宝相”体积小、用材省、出路广，当时生产是輕而易举的。但其質量必然不会一律，像相乐夫人韦氏造“檀龕宝相”，特請大文豪作贊，原雕当然不是等閑之作。在另一方面，也必然有不少粗制濫造的作品，为此敕文中有“品藻工拙”的說法。

专制皇朝的宗教与政治是有密切关系的。为了統一思想，統一信仰，往往提倡宗教，甚至对教徒許以特权。例如隋唐时的僧尼有免役和不負担租稅等特权。于是人民就蝟曁而趋，形成了一种特殊的龐大势力。这种势力的發展，往往进而影响了統治阶級的兵役和稅收，甚至别有企圖，統治阶級就不得不实行灭法。我国历史上就有过好几次的灭法行动，但不久又来一次兴复运动，在这样的反复兴廢中，宗教艺术遭受严重的破坏。小型造像如“檀龕宝相”之类，易于收藏。因此这一类小型龕佛，在提倡宗教时也受欢迎，在实行灭法时期更受欢迎。根据上述这些不成熟的意見，应該說“檀龕宝相”在唐代是一种很普遍流行的东西，但由于木雕材料的不易保存，傳世就不多了。

現在苏州發現的一座“檀龕宝相”是很小的。它的主龕連座子，高不过十九公分半。木質已略有枯朽，有些地方已模糊不清。当时可能加彩，因年久退色，然尙有描金部分隐約可見。它的主龕雕观音立像一尊，足踏蓮花，下横一藕。藕的左右分發荷叶蓮蓬，蓮蓬上蹲着一个善財，笑捧蓮花一朵。另一面的龙女却不見了。这样的布局，是历来造像所仅見，足見作者的巧思。它的左右两扉，各雕“飞天”、“脇侍”，妙在姿态面貌，各有表情，無一类同。面积虽小，而眉目清楚(像善財的头部，仅有綠豆大小)。作者虽没有留上姓名，然必出当时名手無疑。关于虎丘塔的建造时期，由于这次文物的發現，已有定論。(五代末始工，宋建隆二年完成。）那末此龕的制作时期，自然至迟也是宋初的作品，但从佛像的宝冠形式而論，还可能推前到晚唐时期，这有待于雕塑家的考定了。

苏州市的雕塑工艺，向来發达。無論鏤鍱、夹苧、金、石、磚、陶、泥塑、木雕等像，应有尽有。这一次的發現，在苏州雕塑艺术史上，可謂添上了光輝的一頁，是值得庆賀的一件大事。

在云南考古工作中得到的几点認識

孙太初

云南自1953年以来陆續做了一些考古調查及發掘清理工作，發現了一些古代遺址和墓葬，获得相当数量的文化遺物。由于遺迹和遺物的数量逐渐增多，范圍逐渐扩大，因此有可能讓我們对某些問題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比較綜合的分析，从而得到較为系統的認識或提出新的看法与問題。

我这篇短文就是試圖把解放以来个人在云南考古工作中获得的几点認識提出来，以就教于同志們。限于篇幅的关系，这里所談及的几个問題，也只是一个非常簡单的叙述。

一　滇池区域的新石器文化

云南境內有許多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遺存，过去我們只是对大理一带的稍有認識，其它地区的則知道不多。近年来，在滇池区域先后發現了几个遺址，才扩大了对此一时代文化的認識。

从滇池区域所發現的几个遺址中，我們清楚地看到这些遺址所代表的文化是同屬于一个体系的，时代也大体相同。这可以从两个最显著的共同点上来說明：即这些遺址中普遍存在着大量螺壳堆积層和一种手制泥質紅陶器。

先說螺壳層的堆积情况。在我們發現的几个遺址中，地表土下都有一層很厚的螺壳，它們在遺址中有的是整整一大塊，占的面积很大，有的是零散的几堆。其中只夹有少量的灰土，甚至完全沒有，但是包含着大量的陶片和少数石器及穿孔蚌器。細审每个螺壳的尖端，都被敲通一个小圓孔，这是挑取螺肉必有的一个过程。現代滇池附近的农民挑螺肉仍是用这种方法。在晋宁石寨山遺址的螺壳層中，我們还發現了同一时期人类燒灶的遺迹。

从以上所举的情况来看，这个螺壳層显然是当时人类食用螺肉以后的一种堆积，而非海水中冲积所形成。根据几年来的經驗証明，只要是有这种螺壳堆积層的地方，必然就能找到大量的陶片和其它遺物。

各遺址中所出的陶器，經过綜合分析，大約有以下四种类型：

第一类　泥質紅陶。手制为主。在表皮上和胎子中夹有谷壳一类的东西，可能是制胚时羼进去的。器形較小，只有凹底和平底小碗及小盘两种。無紋飾。

第二类　夹砂灰陶。含石英或螺壳羼和料。多数是輪制。外表皮上有的塗一層本質陶衣，并加以刮平或磨光。器形較大，有竪口罐、撇口罐、双耳盆、凹底杯等若干种。紋飾有羽毛紋、菱紋、波浪紋、交叉紋、籃紋、圓点紋等多种。

第三类　夹砂黃衣陶。部分含螺壳或石英羼和料。輪制为主，也兼用模制。胎子为灰色，在表皮內或外面塗一層黃色陶衣。器形有盆、皿、杯、圈足器等种。部分有簡单的紋飾。

第四类　夹砂橙黃陶。部分含螺壳或石英羼和料。輪制或兼用模制。器形有盆、罐等种。部分有繩紋、三角紋、方格紋等紋飾。

以上四类陶器，在各遺址中都有存在，但以第一类为最普遍，数量也最多，它在各遺址中都占居主要地位，因此我們可以确認各遺址的文化是屬于同一体系的。

若将以上各类陶器，和大理附近發現的陶器比較，可看出两者之間有一些不同之处。从器形上看，大理諸遺址中有一种带流器，在滇池区从未見过；滇池区的一类陶，大理区也沒有。从顏色上看，滇池区的灰胎黃衣陶，似亦未見于大理区域；大理区的灰陶，也不如滇池区之發达。从制法上看，大理区早期多为手制，中期多为轉盘制或刮制，拍制在晚期异常發达；滇池区很少采用拍制及刮制。从紋飾上看，大理区的稀拍紋在飾紋陶中最为突出，而滇池区在仅有四十类陶中的繩紋一种是拍制的，其它多数都是划制；大理区的紋飾，在每一器物上多采用几种不同的基式混合組成，而滇池区都是单一的式样。就整个飾紋陶在陶器中所占的比例来看，滇池区制作飾紋的風气是不如大理区那样兴盛的。

当然，两区的陶器也还有一些相同之处，比如橙黃陶在两区都有存在，某些紋飾或器形也有近似的地方，但这仅是次要的現象，还很难說明两区文化的本質有如何共同之处或前后因襲的关系。

从石器上看，大理区很流行的半月形石刀，滇池区还沒有見过；滇池区的石箭鏃，在大理区也沒有

發現。（最近在劍川县曾發現石箭鏃和石刀等物，但是否与大理的同屬一个系統，还不知道。）穿孔蚌器也为大理所未見。

根据上述的分析比較，滇池区域的新石器文化与大理区域的新石器文化可能屬于两种不同的体系，它們在两个地区各自發展着。从时間观念上說，滇池区域的这种文化可能比大理的要早一些。

二　晋宁石寨山的青銅文化

在晋宁石寨山的古墓中，我們曾發掘到大批的青銅器。这些青銅器，一方面具有濃厚的地方特色，一方面也看出它所受到的外来文化的影响——特别是汉文化的影响。

从数量最多的兵器一类来看，發現的有戈、矛、劍、斧、鏃、弩机、錘、叉等多种形式，除錘、叉两种在內地較少發現之外，其它几种都是商周时期墓葬中常見的东西。而这里的戈和劍两种，还同时保留着內地早晚两期的形制，即也有早期流行的無胡戈，也有晚期流行的長胡四穿的戈；也有長不及尺的短劍，也有很長的銅柄鉄劍和純鉄劍。这些兵器的形制，显然是从汉文化中吸收过来的。但是在装飾花紋方面已有了相当的变化。比如商周时期很盛行的饕餮紋及盘螭紋、夔紋、雷紋等，在这里的青銅器上就沒有保留着。这里所最流行的却是廻形圓渦紋和三角齿紋等种，还有几种动物形象的圖案。这些花紋和圖案都比較朴素自然，不像內地的那样規則化。

石寨山發現的銅鏡，花紋和銘文都跟內地的相似，可能是自內地輸入的，非如銅鼓或其它一些器物是在本地制造。于此亦可窺見汉文化与石寨山此种青銅文化的关系。

其次，石寨山的这种青銅文化，似乎也受到一些楚文化的影响，也可以說在它的發展过程中曾包含着一定的楚文化的因素。要追寻这一点，当然必須連系到庄蹻开滇这一史实上来說，在这里我不打算多說，我只想从器物上举出一点实例来說明一下。在石寨山的古墓中，我們曾發現几件"葫蘆勺"，它的形制和楚墓中發現的完全相似，另外还有一种陶質的彈丸，也跟楚墓中的鉛質彈丸相同。而用大量的朱地黑花的漆器来随葬这一現象，两地也是相同的。这些現象，不能看作是偶然的吻合，而应該認为是两种文化發生接触后所产生的結果。

另外，石寨山的这种青銅文化，和越南古代的所謂"駱越文化"及"东山文化"也有一些关系。这从銅鼓的形制和花紋上可以看得出来，从两地古代交通的关系上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由于目前我还沒有掌握有关"駱越文化"和"东山文化"的丰富資料，因此不能遽作論断。这里只是提出問題来，希望大家来注意研究分析。

总的說来，我認为石寨山的这种青銅文化，是汉代云南很典型的一种少数民族文化，从近年在姚安、永胜等地零星發現的材料来看，这种文化的分布范圍似乎还不限于滇池附近，而可能是更为广泛的。

三　对于云南境內"梁堆"的新認識

云南境內許多地方有一种巨大的土冢，一般人及志書上称它作"梁堆"或"猺堆"，也有叫"梁王堆"，"粮堆"，"謊粮堆"，"狼堆"，"諸葛堆"的。大概自明代以来几百年間，对于此种土冢，有着多种不同的解釋及傳說。近几年，我們对这种土冢曾經作过几次調查与清理發掘，因此对它的內容已获得一个比較明确的認識，在此略加闡述。

"梁堆"分布的区域，据我所知道的有昆明、曲靖、昭通、騰冲等地区的二十余个市县，其中以昭通、魯甸、曲靖、陆凉，昆明等地为最多。

此种"梁堆"，多半散布在小丘陵地帶，很少有在高山上的。它們大都三五成群，聚在一塊。

"梁堆"的外形像一座近代燒磚瓦的窑洞，一般高約三、四公尺，直徑約五、六公尺，用極細的紅土或黃土逐層夯筑起来，在断面上可以看出清晰的夯筑層次，因而可以断定它并非是偶然的堆积。

在土堆下面，必有一座花磚或石塊的筑造物，其結构形式因地区及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昭通、魯甸有拱頂单室式、拱頂前后室式，都是全部用花磚建造的，还有磚頂石墻单室式及双室式，人字頂帶耳室式等种；昆明的都是复斗形单室式，是磚石混合筑造的。昭通一帶的花磚，以几何紋为最多，間有少数画像磚，未見有紀年者；昆明也有几何紋磚和浮雕蓮花的石塊。

"梁堆"中發現的遺物，在昭通一帶有銅洗（部份有在汉年款）、釜、盉、鐎斗、灯、鏡、帶鈎、貨布、五銖錢、搖錢树、鎏金車馬飾、鉄劍、削、鋤、陶灶、倉、俑、罐、碗、石棺等物；昆明附近的多数被盜掘一空，仅有少数殘碎的陶器及五銖錢等發現。公元一九〇一年，昭通倮倮閘一"梁堆"前曾發現孟琁殘碑一通。一九三七年，該县曹家老包一"梁堆"中又發現刻有"建初九年三月戊子造"等字的紅砂石搖錢树座子一具。此外如陆凉的刘宋爨龙顔碑，曲靖的晋爨宝子碑，据說也都是在"梁堆"面前發現的这些出土物，十分有力地說明了"梁堆"实际上是古代的墓葬。这从我們近年的几次發掘工

（下接45頁）

黃鶴楼

孙宗文

随着武汉长江大桥的建成，我国著名的建筑古迹——黃鶴楼，也将以更加雄偉的姿态重新出現在武汉人民的眼前。聞現在已經初步設計了六种方案；其中第四种方案設計的主楼形式近似清代黃鶴楼建筑風格，它的特点为危楼高聳，十分壮观。而第六种方案則以宋代黃鶴楼为藍本，它的特点为迴廊曲檻，便于流連。所有設計方案都是以武昌蛇山的高冠山頂作为建楼基地。高冠山頂标高达85公尺，是該地濱江一綫的最高点。黃鶴楼在这里建成以后，游客們登临其上，可以把整个武汉市区以及东湖風景区、青山工業区等处一覽無余，汉陽和鸚鵡洲当然也仍旧历历在目。

有人問：黃鶴楼的原来形态究竟怎样？建毁于何年？它的建筑特点又在何处？这些問題，我想在值兹恢复修建黃鶴楼的古迹时，将自己所知道的一些建筑史乘，拉杂写些出来，以供讀者們的探討和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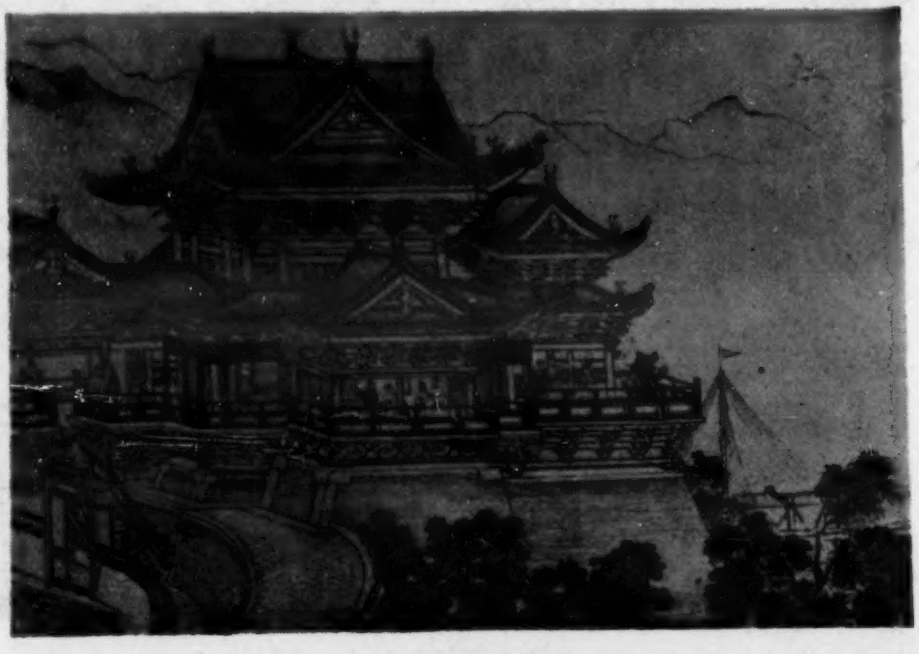
在我国京戏中有一齣戏名叫“黃鶴楼”的，系述三国故事。相傳楼建于三国时代，但征之文献無考，惟南齐書卷十五州郡志条称：“夏口城据黃鵠磯，世傳仙人子安乘黃鵠过此上也，边江峻險，楼櫓高危，瞰临沔汉，应接司部。”所謂楼，当即黃鶴楼，其为六朝以前已有的建筑物，殆無可疑。遺址則在今武昌蛇山黃鵠磯头（今屬首义公园的一部），該处面临大江，風景甚佳。

自从唐代詩人崔顥登黃鶴楼一詩出后，其名始大盛，崔詩称：

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余黃鶴楼，黃鶴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載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陽树，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① 詩的前四句，即是說黃鶴楼成名本事，因世傳王子安乘鶴过此。又一說乘鶴者为蜀汉費文偉，惟此事不見正史；这些当然是一种神話，不过借此我們可以知道一些楼名的来源而已。

黃鶴楼在历史上經过若干次的兵灾火焚，因此它的建筑式样也出現过好几种。形制变迁总的說来大概是：建筑高度由矮到高，建筑面积由广到狭。現在我們能够知道的占时黃鶴楼仅宋、清二代之式样；前者見于画幅，后者見于絲織及照相。宋以前的黃鶴楼形制仅文献中約略提到，如唐人閻百里在永泰元年（公元765年）所作的一篇黃鶴楼記中称：“州城西南隅有黃鶴楼……观其聳构巍峨，高标巃嵸，上倚河汉，下临江流，重檐翼館，四闥霞敞，坐窥井邑，俯拍云烟，亦荆吳形胜之最也。”②至在宋画中我們所見到的黃鶴楼，整体格局虽然仍旧保持着魁偉的唐風，但因当时代的建筑已經受到了五代南方的秀丽和唐代北方壮碩風格的影响，故或多或少地带有一种南北作風的混合風味。

依照过去閩县观槿斋所藏一幅宋画黃鶴楼圖所示楼的式样，楼系建在城垣之上，此种利用原有城垣加厚扩而为台，就台建屋之制，早于三国时已有之，如当时建于魏都鄴城的銅爵、金鳳、冰井三台，皆位于城的西北隅，因城为基址的③。其中銅爵台俗称銅雀台，有屋一百二十間，金鳳台有屋一百三十間，冰井台有冰室三与凉殿等，皆以閣道相通，規模均極宏丽。惜台毁于六朝末（遺址在今河南临漳县西二十里），而又無圖样傳世，因此形制已經不明，至据黃鶴楼圖，知其平面組合全楼共分五个部份，主楼居中，其他則附于四方，采用了四合圍攏的一种方式，故全部設計極为緊湊。临江的一面，用側翼的楼和主楼相联，另一面則采用曲折



宋画黃鶴楼圖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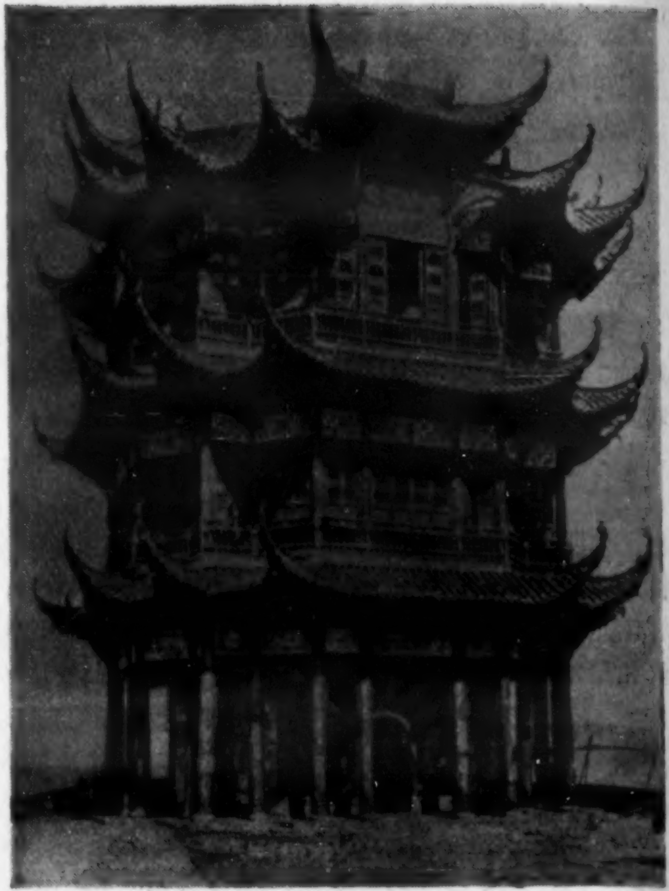
① 見古今圖書集成方輿彙編职方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五卷武昌府部艺文三。

② 同上第一千一百二十三卷武昌府部艺文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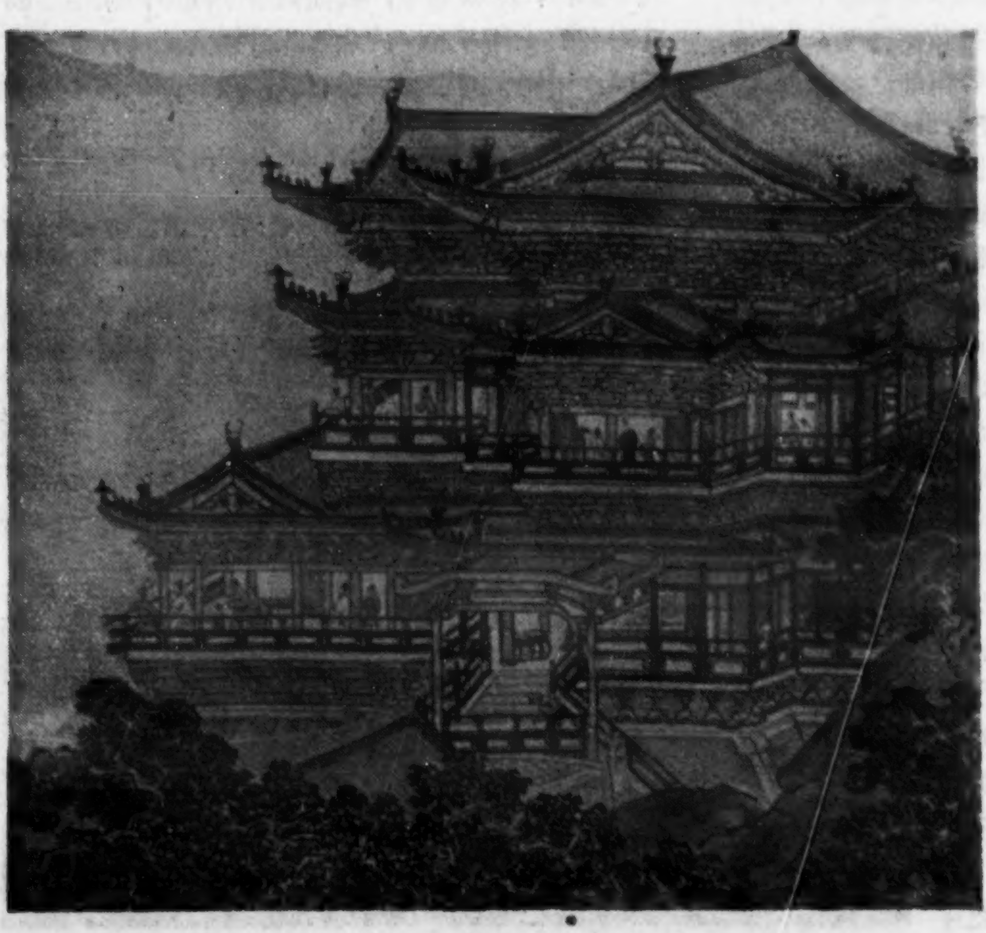
③ 見鄴中記。

的柱廊通达四周。其立面則注重重重楼飞閣較繁复的一种塑型，特别是楼的屋頂式样，采用了当时代最流行的一种結构方式，即在九脊頂（清式称歇山頂）的前后面另出九脊頂，屋脊平面呈十字相交形，如此从楼的东、南、西、北四面看来，均見屋頂的山花作向前样式；因此从它的外观看来，只觉得楼閣嶙嶒，在形象上丰富了許多。此种屋頂形制，在今日北宋的遺构如正定隆兴寺摩尼殿尙可見到④，此外如北京紫禁城角楼，也是仿照此种式样的；所不同者，黃鶴楼中央部份为两層，角楼則仅一層。又黃鶴楼两層两檐，角楼則一層而三檐。又角楼中頂为十字脊，与黃鶴楼虽同，而向城外两方之小部份，其脊与中脊平行，向城垣两方者，則与中脊成直角，此为小异。又黃鶴楼面积甚寬，故成横势，角楼面积較小，故取聳势，此又一不同之点。惟两楼建筑形制同屬一个系統，那是毫無疑問的。

此外又如天籟閣旧藏宋画滕王閣圖与此圖大同小异。按滕王閣遺址在江西南昌城章江門上，閣为唐高宗子元嬰封滕王时所建，为唐代建筑。唐宋建筑是有其相似之处，由此更可得一旁証。惜黃鶴楼在南宋时已毁，故陆游“登南楼記”中述及登石鏡亭訪楼址不可得，經問人云在亭与南楼間，正对鸚鵡洲，但只存楼旁的李监篆石刻了。⑤


清代的黃鶴楼

黃鶴楼同过去一般中国建筑一样，系用木料所构，故不能保存得长久，屡毁屡建，修建次数頻繁。据明人方孝孺黃鶴楼詩卷序，則在元时已复旧而复毁，明初又重建之。根据文献記載知楼自明以后于嘉靖末（公元1566年）被火，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刘懋重建；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及崇禎十六年(公元1643年)又二度被毁。到了清代在順治十三年（公元1656年）由上官鉝重建，康熙三年（公元1664年）又火。此后在康熙四十三年(公元 1704 年)、


宋画滕王閣圖

---

④ 正定隆兴寺摩尼殿的正确建筑年代虽不可知，但据正定县志卷十五中有“太祖皇帝开宝二年……詔遣中使相地于龙兴寺佛殿之北，将复建閣”句，这佛殿即摩尼殿，它的建筑必在开宝二年以前，故为北宋遺构。

⑤ 同②

同治九年（公元 1870 年）均經重修。至光緒七年（公元 1881 年）因江岸停泊船只失火延燒而被焚毀，此后即未曾依照原型重建，仅利用它原来的地基另建了一座半西式的建筑物，取名純陽楼，除了弥补風景的遺缺外，实在有些不倫不类。

今日流傳的清代黃鶴楼照片，系攝自光緒七年未灾前的原物。而乾隆中（公元1765年左右）的刻綠“天下名胜圖”中的一幅黃鶴楼圖，如与照片两相对照，其崚嶒杰閣，聳天峭地之态态，可說毫髮不爽，一般無二；由此可知此楼于康熙四十三年重建后，除在同治九年修理过一次外，在一百七十年間实未尝被灾。

依据照片所示的黃鶴楼式样，其与宋画中所表現的，已大异風格。因仅有一独立的高楼，頗呈孤单之感，不过它的高度已由二層楼發展到三層楼了。平面为亚字形，一称十字折角形，即在每角向內遞收一折，極似当时喇嘛塔塔座的式样。楼全部木构，高达十八丈，楼中并用四十八根木柱支撑，四周各層窗檽很多，可以供游人登临推窗远望。至于楼的屋頂与南方建筑一样，屋角起翹，極为显著。由此数点，可以說明宋、清二代黃鶴楼建筑形制不同之点。惟此楼今日虽毀，但它原来的銅頂却仍完好，保存于山上抱膝亭的后面，銅頂的四周并修建了花壇，以供人們参观。楼頂的頂上部作葫蘆形，下面有荷叶边状的托盘，全为紅銅鑄成，重有数百斤，由銅頂規模的巨大，也可以想見当日黃鶴楼建筑輝煌状丽的一斑了。

（上接 71 頁）

母弟兄自身等延年□寿永□□□□□功□□□一龕□已成就又設斋日祈伏”。这个龕刻着一佛、二僧、二菩薩和二力士像，但它們的气韵却不如千佛岩造像的渾厚。其余各龕造像的風格均与第五号龕基本相同，但皆風化很甚。这里还有一个佛像排列整齐的千佛龕，但因岩石崩落，佛像已殘存無几了。

七里坪在城西南二十五里的孙家河大路側，这里有自山上崩来的体积不大的独石一塊，石上刻佛像三龕，造像龕以两柱一間的閣形建筑物作装飾，門楣以上刻着飞天，飞天的風带飄洒在龕緣上，龕內造像的头部都毀坏了，身軀也風化了，从力士像看来，它的風格与佛尔岩造像極似。

佛尔岩在城西北九十里的涪陽場場头岩壁上，这里有造像四龕，由于岩石較坚硬，所以風化不很严重，但因离地面不高和逼处路側，受到的人为破坏却很严重。第一龕为浮雕日光、月光菩薩像，龕側有造像記为“敬造日光月光菩薩两身（以下字磨灭）大中十四年十一月前□押衙(以下字磨灭)”。这龕浮雕像雕在岩石的縱断面上，已剝蝕很厉害；第四龕龕空無物，仅有二力士像的殘骸站立在龕边上；第二、三龕較为完好，均刻一佛、二僧、二菩薩、天龙八部及二力士（第三龕多刻二天王）。

这里的造像，在数量上并不多，但在質量上却較高。造像的丰滿和細致是这里的特色，第二龕的佛像較之千佛岩开元間刻造的任何一軀佛像在刻工上都要精整得多，造形也較之生动得多；第二龕的菩薩像与千佛岩第三十一号龕的菩薩像比較，除面部已模糊外，在造形上是有过之而無不及的(圖八)。第三龕的力士像更为出色，它的發达的胸肌和开扩的两肩由于得到了适当的夸張而極富健壮感，連它那四肢上的血管，也突出而适当地被表現了出来(圖九)，龕壁上的飞天也極为生动。

第二、三龕刻造在岩石的横断面上，它們和第四龕連接成一排，虽然在第一龕側有大中年号的題記，但就它們的風格与手法的表現来比較，这三个龕的造像都应該是盛唐时期的作品。

莆田元妙观三清殿調查記

林　剑

元妙观在莆田城內的西北方，观外有一条小河流过，河两岸系密集的民居和街道，庙宇建筑被包圍在住宅群之中。这一带地势平坦，果树錯杂，从远处几乎望不到它的全景。民国以后，观內被机关、报社、学校接連使用，屢有拓大更改，現在是莆田第四中学校址。原有建筑布局大都殘缺毁除，校园里已換上了一批新的建筑物，环境面貌可說是大大改观了。

观原来的規模范圍相当大。据当地老年人說：观內系一整群建筑，有头門，天地殿、三清殿、通明殿、九御殿、賜君殿、东岳殿、西岳殿等。东岳殿和西岳殿配置在三清殿的两旁，其余成一直綫排列。观內塑像碑刻大都毁弃，仅剩一座宣和御制御書的神宵玉淸宮殘碑。現存的建筑物有：一、天地殿，单檐歇山造，面闊五間，进深二間，原系安置四大天王，現改为学校的膳厅、宿舍。石柱蓮花复盆仍是古老手法，柱頂只用单挑斗栱，唯栱头卷杀砍法，仍保存古制。二、东岳殿，硬山式，共分三进，面闊三間，系近代建筑。三、西岳殿，硬山式，面闊三間，深二进，亦近代新构，椽架斗栱之間遺有剝落的苏式彩繪。四、三淸殿，重檐歇山造，結构簡朴，手法特殊，是現存建筑物中最有价值的一座。其建筑情况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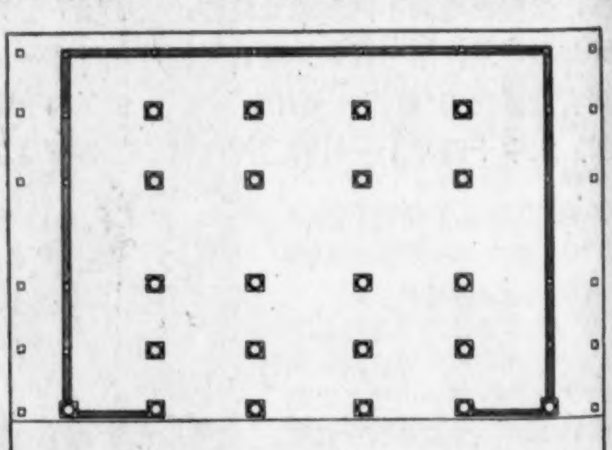
1．平面：殿南向，面闊五間，进深十架椽，近代在殿四周加了一層木及磚砌的柱子，成为現在面闊七間进深六間的重檐形式。梢間及歇山部分重經后代竄改，柱头只用单栱，石柱多改为木料，柱下用石礩。实际仍保存宋式手法的部份，仅只有当中的三間。当心間最寬，以外各間漸窄。內槽三間共有金柱八根，殿內原有神台塑像無存。殿外原有石台丹墀，現在只有石踏步四級（見平面圖）。

2．外观：殿重檐歇山造，四垂脊端各安四尊天王泥塑，正脊两旁鴟吻作燕尾式，这种作法是后代重修时造成，和今天当地民間手法是一个样式。瓦檐不用飞椽，屋頂坡度比較平緩，前檐当心間、次間空着，原系装隔扇，梢間、山面系磚墻。現在門窗、后檐木骨泥墻，筑在外廊木柱之間，是后来重修时改建的。上檐出檐甚大，外檐斗栱之外加了一層柱子，以致現在外观看不到上檐斗栱。迴廊一周也是后代增加的，这就是現在重檐的下檐部分。廊柱用細木料及磚砌方柱，柱頂用单挑华栱，柱下無础，和內部木构不同，应是淸代重修时加上去的。

3．柱础：殿內三間原构的柱下用蓮花复盆，徑0.74米。复盆下为方形础石，每边寬0.80米，柱子用木石連接，徑0.54米，大部分为石質，木料仅在櫨斗之下用一小段。柱頂微具卷杀。。石柱上还有明崇禎重修題刻。平柱高3.37米（木質部分高0.35米），斗栱总高2.66米，二者之比約为3：2，角柱与平柱同高，無側脚生起，內槽金柱高5.5米（木柱部份1.5米）。

4．斗栱：大殿有柱头、补間二种斗栱，轉角及歇山部分被后代改修已非古式作法。斗栱系双抄三下昂重栱偷心造。材高25—29.5厘米，寬11—12厘米，补間鋪作前后檐各一朵。山面系近代結构。柱头櫨斗总高24.7厘米，边寬56厘米，斗底寬52厘米，耳高4厘米，平高3厘米，欹高15.9厘米，欹內收4厘米，斗底現出皿板形，高約2.2厘米。补間櫨斗比柱头小，每边寬33.5厘米，斗底寬30厘米，平高2厘米，耳高3厘米，欹高8厘米，欹內收3厘米，斗底現出皿板形，高1.5厘米。交互斗、齐心斗、散斗大小几乎相等，总高11.2—13.5厘米，边寬25.5—30厘米，斗底寬20—24厘米，耳高1.6—2.5厘米，平高2.6—4厘米，欹高7厘米，欹內收2.7—3.5厘米，斗底有的無皿板形。無論华栱、橫栱的栱头都砍作四瓣，华栱第一跳挑出50厘米，第二跳30厘米，泥道栱总长1.08—1.16米，瓜子栱总长1.02—1.04米，慢栱总长1.60米，令栱总长1.04—1.12米，替木总长1.92米，寬厚各0.12米。

柱头鋪作：櫨斗之上向外連挑出华栱二跳，第一跳偷心，第二挑上用重栱，出华头子，华头子后尾与內挑第二道华栱上托的乳栿（如棱形）連成一起，再上出下昂二跳，第二跳下昂之上为令栱及耍



三清殿平面圖

三清殿梁架

头，但此耍头完全作成昂的形状，所以成为双抄三下昂，令栱两端用散斗承托替木及撩檐槫，替木砍法长方，两端尖削（当地匠人叫“古鷄”做法），替木之間前后伸出鈎状物，如耍头大小。下昂（即耍头）穿过罗汉枋，尾部挑承金柱頂伸出的斗栱后尾及下平槫。

柱头之上施泥道栱、素枋各一層，其上又施瓜子栱，素枋各一層，再上用瓜子栱，慢栱二層承替木及正心槫。

柱头向內連挑出华栱二跳承托乳栿，乳栿正中頂上置駝峰及斗以承三下昂尾，駝峰刻波浪紋，全长1.23米，高15厘米，寬12厘米。

补間鋪作：作法同柱头鋪作，唯櫨斗較柱头櫨斗为小，斗下两旁出波浪紋駝峰，替木之間前后不出鈎状物，鋪作后尾連挑出华栱四跳以承三下昂尾，第三跳华栱系华头子后尾，第四跳华栱緊貼在第一下昂之下，栱身尖削，做法比較特殊，第一下昂尾砍作卷杀，犹如栱斗。

后檐斗栱作法同前檐，唯昂尾較尖，第三下昂头砍如乙形，槫下不用替木，令栱之上前后出コ物。

5．梁架：前后进深十架椽，內外槽为“徹上明造”，没有天花板。两柱之間施闌額，不用普拍枋，前后檐之闌額皆作長方形，高29厘米，寬12厘米，前檐柱与內槽前金柱之間施乳栿一根，其一端架在外檐柱斗栱之上，另端插入金柱，下承金柱間挑出的华栱一跳，乳栿之上以駝峰散斗上承三下昂尾，前后金柱間施一根四椽栿，砍作月梁形，徑0.75米，金柱之上从柱头櫨斗出三跳华栱以承四椽栿，四椽栿两端穿过柱头枋，尾端砍成尖弧状。四椽栿之上分置駝峰散斗二座以承平梁，平梁砍作月梁，平梁两端出横栱一道，上以散斗承替木及上平槫。平梁之上正中叠置散斗二个，两旁出弓形木与两上平槫下的散斗連結起来，斗上又以十字形斗栱承替木脊槫。

当心間次間前后部金柱之間用內額二層，其上又用横栱及枋各一層。后檐柱与內槽金柱之間亦施乳栿一根，作法同前檐。

歇山及轉角梁架因被后代修改，没有宋式作法，故略而不談。

6．彩飾：大殿梁架都塗土朱，但已褪色剝落，斗栱和椽檩另刷一層粉，上面繪画，內容有飞馬、果盘、戟、蝙蝠、蓮花、牡丹、芍药、葫蘆、鯉魚、麒麟、炼丹壶、号角卷書、双錢、枝叶纏花等，这些題材可能都与道教有关。

从三清殿現存的三間旧构来看，它的作法和福州华林寺有相同处，如手法上大木方面只有闌額不用普拍枋，柱头微具卷杀，斗栱雄大，华栱两層皆用单材挑出，斗底有皿板形，斗欹有顱，这些都是同一作風，推測它們的建造年代应是相近，不会晚于宋、元时期。建筑結构方面表現出殘缺，后代竄改相当厉害，如歇山及轉角部分已看不到原构，即在仅存的宋式手法中，也可以看出历代葺修頻繁的痕迹，如用材长短不一，有的斗底無皿板形。大殿当心間脊槫下墨書“唐貞观二年敕建宋大中祥符八年重修明崇禎十三年岁次庚辰募緣修建”，两次間脊槫下書“皇清光緒廿四年岁次戊戌荔夏穀旦重修”及“花翎补用直隶州兴化粮捕通判广陵楊万清捐廉倡修”，又檐槫下書“明通进士特授文林郎知江西南昌府丰城县事加三級何焜煌偕男太学生毓昭毓云毓英孙熙郎喜題白金壹拾两正助建者。”大殿石柱上題刻“本观提点主持城隍庙楊大琯郭稷喜舍”，“明崇禎辛巳方門林志口喜舍，”“本观提点主持东岳庙林德周喜舍并募”、“道士丘以恭喜舍，”“城东厢郑元燕喜舍。”这些都可說明历代修理的概况。

兴化府莆田县志卷四載：（乾隆版，卷四頁四十六）

元妙观在郡城东厢，俗呼旧观，宋大中祥符二年奉敕建，名天庆观，天禧元年降賜金宝牌芝草山及封禪祀汾陰等記仪范等書，元貞元年賜額，明永乐五年薛道銃重修，嘉請丙辰道士方汝調、李志升重修玉皇殿，甲子太守易道談重建山門，万历辛巳玉皇殿坏，道士陈君严等募建；又道士卓茂乔募建文昌宮五显庙，道士陈茂瑞募建元帝庙，后先助建者：朱有开、郑选、林廷皋之力居多”。

按現存木构及記載，三清殿創始于唐、宋，其后历代修葺，現存形式是保留了一部分宋式手法，一部分被完全改建，另外又添一些新构，如四周走廊部分，使建筑物带有新旧两部分，宋式构架被圍盖在里面。

大殿年久失修，屋頂破漏，柱子上面的額枋、斗栱，解放前被学校鋸断一部分，影响整个构架松动，梁架傾斜度最厉害处达十余度，斗栱、梁枋腐烂不少，亟須葺修保固。去年十月間由中央文化部撥款修繕，經省文物管理委員会派員与建筑設計部門共同实地勘查，决定翻修屋面，拆换烂料，梁架傾斜的加以扶正，添补闌額、梁、枋、斗栱，修繕工程于今年一月竣工。建筑物上的缺点毛病得到了糾正，初步恢复了原来形制。

韓城县所見的元代建筑及其基本特征

何修龄

陝西省文管会派我去韓城芝川鎭勘查司馬迁太史公祠的現状，使我得到机会訪寻了韓城县城郊附近的一些元代建筑。这批建筑都集中地分布在同一个地区之內，相距都不很远，从它們的外观及各部分結构上所表現出的某些共同特点，可以增进我們对元代建筑物的了解。

一　西庄法王庙献殿

法王庙在西庄鎭的西北端，距韓城县約二十里，据县志記載：“……案神姓房名寅，以宋眞宗梦中治瘟显，勅封五岳法王，于槐柏相抱間营宇繪象以崇典礼，每岁清明，四方来祀者輻輳。县册明崇禎五年，黌生姚起鳳等行实碑記。”（詳見韓城县志卷七方技篇房寅傳）庙应是宋眞宗年間創建的，惟現存建筑仅前殿形式較古朴，其余正殿等均晚淸重建；前殿梁架結构也是經过重修的，其外檐各部分，都十分类似下面所見的几处元代建筑物。庙內碑記已全毁，其确切的創建年代及重修、增建的經过，已無从考据，因此仅就个人的初步鑒别列为元代建筑。

殿为琉璃瓦单檐悬山頂，面闊五間，进深四椽，斗栱四鋪作出单昂，有如下几个特点：

1. 昂头上交互斗，使令栱与耍头相交，通檐四椽栿尾砍成斗的形状，置于耍头上，齐心斗的位置，和令栱上的散斗一同承托着撩檐枋，枋又承槫。昂为假昂，下带华头子。其斗栱，大部分均有显著的顱杀。

2. 前后檐柱与柱間不用栏額，只两次、稍間施罩幕枋，柱头上用一条直徑約五十公分通长的原木代替普拍枋，檐柱并用减柱的方法，將次間明柱减去，而將当心間的两根平柱各移置在次間之中，至使柱头鋪作脫离柱头。后檐則又在平柱的內側另支八角石柱各一根，但很明显这是以后重修时附加的。

3. 补間均不用斗栱。

4. 各槫两端出际深长，槫头釘博風板并悬魚、惹草。

5. 山墻厚实稳重，可以將角柱完全包藏在墻里，墻身向上逐漸收分。

二　昝村禹王庙献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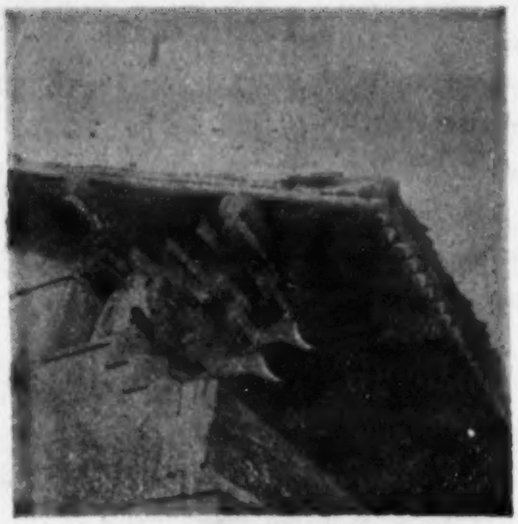
昝村在县城东北二十里左右，与西庄鎭相去不远，同为韓城县北塬上的两大市鎭，禹王庙即位置于昝村鎭的西南隅，現为昝村小学校舍。庙內現存主要建筑物，只有寢殿、献殿和殿前的戏楼。关于庙的建置，無文献記載和碑文可考。

戏楼是后世增建的，寢殿从它的梁架結构各方面看来，已掺杂着淸代的建筑式样，惟殿內神橱上雕飾的斗栱和它頂部的平棊格式，犹存明代建筑風格。

献殿現已改作教室，它的形制异常特殊，十分惹人注目。

1. 平面和柱的排列：按我国古代的殿宇建筑，面闊都是三間、五間或七間、九間。当心間通常面闊大于次間，而次間面闊又总是要比稍、尽間略为大些。但这座献殿面闊竟是四間，而各間的面闊又大致相等，其通面闊为 15.20 公尺，进深是 8.10 公尺，二者的比例約为 1.88 与 1 之比。

禹王庙前殿外观



禹王庙前殿前檐斗栱側視

柱的平面排列法也很特殊，前檐用减柱法，除角柱外，只用金柱两根，并依柱把它排列成三間殿的模样，使当心間的面闊加大于次間面闊的六分之一。更奇特的是它的后檐柱，既不同于前檐施减柱之法，也不依梁架的椽数用柱，而是别开生面地多增添了一根平柱，把它們布匀成五間殿的形式，凡柱中到柱中的寬度又都大致相等，因此，当地群众称它为前三、后五、暗四式的建筑物。角柱也都完全暗藏在山墙中間。山墙底寬1.10公尺，上寬約1公尺。其柱高約2.80公尺，柱徑平均48公分，柱高約为柱徑的6倍。

2. 屋頂：为布甬瓦琉璃脊单檐悬山頂，进深四椽屋，前檐高約4.90公尺，檐出約1.74公尺，各槫出际达1.20公尺。前后檐槫的中距是8.10公尺，举高約2.40公尺，其比例則約当3.64比1，虽然略高于法式4与1之比的規定，但和檐高相比，其举折不但平緩，并且显得矮小，似乎有些不大相称。

3. 斗栱：前檐斗栱为五鋪作出双昂，重栱計心造，于上跳之上横施令栱与耍头相交，上置替木以承撩檐槫。斗栱的出跳，第一跳跳长为30公分，第二跳跳长是25公分。其內檐斗栱則为五鋪作出双抄，重栱計心造。后檐斗栱为四鋪作出单昂，令栱也与耍头相交，上置替木以承撩檐槫，內檐斗栱則是四鋪作出单抄。凡耍头后尾都砍成楮头，压在椽栿下。昂俱是假昂，昂下也都刻华头子。斗栱的总高为95.5公分，和柱高相比，其比例例为1与2.94之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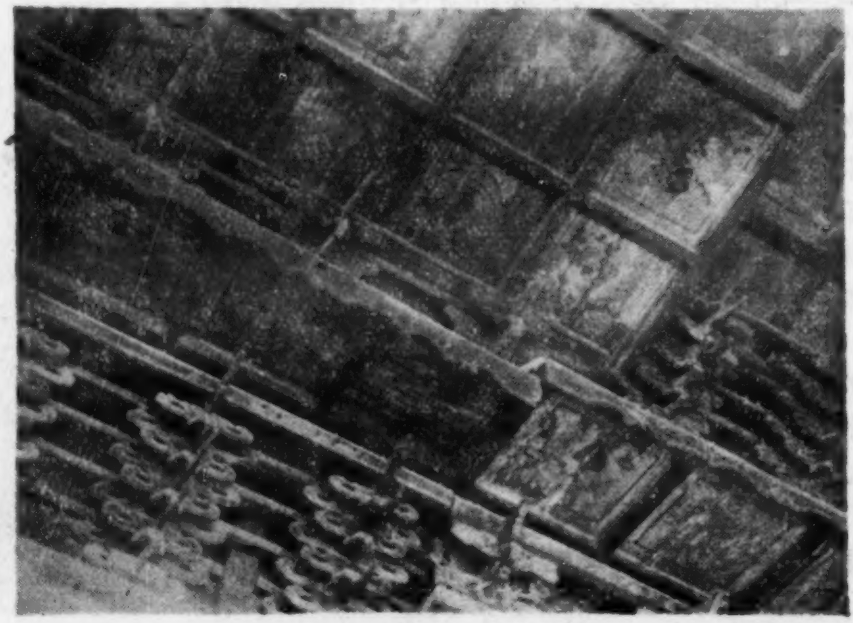
每層斗栱之上，均只施素枋一層，补間皆不用斗栱，在泥道栱的中衍綫上不施栱眼壁’至于斗栱的位置及攒数，也都是依梁架的椽数为定。

4. 梁架：徹上明造，通檐四椽栿上置駝峰以承平梁，蜀柱之上有丁华抹頦栱及叉手，但大部分均經后世补修拆换过，已非原有的构件。四椽栿系用粗大的原木稍加鉋制而成，栿尾均刻作齐心斗。在西首四椽栿下，竟發現了一行墨笔題字，上面写的是：“元元統三年乙亥岁創建”（元統三年为公元1335年），因此，使我們得知它的确切的創建年代，惟字迹已甚模糊。

前后檐柱与柱之間不用栏額和普拍枋，也不用罩幕枋，只在柱头上置一根很大的額枋，它的平均高度为64公分，寬則48公分，因为頂面高凹不平，故其上所坐櫨斗斗底多墊有一層皿板。

三　薛村三聖庙献庭

薛村三聖庙在昝村鎮西南只有一里多路，据庙內現存嘉庆二十四年岁次乙卯撰刻的重修庙工碑記載：“……庙創自至元十年中，祀……关帝饗以献庭，侑以戏楼，历明及清重修再四……然岁月遞迁，風雨飄零，墙木不無傾腐，神像多有剝落，社之父老相顧惻然，虑其食膺，謀以豫立。……由是迁建厨房，先为聚土，既而卜辰諏日，增高庙基，补砌池岸；墜者举，廢者修，弊者换，缺者补，两池白楊多供庀材之用。……庙庭既成，鐘鼓之楼漸起，厨院前房，借旧台之木漸起，改隅立山門重建于中，創漸成之戏楼，移建于南。平鋪月台，門以內廓如也，对建碑門房以外翼如也。工至此，顧而乐，犹未已也……”。这段碑文对庙的創建年代及重修概况，以及有关庙的建制，都已作了概括的介紹；而正殿当



禹王庙正殿中的小木作

心間两端四椽栿下墨笔题字：“元至元十年岁次癸酉三月本村前社創建，至明永乐二十一年岁次癸卯四月重修，嘉靖六年岁次丁亥九月重修，至嘉庆二十二年岁次丁丑十一月重修，至二十四年乙卯三月告竣”，与碑記完全吻合。至元十年，应是公元1273年。

今庙內主要建筑物，除戏楼是清代建筑，正殿也是經明、清重修，結构杂乱。保存完好的元代建筑只剩下献庭一座，特别值得珍視。其形制概述如下：

1. 平面和用柱：献庭为布甬瓦琉璃脊悬山頂，面闊五間，进深四椽，当心間和次間的面闊各为2.75公尺，稍間反而較大于明、次間，通面闊是13.80公尺，进深共7.20公尺，二者的比例約为1.92比1。

柱高2.85公尺，柱徑43公分，柱高約为柱徑的6.63倍，柱礎为素面凸圓形，狀似复盆，高仅20公分，其上徑与柱徑約略相等，底徑較大，約为64公分。前后檐各减去当心間左右平柱两根，而将次間平柱（即左右第二縫柱）各向外移置1公尺左右，并令布匀。

山墙的底寬是1.10公尺，上寬只0.67公尺，平均每高1公尺，墙身向內約收进14公分，角柱也完全暗藏在山墙內。

2. 斗栱：前檐斗栱为五鋪作出双昂，重栱計心造，內檐为五鋪作出双抄，重栱計心造。后檐斗栱則为四鋪作出单昂，內檐为四鋪作出单抄。外檐斗栱，皆于令栱之上置替木以承撩檐槫。耍头与令栱相交，其尾部俱砍成楂头，压于四椽栿下，栿尾也都刻成齐心斗；每層斗栱之上也只用素枋一層。外檐斗栱第一跳，出跳的跳长是38公分，第二跳的跳长为30公分。斗栱总高为97公分，和柱高相比，約为1比3.14。它不論在形式上和所在的部位，以及攢数都和上面所見的几处元代建筑一般，斗栱都有顱杀，昂下也都有假华头子。

3. 梁架和襻間：通檐四椽栿上置駝峰与平槫下的襻間枋相交，其上坐斗以承平梁，并与捧节令栱相交。平梁之上置蜀柱，蜀柱下安合楂，于叉手的上角內安栱并出丁华抹頦栱，脊槫下用两材襻間，隔上下相閃。

在外檐柱头之間，通常置栏額的部位上用一根高25公分，厚約16公分，长随稍、次間的罩幕枋；柱头上也是用一根通长的原（暫称柱額）代替普拍枋，其直徑約为40—50公分，因此櫨斗的底部也都垫皿板，它的高低厚薄，則視柱額頂面高凹的程度而定，柱間施卓罩枋。

四　孝义村关帝庙正殿

孝义村关帝庙在县城东北，距城約五里左右，它的創建年代是元大德七年（公元1303年）；今庙內所存的順治岁次乙未重修关帝行宮兼口文昌大帝神祀碑記和乾隆二十八年岁次癸未十月重修关帝正殿及乐楼并鑄造鉄獅序等碑刻上都有記載。惟庙內元代建筑的遺存，已只剩正殿的前檐部分，其余則都已面目全非了。然而，就这前檐部份的原有結构，也是不可忽視的，因为它同样是元建遺存的眞实紀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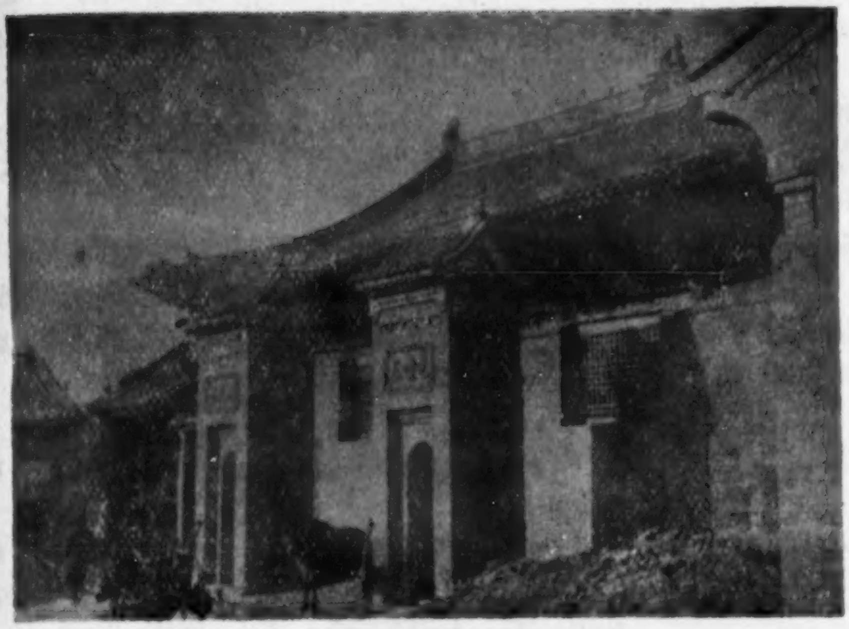
这座正殿为布甬瓦琉璃脊悬山頂，面闊三間，进深四椽。斗栱四鋪作出单昂，它的前檐結构与形式大致也和上述几座元代建筑相似。

因为它的面闊只有三間，故外檐用四柱，惟将五柱的位置，各向左右次間移出約有65公分，当心間和次間的面闊，本来相等，各为3.18公尺，經五柱移动位置后，当心間柱中至柱中的面闊就加大到4.48公尺，而次間面闊就相对地縮小到2.53公尺，因而当心間就扩大到約为次間的1.77倍。

前檐共用斗栱四攢，其位置都在四椽栿尾下（包括轉角鋪作），櫨斗下也用皿板垫衬。自櫨斗口均出假昂一跳，昂下刻假华头子，昂背置交互斗，其上横施令栱与耍头相交，令栱之上有齐心斗并置替木以承撩檐槫。

前檐平柱高2.94公尺，柱徑42公分，西首角柱高亦2.94公尺，柱高平均約为柱徑的7.3倍，但东首角柱較低，只2.91公尺，因柱額也用的是一根未經加工平整的原木，故一头粗大而另一端則比較細小；角柱位置在柱額較細小的一端就必然要升起一些。又因柱額的上皮也頗不平整，因此在櫨斗之

三聖庙献庭外景



普照寺外观

下，也有需要加垫一層皿板。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东首的前檐角柱竟是梭柱造，形同一个直立的橄欖，柱身上、下如栱卷杀漸收，因而两头逐漸細小，柱頂的直徑約小于柱身中徑16公分，柱的底徑亦小于柱身中徑12公分，这在实例中是很少見到的。柱头間不用栏額，但在栏額的部位上施罩幕枋。

五　吳村普照寺

吳村在昝村鎮西約一里許，普照寺位置在村南。寺为布甬瓦琉璃脊歇山頂，面闊五間，进深六椽。殿內有泥塑如来佛及阿难、伽叶等五尊，殿中置佛壇，如来佛居中，又于壇上設立八边形的須弥座，座上有仰蓮瓣四層，佛即盘坐其上，身后飾背光及头光。一般的佛寺，往往在殿中佛頂上設有藻井，但在这里所見的元代建筑，佛殿內部都不見有藻井，其梁架多用徹上明造，仅于佛壇頂部支一層平棊。壇的前后各立頰柱数根，額枋刻如意并悬以垂花柱。此殿佛壇頂部的各項小木作均雕制精細，与塑像的造型都酷似明代艺术風格，很难使人相信是元代的遺物。

关于寺的創建年代，文献及碑文上都没有記載，惟殿內西首四椽栿下有墨笔題字一行，“維大元国奉九路韓城……（以下数字看不清）”。观其外形、結构，是元代的建筑則是可以肯定的。

1. 斗栱（無补間鋪作）：

柱头鋪作：五鋪作出双昂，重栱計心造，于第二跳昂上坐交互斗，斗上横施令栱与耍头相交，上置替木以承撩檐槫；耍头后尾砍作楂头压在通檐六椽栿尾下，昂下均刻华头子。內檐斗栱为五鋪作出双抄，单栱計心造，其第二跳华栱头上無交互斗和令栱，仅置散斗一个，斗口与华栱成平行方向，楂头便自散斗口伸出以承六椽栿尾。惟当心間柱头鋪作櫨斗周圍刻作弧瓣形状，这是乾隆年前后習見的一种地方手法，可能是經清代重修时更換了的。此外，除泥道栱及慢栱之上均施罗汉枋一層，上、下枋之間垫以散斗，并用磚土泥壁，內外檐瓜栱之上均只施素枋一層。

轉角鋪作：于45°斜縫上出角昂及由昂，但第二跳由昂的昂头上不用角神，仅置散斗一个，斗口出耍头上承角梁耍头的尾部也砍作楂头，其內檐則出华栱两跳，上承楂头以托梁尾，角梁的尾部搭在斜梁之上。其結构十分簡潔了当。

2. 梁架及襻間，通檐六椽栿背和第二槫縫垂直相对的部位上坐斗与襻間枋相交，枋上施捧节令栱以承下平槫并与四椽栿尾相交。四椽栿于第一槫縫下置駝峰与襻間枋相交，枋上施捧节令栱以承上平槫并与平梁梁尾相交。平梁上置合楂以立蜀柱，柱头与襻間枋相交，其上坐斗；于叉手的上角內安丁华抹頦栱，并与捧节令栱相交，上承脊槫。

3. 柱：六椽栿下正对第一槫縫的部位各立金柱一根，柱头上安合楂用以支撑六椽 ，但观其形状，很有可能是重修时增加的，正同它的外檐轉角鋪作，在角昂之后也立木柱一根，以加固它的殿角一般。

4. 墙：除山墙而外，前后檐亦用檐墙，墙身厚达1公尺余，向上逐漸收分，故檐柱亦施暗柱，仅微微露出柱头，柱头則有生起。除前檐当心間开門，其余檐墙每間正中自墙高約五分之三起至墙肩頂止，均开有窗口，安装直欞格子窗。

六　紫云观三清殿

紫云观在县城西北約三里許，位居象山麓东，現改为陕西省韓城中学校办公院址。据县志記載，此观为元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𠜎修，令史段秉昭有記，惟碑記現已寻找不着。

观內現存主要建筑物仅有三清殿及老子殿。三清殿前，东、西各有配殿三間，据說是原先的閻君殿。除三清殿外，其余的建筑物都已改变了本来的面貌。

三清殿为布甬瓦琉璃脊歇山頂，面闊三間，进深四椽，殿前有雨搭三間，进深一椽，与三清殿殿身通連，儼然是一座整体的建筑物。殿身之下用磚砌台基，高1.28公尺。雨搭之前更有月台，台高1.15公尺，略低于台基的十分之一。

此殿外檐斗栱亦無补間鋪作，柱头用四鋪作出单抄，于跳头上横施令栱横与耍头相交，上置替木以承撩檐榑。轉角鋪作出单抄单昂，于角华栱之上出由昂，惟由昂之上不見有角神。除山墙之外，前后均有檐墙，故所有的山柱和角柱以及前檐柱都用暗柱，仅見柱头微露在墙肩之上，角柱亦有生起，所有斗栱大部分都有显著的顱杀。

栏額和普拍枋两际各出柱头，栏額出头部分皆刻作菊花头，普拍枋高不过10公分，寬只20公分許，似为后世重修时另换的。

此殿現为学校圖書室占用，其梁架結构因有頂蓬遮隔而未能察看，但从整座殿身的外观及其造型看来，其举折相当平緩，屋檐也十分玲巧圓和，所施斗栱的形制也都还保持着較早的建筑形式，它可能是目前紫云观內唯一的元代建筑遺存。

从上述元代建筑的互相比較，归納出它們的基本特征如下：

一、立面：

（一）殿宇之用悬山頂者，除已發現的山西五台山佛光寺金天会十年重修的文殊配殿而外，尙不多見。但从这批建筑物看来，元代的宗教建筑，寺中主要的殿宇已多采用悬山頂，此种悬山頂的琉璃脊一般都比較低矮，除脊的正中，每每飾以塔刹似的建筑模型，且在两側列有一对至两对作奔馳式的馬，或馬背上更有騎乘者，其姿态与風格均类似元墓中出土的騎俑，但較其生动活潑。

（二）屋頂的举折平緩，接近宋营造法式所規定的举高，且两际出檐深远，榑头均釘博風板及垂魚惹草，犹存古制。

（三）山墙厚度一般均超过1公尺，墙身上有显著的收分，墙基均無勒脚，它的長度与台基的下出差不多等齐，山柱和角柱全部用暗柱，仅仅微露柱头，台基一般都不甚高。

（四）柱身低矮肥碩，柱高多不过3公尺，但柱徑一般均在40公分以上，其柱高平均为柱徑的6.5倍左右，較之清代的檐柱其高規定为60斗口，柱徑只10斗口，尤有显著的差別。柱础則一般均不显露在地面上。

（五）柱头上大多都横置一根用原木稍微加工制成的粗大笨重的柱額，柱头之間習用罩幕枋代替栏額。

凡柱头上用上述粗大的柱額时，其上所坐櫨斗的斗底每多加垫一塊皿板。

（六）習用减柱造，無內柱者，外檐柱每多减去平柱若干根。

（七）撩檐榑下一般都不用撩檐枋，而以令栱上横置的替木代替。

二、平面：

（一）通面闊与进深一般都接近2与1之比，当心間和次、稍間的面闊大致都相等。

（二）因面闊一般較小，故前后檐間的平柱習用减柱造或移动平柱的位置，使柱头脫离了斗栱和梁头，借以增大面闊和柱中与柱中的間隔，其眞面闊則恒依梁架的檁数为准。

三、斗栱：

（一）斗栱形式簡潔，配置亦疏朗，一般皆不用补間鋪作。

（二）外檐斗栱一般只出一跳至两跳，并習用假昂，昂下多帶华头子；內檐則不用昂，只出一抄或两抄。

（三）后檐斗栱常較前檐减少一跳。

（四）外檐斗栱皆于上跳交互斗之上横置令栱与耍头相交，上置替木以承撩檐榑及耍头后尾多砍作楷头，压在通檐四椽栿或六椽栿之下，梁头則都刻成齐心斗。

（五）斗栱均有显著的顱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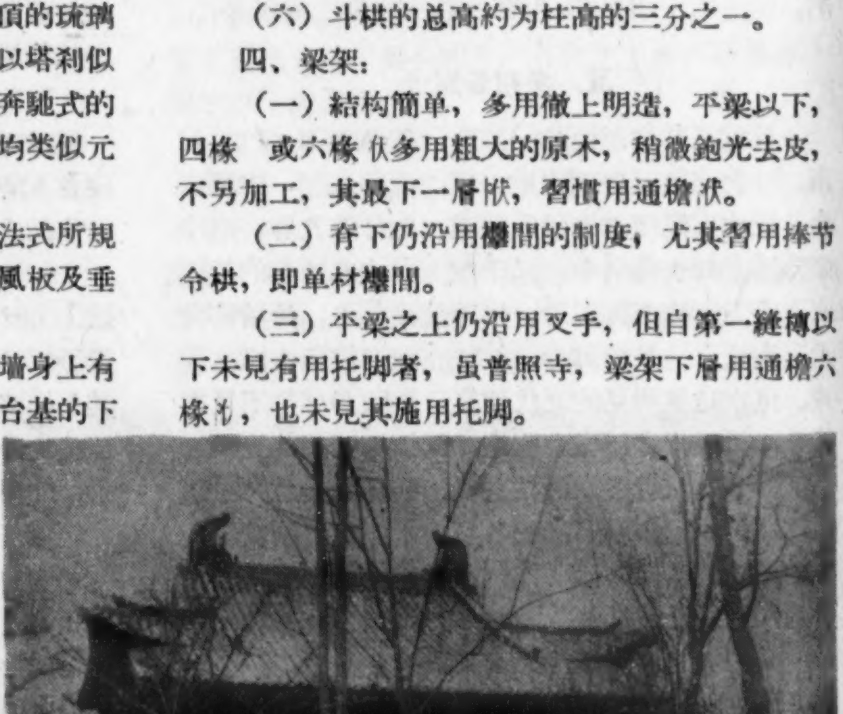
（六）斗栱的总高約为柱高的三分之一。

四、梁架：

（一）結构簡单，多用徹上明造，平梁以下，四椽栿或六椽栿多用粗大的原木，稍微鉋光去皮，不另加工，其最下一層栿，習慣用通檐栿。

（二）脊下仍沿用襻間的制度，尤其習用捧节令栱，即单材襻間。

（三）平梁之上仍沿用叉手，但自第一縫榑以下未見有用托脚者，虽普照寺，梁架下層用通檐六椽栿，也未見其施用托脚。


紫云观三清殿外观

黑龙江省的几处文物遗迹

王震中　沙振宇　丹化沙

一　唐代渤海国上京龙泉府东京城遺址

东京城遺址在宁安县城西南約七十里的东京城鎭，是古代肃愼国地。西汉到晋，改名挹娄（見汉書和晋書的东夷傳）。到了北魏分裂为七部，归七个酋长来統治，宁安县是屬当时的靺鞨拂涅部的。

李唐統一中国，建立了强大的封建王朝，靺鞨拂涅部同时列入了唐帝国的版圖。

武則天时期，靺鞨拂涅部又强盛复兴起来，吞并了其他的各部落，建立了渤海国。疆域幅員有五千多里，国家建立了将近三百年，拥有現在的辽宁、吉林两省和黑龙江省的一部份，以及朝鮮人民共和国的咸鏡、平安二道。建立了五京、十四府、六十六州、一郡、一寨、一百三十八县（見唐晏渤海国志）。国家的一切官制、章服、仪衛、礼乐，全是仿效唐朝。宁安县就是当时渤海国的首都——上京龙泉府东京城。

辽太祖（阿保机）并吞渤海国以后，东京城是辽的临时首都。女眞族的金兴起后，灭了契丹族的辽，在金太宗完顏阿骨打沒有灭北宋以前，这个渤海国的东京城仍旧是金朝的临时首都，并且大加建筑和扩充。

东京城鎭，分內、外两城，周圍三十里，內城周圍有五里，外城是現在的市鎭，已沒有什么遺迹可考。現在还可以看到的是內城（禁城）的三殿基址。基高一丈多，上面排列礎石，每排均十到九間，圓徑二尺四、五寸。淸末宣統年間，当地人曾就五鳳楼遺址修建殿宇数椽，殿基下面，左右面各有屋三間，是和尙的住所。

內城东西南各有一門。城墻堆石为基，土墉有一丈多高，沒有雉堞，有的地方已經坍塌，缺口很多。城門石路，車轍宛然，痕迹很显明。这三重宮殿，好像北京故宮三大殿形式，前面一重規模宏敞，础方广三尺余，計十六个；后二重則沒有保存下来。殿向南面，东西有两个闕門，阶墀陛墄，層級还辨認得出。

內城里还有当年的御花园、八宝琉璃井、釣魚台等遺迹。两个石井全是八角形状，用白石砌成。在明堂外面，当年九陌三衢，还依稀可以辨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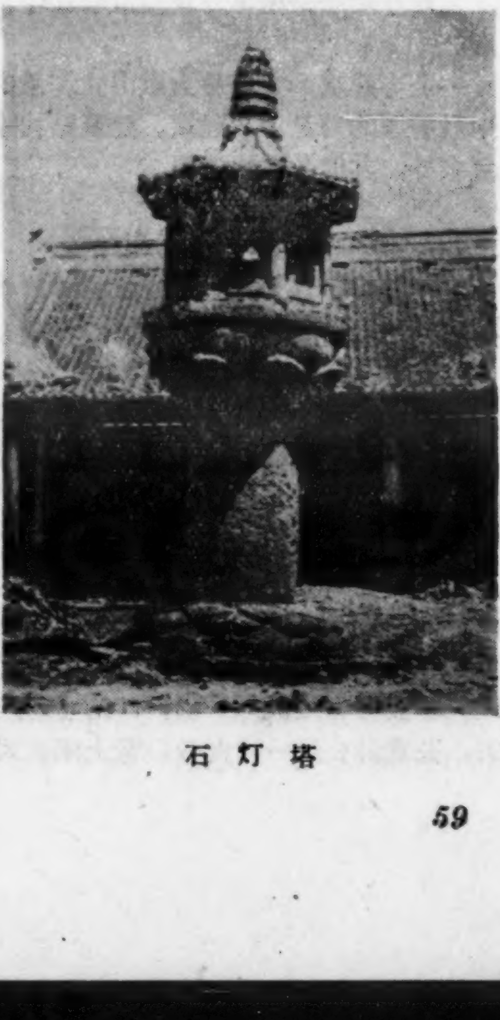
这个东京城遺址，东至罗城七十多里，西到老黑山四十里，南到金坑四十五里，北到旧街八十里，四面环山，牡丹江在左右环流，外面还有鏡泊湖的險要，局势敞宏，气象雄壮，無怪乎当年渤海国要把它做为首都了。

二　石灯塔

石灯塔又名石灯籠，是东北古代渤海国的重要遺物之一。塔在上京龙泉府遺址的第一寺址中，全高六公尺多，全部用石雕成，渾厚壮观，巍峨屹立。它虽然已經經历了一千多年的風雨剝蝕，但保存的还相当完整。

三　三灵坟

三灵（应为“陵”字之誤傳）坟在宁安县六区三灵屯东北半里許的一个小土丘上，四周是耕田。关于此坟，傳說是渤海国国王墓，也有人說是王后或公主墓。



石　灯　塔

几十年来这里曾有好多国內和国外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来調查过，并曾进行發掘。光緒年間，在墓的四周还存有石砌的墻基。現在坟的东、西北两面还有墻基廢墟的痕迹可寻。

据宁安县志載，現在的墓是原

来三个墓中的一个(其他二墓現在何处，还难确定；但在此墓东边半里許的土坡上有一土塚，有人說也是三灵坟中之一)。傳說早年有一石匠曾鑿孔进入墓內，盗走了許多殉葬品。1923 年有人調查时，墓內棺槨、人骨、殉葬品等均已不存，仅剩墓壁。

三灵坟座北向南，是一座完全用長条石板所砌筑的墓。墓頂封土早被破坏，墓盖石板下沉成凹状。墓盖銜接处有一个直徑 0.4—0.6 公尺的人工鑿孔。

內部結构分墓室和墓道两部分。墓頂是四合式建筑形式，正頂用平板石复盖。墓室东西長 4 公尺，南北寬2.19 公尺，高 0.9——1.8 公尺。墓道及墓室堆有很多乱石断瓦。墓頂还存有石柱础四塊，在东南、西南、西北角还存有石柱础三塊。从遺留的柱础痕迹和附近的殘磚断瓦推測，墓頂上原来可能有亭子式的建筑物。

三灵坟附近的許多殘磚断瓦，从質地、形制以及制作技术研究，均和渤海国东京城遺址的磚瓦相同，所以，我們推断这应是当时渤海国的墓葬。

四　兴隆寺

兴隆寺（土名南大庙）位于宁安县东京城乡西南二里許，寺門正南向。北、南、西三面临农田，东邻村落。据殿前碑文記述，該寺是清康熙初年在古渤海国旧寺址上重新建造起来的。

兴隆寺共分馬殿、关聖殿、天王殿、大雄宝殿和三聖殿等五層正殿。另东西两边各有配殿和禪堂（現东禪堂仅存廢墟)。院內存有石碑二塊（在馬殿前)，是記述該寺修建历史的。前述石灯塔即直立在三聖殿前东边。

寺外圍墻是用青磚和玄武岩混合筑的，为長方形。

全寺建筑形式可分为歇山式和悬山式两种。其中最普遍的为悬山式建筑。建筑結构除大雄宝殿較复杂外，其他各殿均类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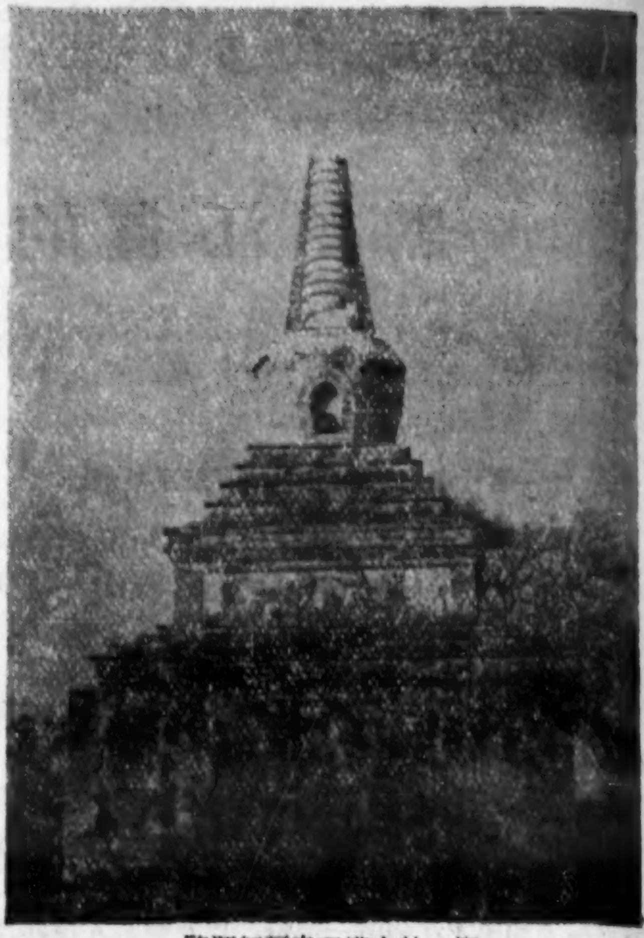
五　清代大石桥

桥在宁安县城西二里許观音閣后山岡下，桥北还有一个著名的潑雪泉。桥修建在清太宗皇太極的天聪八年，一般人傳說，是先有这个大石桥，然后才有宁安县城。桥的工程宏大，为該县桥中第一。

相傳最初建桥时是用木架桥，叫長板桥；后来改用石筑桥，更名青石桥，最后才叫大石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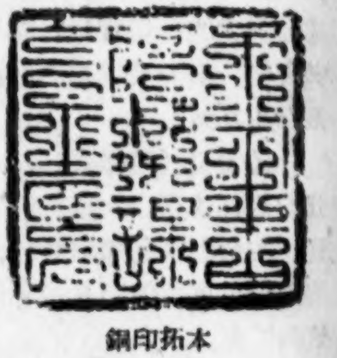
在清同治四年，曾修补一次。一九二二年又經重修。桥北面的潑雪泉四季流水，通过桥下。潑雪泉是清初順治年間，所題的名字。

一九一八年当地有赵姓居民在大石桥附近耕地，曾获得古代銅印一顆，印柄長方形，印面正方，長寬計公尺一寸九分，背上刻有天会八年造的字样。这个銅印，被人收去，他家中还保存有用印泥拓好的样片多張。



肇源衍福寺双塔中的一塔

印文是："京左吉阿邻謀克之印" 九个字。天会是金太宗吳乞买的年号。京左，就是城左边的意思。謀克，是金代百戶長和千戶長的地方官爵名。



銅印拓本

六　衍福寺双塔

塔在肇源县民意乡大庙屯。前面低处是一片草坪和稀疏的灌木林，背依衍福寺的廢墟，双塔位于屯中的崗上。

双塔东西排列，面向南，二塔間距30公尺。塔全部用青磚筑成，全高約为10公尺，平面方形，最下是塔座，長寬均 8 公尺，为正方形，高为 2.4公尺，無塑貼花紋。塔座上是几級台阶式的座子，再向上便是塔身，塔身四面塑貼着成对的獅子，蓬松着頸毛，头相对并向上仰着。其上又是四級台阶式方台，每級都在胶泥質地上刻有字迹清晰的老藏文（和現在的藏文不同)，这是有关于塔的建筑历史的記录。台上是橢圓形的塔項，項中有一龕，門南向。据說龕曾供奉喇嘛所誦的經卷和銅佛像。最上是塔刹相輪。

（本篇一、五两节为王震中著文，二、三、四、六节为沙振宇、丹化沙著文）

江苏文物古蹟調查散記

鎭江"昭关喇嘛石塔"

地方傳說市西小碼头观音洞，留有三国时孙权与刘备联姻时建的"石瓶"遺迹，还有"一干一戈"，表达"平定干戈"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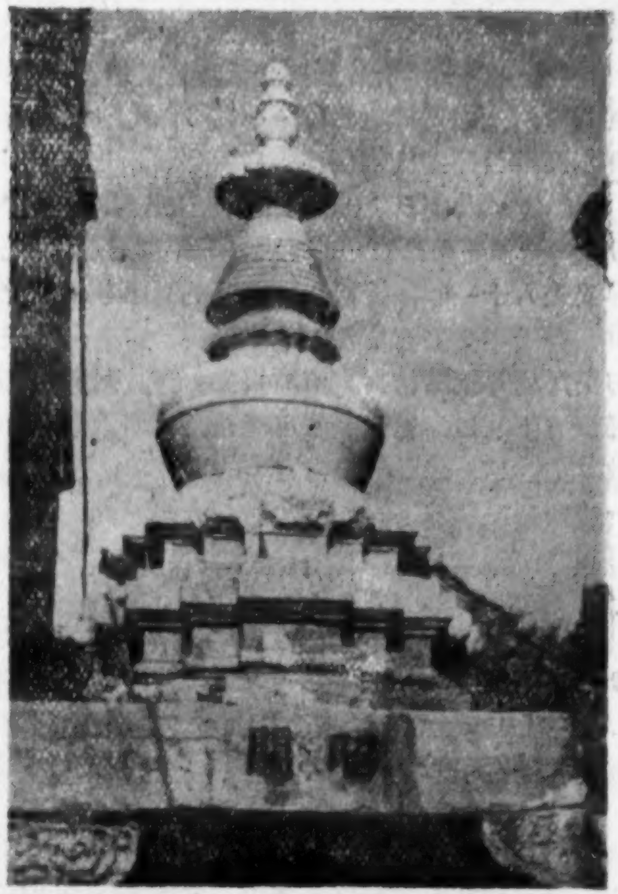
遍查地方文献丹徒县志、京口三山志，均無考。只有"观音庵"与"昭关"的簡記。

"石瓶"其实是一座喇嘛塔，建筑在"昭关"頂上，全系石料所造。

塔高4.58公尺。塔座四叠，上盖复蓮台。塔身作鼓形，再接以頸石，上加一束腰蓮台。再上是十三天，华盖作复蓮状，頂以石錐。塔的平面成長方形，面积为2.26×2.1公尺。

昭关的額石上，淺刻"昭关"二字，和"万曆十年壬午十月重修"等題記。塔身除部分風化裂縫外，余皆完好。

塔的形式与淸塔頗为相近，塔身与昭关上的紋刻手法，是明代的風格。我們推測，塔的起始，不会早于元末，明、淸以来都曾作过不同程度的修理。



石　塔

揚州"西域人普哈丁墓"

"西域人补哈丁墓在大东門外官河岸之东。补哈丁游于广陵，卒葬于此"。（淸雍正江都县志卷十二）現墓在揚州东关城外解放桥南境回教堂內。

普哈丁（譯音）墓用靑石筑成五級矩形，通高0.88公尺，座2.16×0.88公尺，頂層1.56×0.24公尺。每層平面綫雕牡丹花，立面浮雕纏枝草和如意头，唯第三層上陽刻阿拉伯文。

普哈丁墓外建有墓亭，面积为3.75×3.75公尺，高約3.50公尺。由墻高1.60公尺（轉角由1.10公尺高度）开始向內收縮成圓拱頂。南和东、西三面留有拱門，北壁內留有壁龕，以供灵位。南拱門外右墻上加砌一磚龕，嵌有"淸雍正四年立"的"西域得蹤先賢补好丁之墓"碑一通。据揚州市刘彬如先生談，这种磚結构的墓亭建筑，是阿拉伯建筑的特色，也是回民墓亭建筑的固有形式。

伊斯兰教堂內，存有一塊淸光緒卅四年的碑記，記录普哈丁在中国傳教事略，現摘录于后：

"先賢历史記略

普哈丁者天方之賢士，負有德望者也，相傳为穆罕默德聖人十六世裔孙。宋咸淳間来游揚州。其时綠楊城东有龙王庙，老僧华仙素擅法术，頗有名誉，見先賢，欲一斗其伎倆，本不能胜，乃折服而退。未几，先賢亦归西域。越三年复东游至津沽，遂移舟南下，一夜即达广陵。抵岸，舟子呼客起，不应，視之則已归順矣。时德佑元年七月二十三日。事为郡守元公所聞，知为异人，乃建墓于兹土。……"

泰州宋墓墓志

"宋故天水郡姜氏墓志"一九五二年在太州市太西区森森乡森森后庄西南角水沟头出土。距离护国庵仅十公尺許。水沟头北岸，原有一个土丘，淸道光年間大水时，曾有姜謂与其妻史夫人墓志石被冲

出土。姜謂的墓志石已殘，現存在太山行宮文物陈列室內。史夫人墓志石今已散失。前时在市場上有其拓片出現。两忐文均巳收在罗振玉"冢墓遺文"編中。一九五一年汛期中，史夫人墓被掘，出土有宋熙宁十年木質地券一方，和其它随葬品一齐陈列在太山行宮文物陈列室里。

据"宋故天水郡姜氏墓志"記叙：

"姜氏即本土豪杰"

将仕郎守本州司馬公济之爱女也。其父富盛，海陵首冠焉。其諸令行，此不复書。母于氏

"……以其年十月三日葬于海陵县招賢乡小紀村泭于，先君司馬之兆域……"。联系上述情况推测，此地当是姜氏祖塋。

"姜氏"乃姜济之的爱女。从史夫人地劵紀年"熙宁十年"和姜氏墓志紀年"治平三年"比較，姜氏墓早史夫人十一年，姜謂当系姜氏的兄弟輩。由此可知，姜氏祖塋还有墓在。現水沟头暴露有一塊三平方公尺的磚筑結构物。頂被揭去少許。据群众反映还没有下挖过。这座磚墓可能是姜氏祖塋中的一坟。估計这一带是一处宋墓群的所在地，可能还有一些宋墓埋藏地下。

南通"通州狼山重建大聖庙門記"

"通州狼山重建大聖庙門記"碑，嵌在南通市南十五里狼山广教寺江海神祠大聖殿右門墙上。碑高1.91、寬0.97公尺，明正德八年王鏊撰文。兹节录如下：

"……自頃奸臣擅朝，盜賊紛然起北方，所过屠掠，血流成川，城市为虛久之，上迺改命都御史陆完、彭澤节制山东、河南諸軍，且調沿边健卒屡与賊战，賊北奔潰。賊酋刘七尤号桀黠，俄南犯鎮江江陰，已迺栖狼山。狼山当海之冲、江之委，賊假息兹山，志窺吳会，于是东南騷动，人莫自保。一日賊忽泝江而去，未几又薮江而下，上下倏忽，莫敢攖其鋒。都御史統将士自山东奄至，澤与咸宁伯仇鉞、都督时源繼至，分据江口，賊惧，复保狼山。忽海風大作，賊舟虀碎，完亟遣总兵刘暉、却永星行襲之，賊据庙門，矢石如雨，官軍不能入，因縱火焚庙門，久之不燃。暉永默禱，如破賊当葺庙如旧，火乃随熾，賊惶駭四竄，官軍乘势追斬，賊众歼焉，东南大安。議者謂王师之捷虽将士出奇賈勇，非颶風助順，回祿效灵，則賊未易殄灭，东南盖岌岌矣。"

碑文收在清光緒元年編"通州直隶州志"卷二，山五里。另在民国三十七年蔡观明編的"南通县金石志"里有影印文。据光緒元年"通州直隶州志"軍政志，历代兵略三十二記載：明武宗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壩州人刘六与弟刘七、齐彥明等率众起事，与楊虎部合，活动于山东、河北、山西和江苏徐州一带，曾与兵部左侍郎兼都御史陆完諸軍战于壩州平口、景州宋門店、曹州、湯陰等地，后南下鎮江江陰，敗于南通狼山之役。

查諸文献紀載，刘七、齐彥明等率众起事，逼于明王朝淫刑苛政。而其史实，通史与农民革命运动史及明史且少紀載或没有紀載，"通州狼山重建大聖庙門記"記叙比較丰富，仅次江淮平乱碑，从中亦可窺見一斑，对史学研究提供了一部分史料。

常熟兴福寺石經幢

兴福寺又名"破山寺"，在常熟市虞山北，离城三里。两石幢距头道山門稍远，离二道山門較近，立于南北通道的两旁，高約4.5公尺不等。形式三叠八面。座作束腰蓮台，中間浮雕四只獅子，仰蓮上加一个石鼓，环周浮雕一条游龙，首尾相接。左幢首尾間隙，有宋人題記一則。幢身刻"佛頂尊胜陀罗尼經"，系"□宾沙門佛陀波利奉詔譯"。唯有右幢下截（約占幢身的十分之一）遍刻施主姓名。幢頂成一个葫蘆形的錐。

清光緒"常昭合志稿"卷四十五、金石二記有"尊胜陀罗尼經幢二，在兴福寺山門外通左右。"注为"……一大中八年平原陆展書，一京兆全眞書。"

左幢宋記："兴福寺山門前石幢，自唐大中建造，經□年远□損。本寺祖英□發心重修，未圓心願已

左　幢

右　幢

□亡。今师兄僧祖仁謹将亡祖英在日衣鉢錢二千余貫，重修石幢二所，井□□司屋宇，神将□□，所答亡师□□座主在日心願。普为四恩三有法界众生同儀罪僁在严凈报者。大宋建炎三年岁次己酉八月二十三日己巳重建”。

两幢經文末段，字多剝蝕，已無年月可考。現唯有宋記可作佐証。两幢經文前刻“佛頂陀罗尼經序”，記印度婆罗門僧佛陀波利于唐高宗李治仪鳳元年（即公元 676 年）把“佛頂尊胜陀罗尼經”傳到中国来的經过，关系着中、印两国古代文化交流的史实。两幢虽經宋修建，仍保留唐建風格。

苏州天池寂鑑寺石屋及石造象

“天池”在华山，距离苏州市西三十里，与天平、灵岩两山連屬。

寂鑒寺旧名“寂鑒禪庵”，在天池西塢。旧志記为元至正間道在和尙建，明弘治初天目禪师普惠重建。明洪武二年克新和尙撰有“天池寂鑒禪庵記”。

“石屋”坐西面东，依山岩筑成。歇山九脊頂，板石为瓦，兼作椽檐。面闊三間，寬 6.90 公尺，一明两次（明間 2.96、次間 1.92 公尺）。进深两間，为5.17 公尺。柱高不及間广，为 2.14 公尺。础以鼓石，礩作复鉢。

前檐明間，屋頂叠扣成平頂，横置两長方石板。平面浮雕两条四爪云龙首尾相接。正殿門楣石上自左至右浅刻“敕賜”“西天寺”两排五字。殿頂作叠涩蓮花藻井。后石座上供奉三佛，坐束腰蓮台，下垫三叠須弥座。座前两側立二侍奉菩薩。供台中間供奉地藏王象。后檐三間有門通連。右偏殿后壁鑿一龕，造十二小象，右壁嵌“續添聖象造屋施主名目”碑一塊，左壁浮雕“神佑殿”三字。左偏殿后壁鑿一龕，造象数与神佑殿同。两側壁各嵌石碑一塊。分刻“天池寂鑒禪庵題名記”，碑末紀年为“时岁次癸卯至正二十三年六月十一戊申吉辰”，文为“天池寂鑒禪□都劝緣掌功德司督工住山門沙門道在謹識”。末尾并注“建殿造象作头吳文璋”。

寂鑒寺山門前两旁巨岩上，鑿石造二尊佛象。据元“至正十八年三月”碑記：左为“南無阿弥陀佛”，高 3.25 公尺，为“邵氏宪娘施財刻造”。右为“南無弥勒尊佛”，高与左佛同，系“福岩庵比丘尼李源施財造”。两石佛均造石屋以藏，系道在和尙抽賫装飾。

天池寂鑒寺石屋左偏殿两側有碑文，叙述造石屋及佛象施主題名。

天池寂鑒寺石屋及石造象，是江苏仅有的一組元代石建筑及石刻。　　　　(朱江編写)

“勅賜西天寺”石屋外景

(上接 69 頁)　部成圓形，在身后端刻有不規正的凹道一周，殘长5.3 厘米。

石椎（上母 T_1，圖十四之 2），已殘，器頂端隆起，体光滑，殘长6.2 厘米。

骨鏃共二件，均殘。I 式（上母 T_2，圖十四之7），鏃身近錐形，身作竪槽沟一道，殘长 6 厘米。II 式（上母T_2圖十四之 6），鏃身前部成三棱形，后部圓形，一側有与上器相同小槽沟，殘长 6.7 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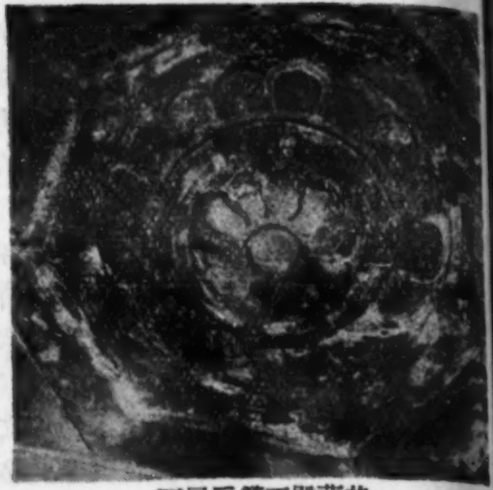
骨匕（上母T_1，圖十四之 1），已殘，扁体，仅存后部，面光滑，殘长6.5 厘米。

其他还出土有牛骨、鹿角、朽木、木炭、云母片等。

另外在遺址北 4.4 米內还清理墓葬一座，無葬具，人架保存尙好，系仰身伸直，两手交叉置于下腹之上，無随葬品，根据墓室內塡土观察，应与遺址同时。

执笔者：刘东亚

石屋前簷明間平頂浮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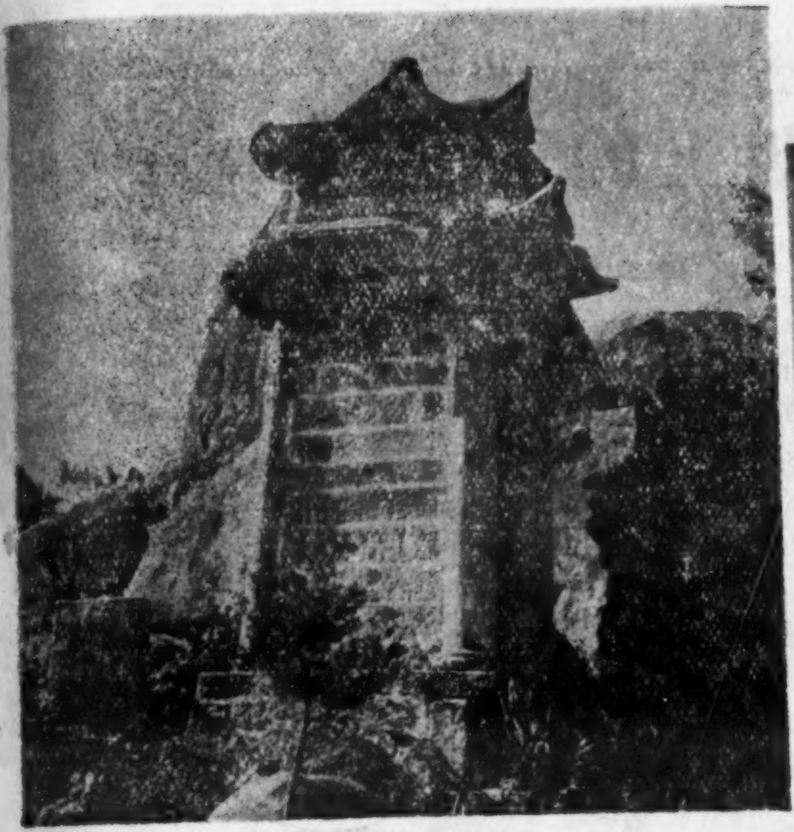
石屋后簷正殿藻井

石屋正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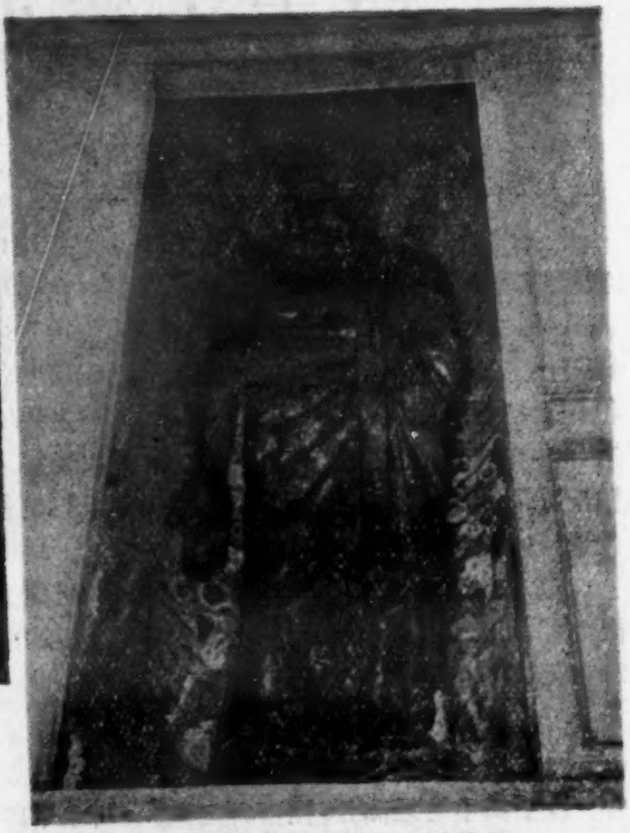
石屋正殿中、右两石佛像

神佑殿石雕十二神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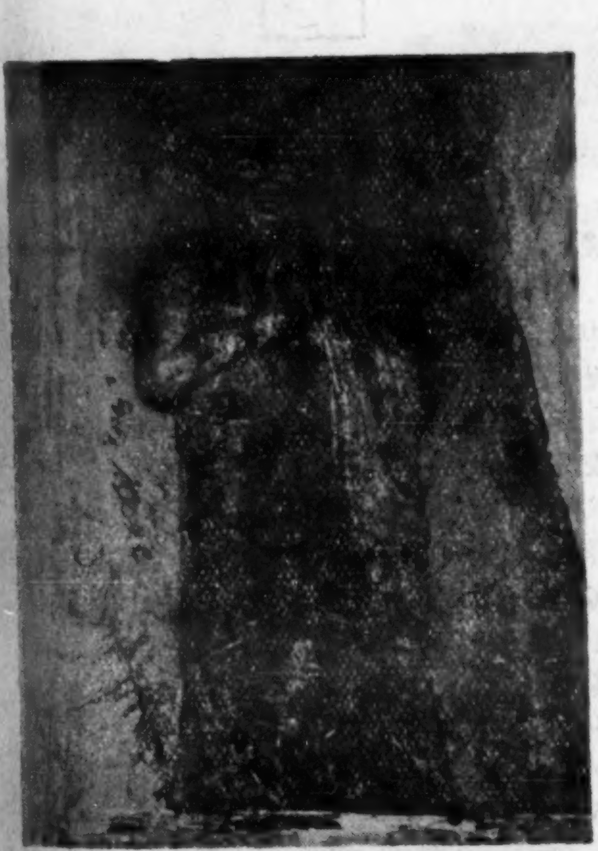
石屋左殿石雕十二神像中的四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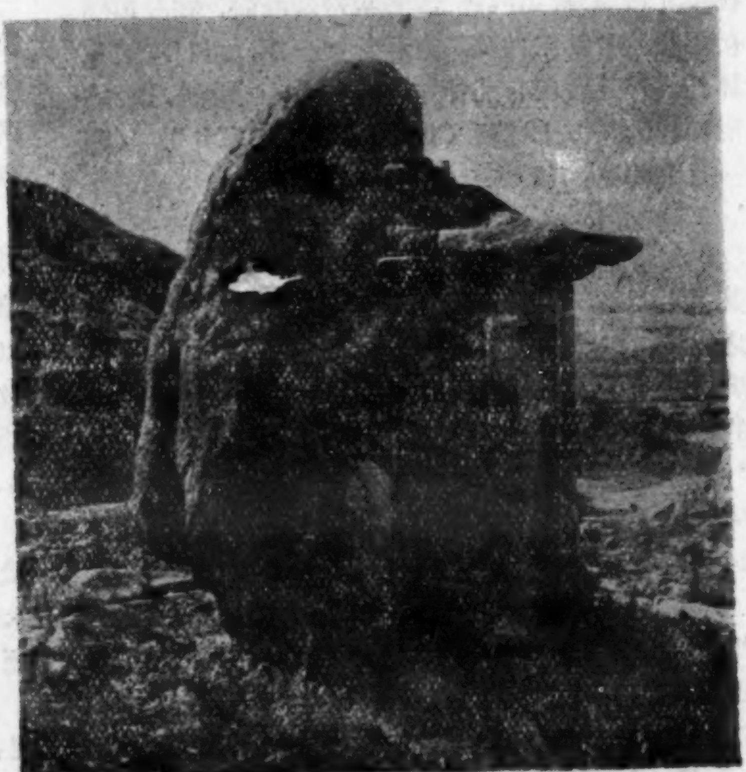
寂鑒寺山門外左石屋



左石屋內摩岩南無阿弥陀佛象



右石屋摩岩南無弥勒尊佛像



寂鑒寺山門外右石屋

河南上蔡出土的一批銅器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一队

一九五六年三月，河南上蔡北四十五里田庄村农民馬秀文等六人在村西头土崗上打井时，發現古墓一座，当时把随葬品全部取出，其后将遺物中的銅器出售給郾城县供銷社，省文化局聞訊后即将这批銅器运省保管。一九五七年三月派人前去墓地調查，并将部分陶器搜集带回。为了进一步了解墓葬情况，同年四月在墓葬周圍进行了鑽探，發現古文化遺址一处，并进行了試掘。

墓葬和遺址位于田庄村西約四百米的土崗上，崗西邻澗河（俗称运粮河），河身已淤塞，崗的南部和东部有两条路，崗北地势漸趋平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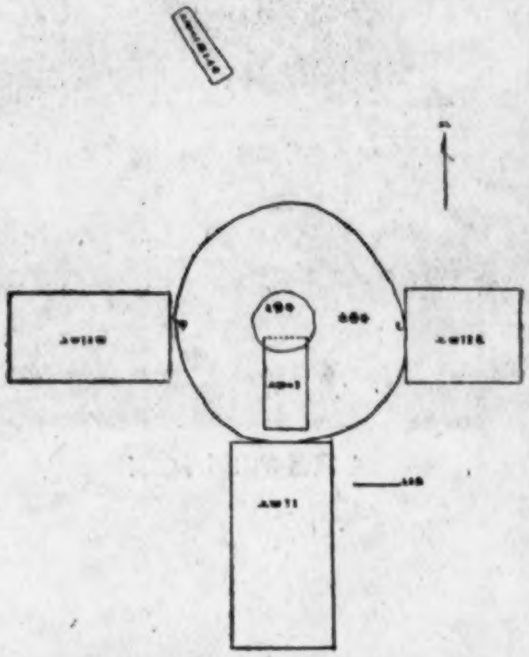
一　墓　葬

位于崗中央最高处。据打井者談：在耕土下即遇灰土層，內含有方格紋陶片，至深約0.6 米处，即發現銅鼎，陆續又發現銅甗、銅尊等，各器放置集中。計有爵二件，卣、觶、觚、方鼎、簋、甗、尊等各一件，共九件；陶器大部和銅器堆放在一起，共六件。另外在器物以北發現“紅道痕迹”，形状弯弯曲曲。在紅道間發現圓形骨器二件及长方形骨器一件，当时均被破坏。另外还發現有乱骨片。根据以上所談，墓的形制約为长方土坑墓（暫編号：“上田M 3”）（圖一）。随葬器：

(一)銅器

父辛觚（圖二）：口下周圍飾四个蕉叶状紋，其下圍繞带状对称的夔龙紋，器把中段有四个凸起之齿稜，并有夔紋組成的紋飾四組，下面飾紋一周，在圈足之上又凸起齿稜四个，其間有夔紋組成的紋飾二組。圈足表面無紋飾，圈足內壁有銘文“作父辛隮□”五字。在器口內壁有紡織品遺迹，經緯綫痕十分清晰。此器通高 21.5、口徑 12.8、腹深 14.5、足高 6.5、足徑 7 厘米。

觶（圖三）：口沿外侈，圈足，頸部及圈足上部均飾有带状紋飾，其下有弦紋一周，下腹外鼓。此器通高 14.1、口徑 7、腹徑 7.5、足高 2.7、足徑 6.3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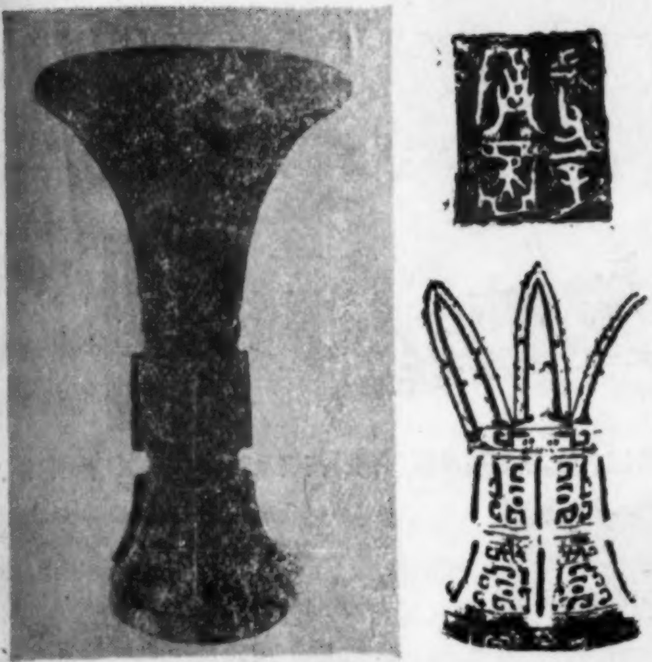
圖一　上蔡田庄村遺址試探位置圖

爵，共二件，一件殘，以紋飾不同，可分为二式：I 式（圖四），器身作圓柱形，圜底带鋬，附三个三棱形器足。鋬內腹壁上有銘文三字。此器通高19、流长 7、口徑 8、腹深 9.5、腹徑 6 厘米。II式已殘，器形与 I 式同，唯器腹鑄有对称的饕餮紋两組，鋬內有銘紋“□父已卜”四字。此器殘高21、腹深10.2、腹徑 6.2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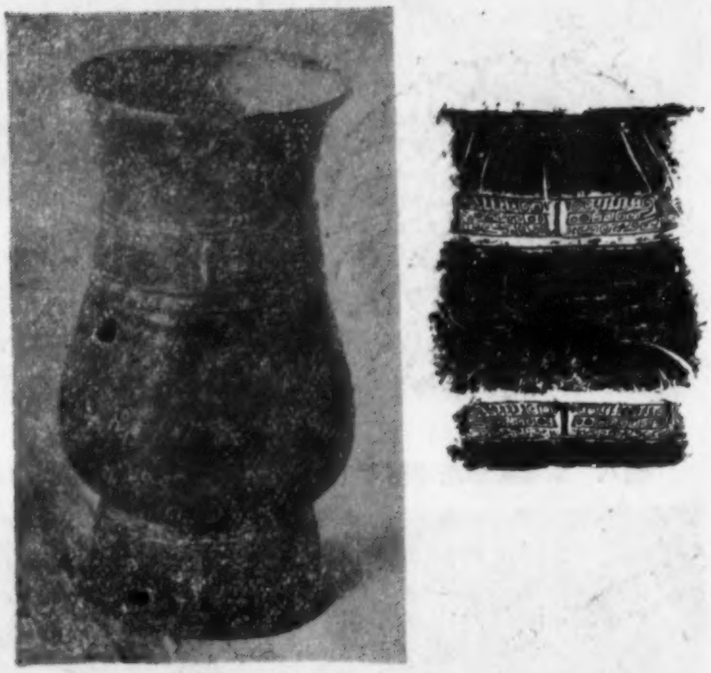
提梁卣（圖五、六）：下腹微收，圈足，提梁为三股擰合形，其两端作圜状，套入耳內。器蓋与器身分鑄，蓋頂有伞状小鈕，鈕頂飾放射形花紋。蓋上飾以回紋組成的带状紋一周，中央附加对称的小牛首紋。器蓋內壁有銘文一字。此器通高（連提梁）25、高（連蓋）24、口长徑 11.8、口短徑 9、足高 4、足长徑14.4 厘米。

簋（圖七、八）：侈口圈足，两耳作兽面形，下腹微向外鼓，器腹口外和圈足上部均飾回紋組成的带状紋一周，器底有紋飾。此器通高 12、全寬 24、口徑 18.5、足高 3.5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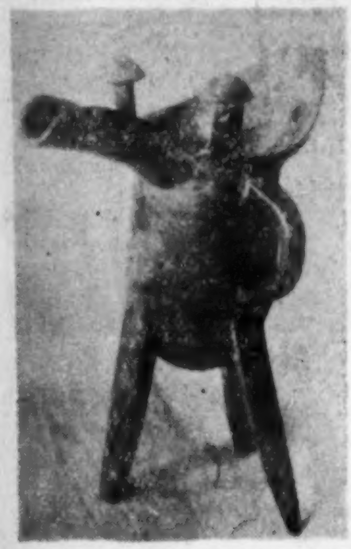
尊（圖九、十一）：沿外侈，器腹中間鼓圓，圈足，腹部飾寬带状紋一周，圈足內壁有泥質內模遺痕，其質坚硬。此器通高24.6、口徑 19.3、腹深 19、足高 6 厘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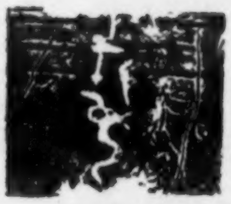


圖二　父辛觚及銘文、花紋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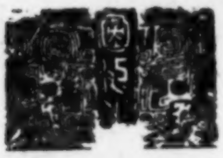


圖三　銅觶及花紋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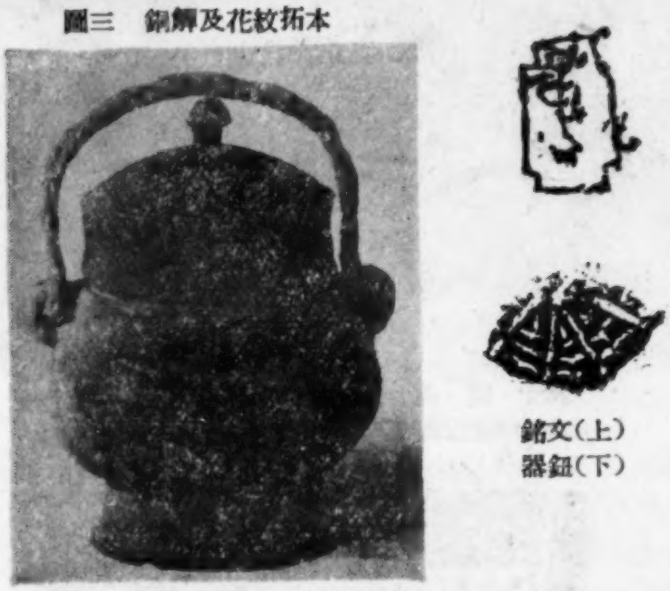


Ⅰ式銅爵銘文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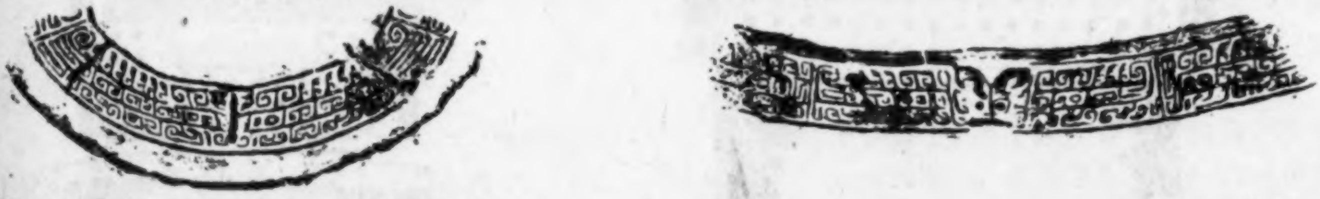
Ⅱ式銅爵銘文及花紋拓本

圖四　銅爵及銘文、花紋拓本　Ⅰ式銅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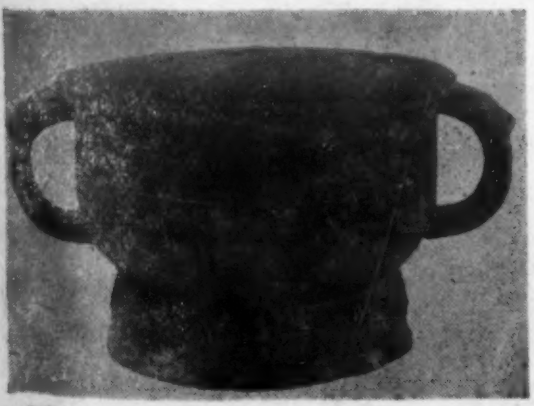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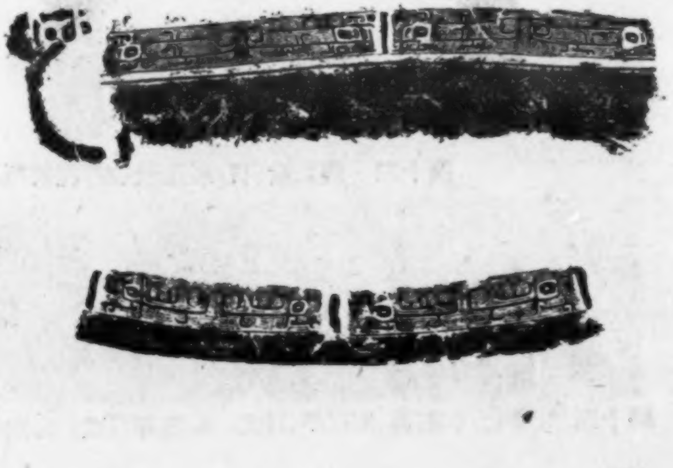
銘文(上)
器鈕(下)

圖五　提梁卣及銘文、器鈕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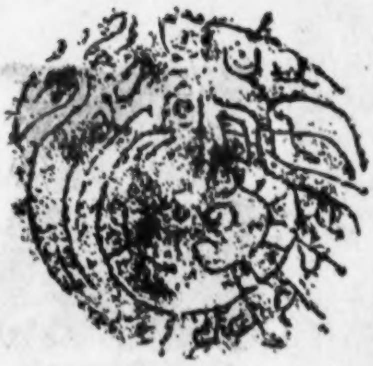


圖六　提梁卣蓋上(左)及器口下(右)花紋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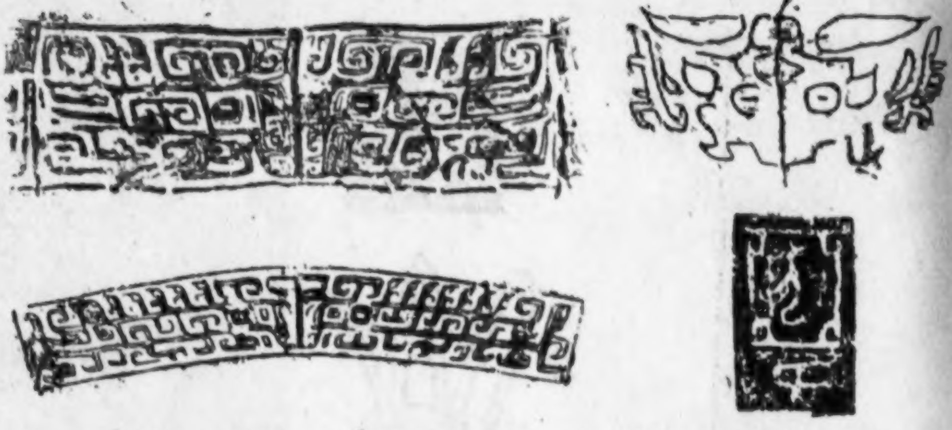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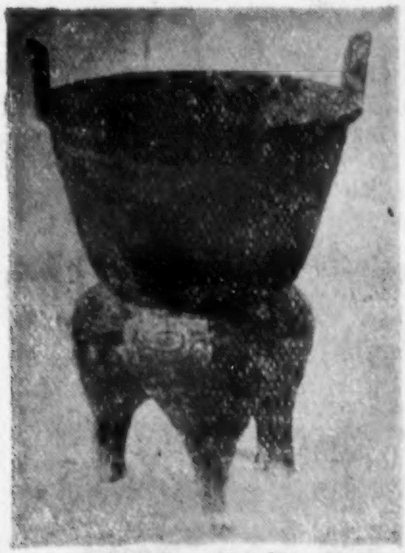
圖七　銅簋及銅簋腹上部(上)与圈足(下)花紋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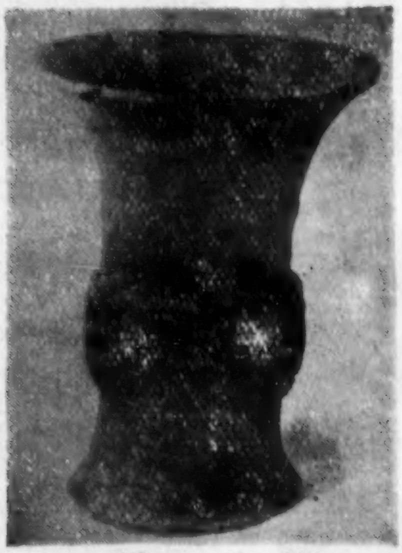
圖八 銅簋底部花紋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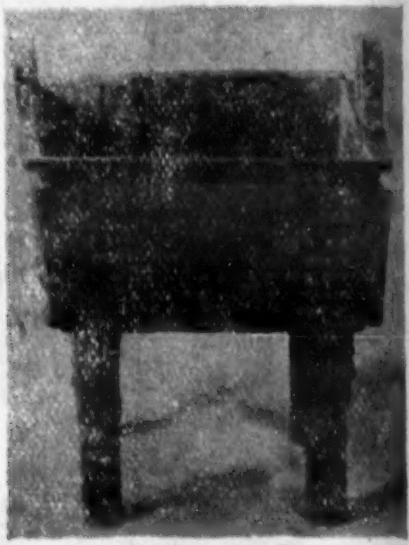
圖九 銅彝(左上)、銅口甗沿(左下)、銅甗鬲足部(右上)花紋及銅甗銘文(右下)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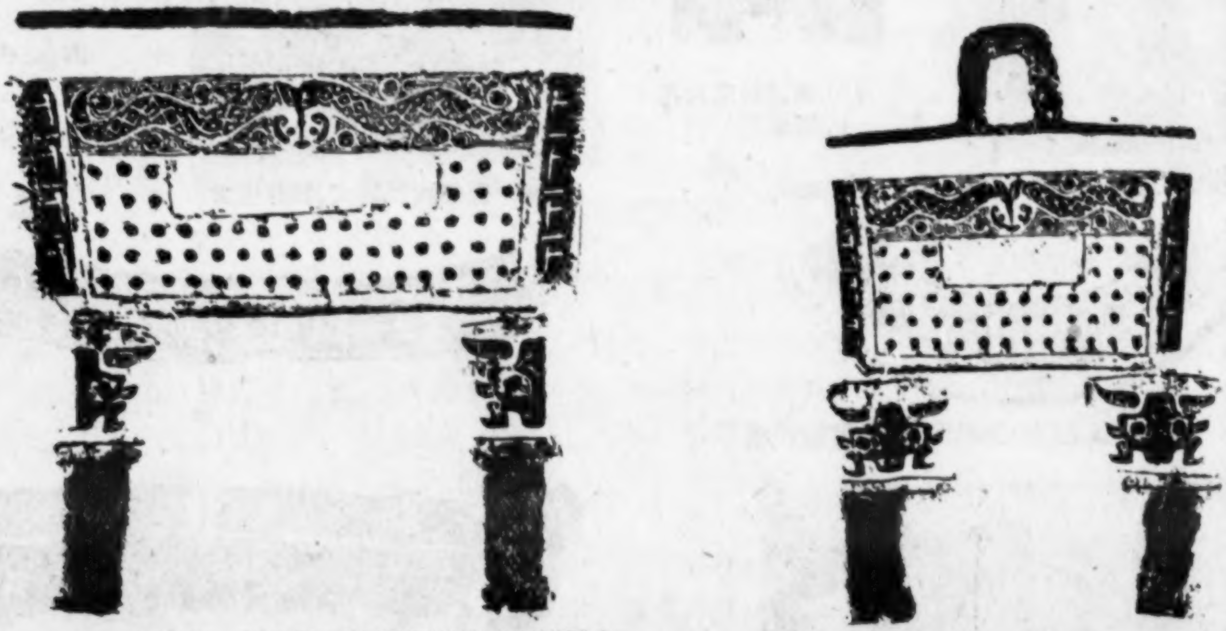
圖十 銅 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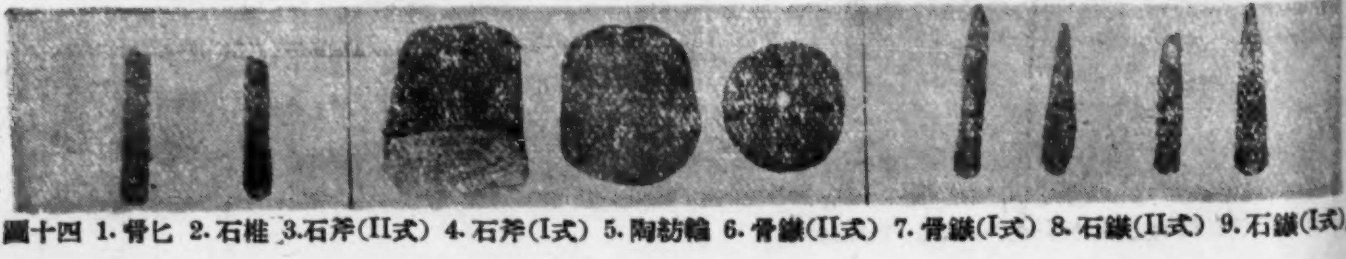
圖十一 銅 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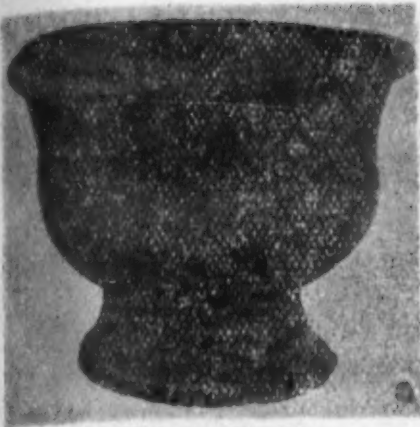
圖十二 銅方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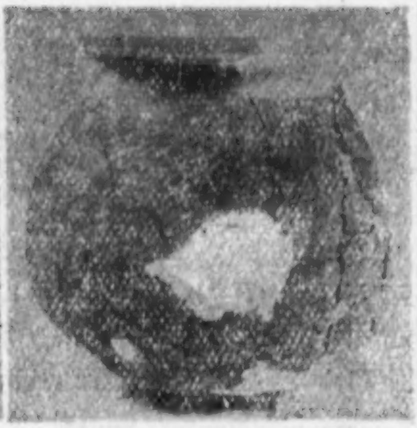
圖十三 鼎长壁(右)鼎短壁(左)花紋拓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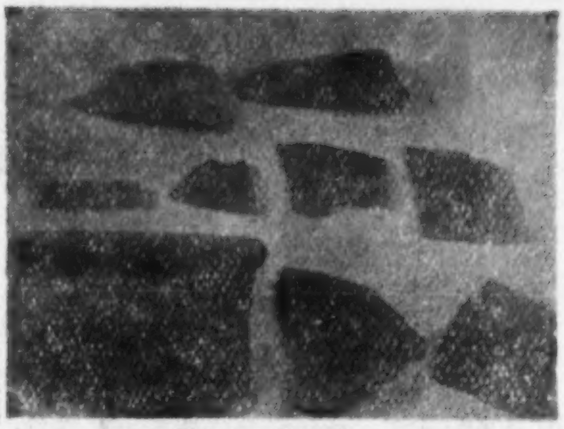
圖十四 1. 骨匕 2. 石椎 3.石斧(II式) 4. 石斧(I式) 5. 陶紡輪 6. 骨鏃(II式) 7. 骨鏃(I式) 8. 石鏃(II式) 9. 石鏃(I式),



圖十五　陶　簋



圖十六　陶三足罐



圖十七　陶　片

甗（圖十）：直耳，侈口，三款足，器系上下合鑄，口沿下節带狀紋飾一周。鬲空足，足外表飾兽面紋三組。器箄系另外鑄制，其形狀近似銳角的等腰三角形，中央鑄一圓柱形小鈕。箄上鏤孔可分两組，一組为十字鏤孔二个，另一組为长方形鏤孔三个。此外有承托器箄的箄齿三个。口沿內壁有銘文。此器通高32.5、耳高4、口徑23、鬲高14.5厘米。

方鼎（圖十二）：直口，口長方形，折唇，四壁近垂直，平底微凹，四个圓柱形足，鼎腹角起棱。器形制作極精致。口沿下各面有龙形紋两个，其下均有乳釘，排成凹字形。鼎足上部各鑄有兽面紋一个。器体和器足合鑄而成。此器通高17、耳高3.5、口长徑16、口短徑12.8、腹深7.8、足高8.5厘米。

（一）陶器，共六件，現存三件。

瓿：口微斂，短頸鼓腹，腹底斜收，圈足。腹上部有对称三角形小鈕两个，并飾带狀斜方格紋一周。此器通高13、口徑9.3、足高2.1厘米。

簋（圖十五）：敞口厚唇，上腹稍鼓，下腹內收，圈足。腹上部刻划带狀三角形紋飾一周。此器通高16.7、口徑21.4、足高4.5厘米。

罐：已殘，侈口长頸，折肩鼓腹，下腹斜收成小平底，頸部飾凸起的弦紋四周，肩上有小泥釘，肩下飾凹入弦紋二周，腹部飾带狀繩紋，排列不規則，似拍打而成，輪制，泥質灰色。

二　古文化遺址

遺址面积南北106、东西96米，灰層堆积厚度一般深1.3米左右，最厚达3米多，土色深淺不等，質松軟。在水井南边和西側开小探方三个，編号为上毋T_1、T_2（东、西）（圖一）。遺物較丰富，仅在二十一平方米內就清出陶片五包，重要遺物二十二件。遺物：

圖十八　殘陶器　上左1—3鼎片，4—5甑片，下左甗片，中器把，右陶碗

陶三足罐（上毋T_1，圖十六），能复原者共二件，大小各一，形狀略同，系夹砂灰陶，斂口，下腹鼓出，圜底，下有三个近方形的小足。器口系輪制，頸部經过打磨，通身滿飾繩紋，腹部有燒烟遺痕，器底粘有一層紅燒土，应系炊器。大的通高23.4、口內徑12.4、口外徑23、足高1.6厘米，小者通高20.5、口內徑11、口外徑16、足高1.2厘米。另外在上毋T_1探方內，深0.2—0.23米，还出土殘罐三个，在两个罐內滿盛兽骨。

陶紡輪（上毋T_1，圖十四之5）：圓餅狀，中央有小穿孔，泥質深灰陶，輪徑3.8、壁厚1.1厘米。陶片中泥質灰陶較多，砂質紅陶次之。紋飾有条紋、方格紋、細繩紋及素面磨光，可辨出器形的有鼎、甑、甗、碗等。

石斧共二件，殘一。I式（上毋T_2，圖十四之4），扁体，器形較小，刃成弧形，体长50、前寬4.2厘米。II式（上毋T_1，圖十四之3），已殘，扁体，器面光滑，殘长50、后寬3.2厘米。

石鏃共二件，皆殘。I式（上毋T_2，圖十四之9），鏃身成圓錐形，鏃末銳利，殘长7厘米。II式（上毋T_2，圖十四之8），鏃身前部成三棱形，后

（下接63頁）

通江县的摩岩造像

陶鳴寛

四川通江在唐初为壁州的諾水县地，天宝初始改县名为通江。县城外有巴水和宕水匯合，千佛岩、赵巧岩、七里坪和佛尔岩的摩岩造像就都分布在宕水岸旁，通往陝西南郑的大道上。

千佛岩在通江城西五里許，岩壁上共有造像五十一龕，其中有二十五个龕在露天中，其余的二十六个龕有屋宇复盖。露天的龕中，有十一个已毁不成形，另十四个龕也有程度不同的風化或毁損（圖一）；有屋宇遮护的龕，保存都較完整。

露天的造像多为初唐刻造，一般都較簡朴，不似它处所見者有着华丽的装飾紋样(圖二)。第二号龕的佛像，面龎瘦削，鼻高眼深，看来它还没有完全擺脫早期的造像風格(圖三)；在这个龕的边沿上有“大唐乾封元年四月八日广納县馬明府为夫人 □ 氏敬造”的造像記一則。第四号龕里刻着一个菩薩和两个比丘的站像，菩薩像两眼略微俯視，面带笑容，体态極自然(圖四)。第六号龕刻阿弥陀佛像惜已剝蝕，龕外的两側壁上刻着两群浮雕的供养人却尚完好，这样的供养人群，在四川它处的摩岩造像中是少見的(圖五)。四号龕和六号龕的間隙处，有造像碑記一通，但文字全剝落了，只有碑額上的陽刻半篆半隶的題字“阿弥陀佛龕大唐龙朔三季岁次癸亥元月辛亥朔建麟德二季岁次乙丑二月庚辰朔新观音（以下字剝落）”尚存。

屋宇內的造像为盛唐时刻造，其中第三十一号龕是最大的一个龕（高 3.30 公尺、寬 3.70 公尺、深 2.20 公尺），佛像的面龎丰滿，与露天造像的瘦削恰相反。龕外两側壁上各有供养人一軀，左者下跪(圖六)，右者站立(圖七)。其余諸龕的造像，与三十一号龕的風格大体相同。这里还有一个高 3.70 公尺的七層宝塔，是研究唐代建筑的極重要的資料（参看本刊一九五五年第二期一〇二頁）。关于造像的題記有三十五号龕左側壁上的“維开元七年六月一日弟子王珣發心敬造釋迦牟尼佛一身大世智菩薩观音菩薩各一身諸佛証明願一切众生長宁授福志□供养”一則，三十九号龕的右側壁上亦有題記一則，但已剝蝕殆尽，仅末行十余字能看出是：“元十二年太岁甲子三月辛未題”。

这里的造像是經过装彩的，至今还有不少的像上保留着以石綠为主要色調的彩妆痕迹，在三十一号龕的下壁，还有“河中府西北門外住人雷信夫妇等重□此發心功德一堂乞寿年永固者千秋时以紹兴八年戊午五月八日庆祝”的重妆題記。

赵巧岩在城西里許之大道側，因为第一号龕的毗沙門天王像所执之塔似灯，一般人誤以为赵巧送灯，所以称为赵巧岩。这里有露天造像十四龕，其中有六个龕已尽剝蝕，其余的八个龕也多風化。毗沙門天王龕是一个未完工的造像龕，刀痕历历可数，它的体形与巴中南龕的毗沙門天王像極相似。天王側有侍者像二，左面者为女像，面龎丰滿，通体肥胖，右边的是未完成的男像。龕內后壁上刻有“石匠張文进石匠赵敬簡崇福元年”的題記一行。西辽的勢力并未达到通江，而且从造像風格来看，絕不是西辽（或宋代）时期的作品，它应該和第五号龕的造像記上所記的年代相当，因此它可能是“景福”的景字在經过風化后的結果。第五号龕的造像記为“乾符五年十二月一日弟子□□□并吉□永为供养願父

（下接 51 頁）

圖一　千佛岩露天造象全景

圖二　千佛岩第五号龕全貌

圖三　千佛岩第二号龕佛像的头部

圖四　千佛岩第四号龕全部菩薩（采原作高120公分）

圖五　千佛岩第六号龕左壁的供养人群拓本

圖六　千佛岩第三十一号龕外左壁供养人（原作高1.17公分）

圖七　千佛岩第三十一号龕外右壁的供养人（原作高1.17公分）

圖八　佛尔岩第二龕的佛像（原作高104公分）

圖九　佛尔岩第三龕的力士像（原作高100公分）

訪翠亨村孙中山先生故居

木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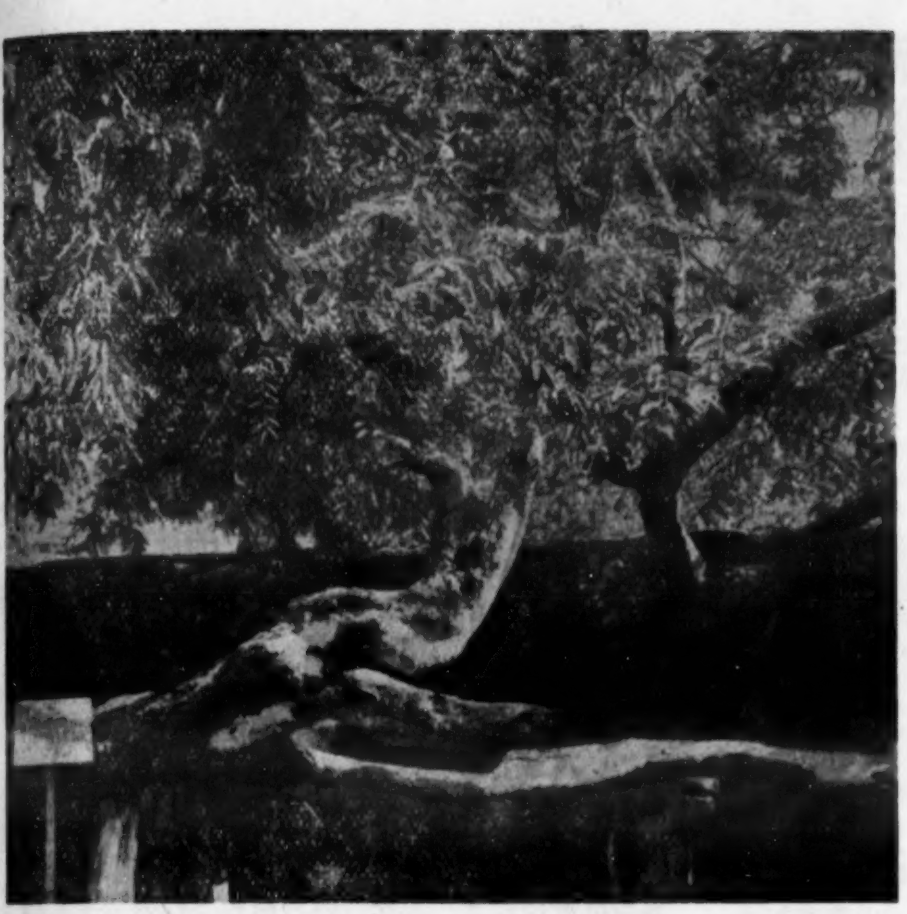
从中山县石岐市搭公共汽車向东行二十八公里就到达翠亨村——孙中山先生的故乡，我怀着景仰的心情去訪問了中山先生的故居。

翠亨村四周环抱着小山，中間是一片碧綠的稻田，村前流过一道小山溪。入村时一条三公尺多寬的大道，两旁栽滿了銀樺树。大道旁是一塊大草坪，数十棵常青的岭南独有的榕树把下面碧綠如茵的草地复盖着，就是猛烈的陽光也透不进来。游客們經过这一片大草坪时，可在石抬石櫈上休息。草坪右面是翠亨小学和六角形的中山紀念亭，亭側是一条长长的校道，直通一座紅墙綠瓦、宏偉状丽、古色古香的建筑物，这就是紀念孙中山先生的中学。

大草坪的对面就是孙中山先生故居。故居門前有两个圓圓的对称的花壇。花壇附近竪着两塊說明牌——参观示意圖和参观規則。我进入故居，踏进小小的院子里，就聞到了濃郁的怡神的香味，原来是院子入口旁有着一棵盛开的百兰花树。院內竪着一塊故居总說明牌，記載着孙中山先生出生年月、入学年月，故居是何年建成的，孙中山在故居住的时間等等。这一簡单的說明使得参观者对故居有了一个概念。院子的左面有一棵孙中山先生手植的酸子树。这棵树的幼苗是孙中山先生于1885年从南洋群島带回来的。1925年（孙中山逝世的那年）刮大風时树曾被吹倒，后来又把它托好。1955年树曾遭虫蛀，县农業局同志想尽許多办法才把它医好。现在它的枝叶長得比以前更茂盛更翠綠，已成为可以环抱的大树了。院子的右側保留着一列土圍墻的遗迹，圍墙下面有一口用石砌成的水井，这列土圍墙旧址原来有过一座四公尺寬、五公尺长土泥墙上盖瓦的小房子，小房子就是1866年孙中山先生誕生的地方，1892年盖建新房子（現在的故居）时把它拆掉的。孙中山先生为了紀念自己的出生地点，亲自在他誕生的地方建了这口水井。

故居共有三座相連的房子：左座是1885年建成的，中、右两座是1892年才扩建的，三間面积共147.63平方公尺，建筑形式以我国民族形式为主，

孙中山先生故居外景



1855 年孙中山手植的酸子树

只騎楼有点西洋風格。整个故居的建筑，都是孙中山先生亲自設計的。正厅的神龕上，正中悬着孙中山先生父母的画像，神龕下面是孙中山母亲的臥房，长桌子当中放着孙中山先生中年时的油画象，长桌子的两側放着孙中山先生于1885年从南洋群島带回来的煤油灯。两旁是一列整齐的酸枝椅子和茶几。最显眼的是一張發黃的放大照片挂在正厅的左边墙壁上，这張照片是1903年孙中山先生逃亡海外时全家在火奴魯魯（檀香山）合摄的。正厅的右边的墙壁上挂着一幅对孙中山先生評价的中堂，是从毛主席的著作里摘录出来的。

故居左座楼下是孙中山哥哥孙寿屏的住房，房里除陈列着大木床、三面椭圆形的鏡子和像在客厅里所排的酸枝抬椅外，右面墙壁上靠近窗口处还挂着孙寿屏的照片。他曾供中山先生讀書，革命期間，他又以淺价出售了檀香山茂宜島的牧場資助孙中山，并且自己也参加了革命。

故居右座楼下是孙中山先生的住房。在一个角落上放着孙中山先生幼年时代(1875——1878)在馮氏宗祠讀書时所用的杉木書桌。这張簡陋的桌子，說明当时孙中山先生有机会入学是頗不容易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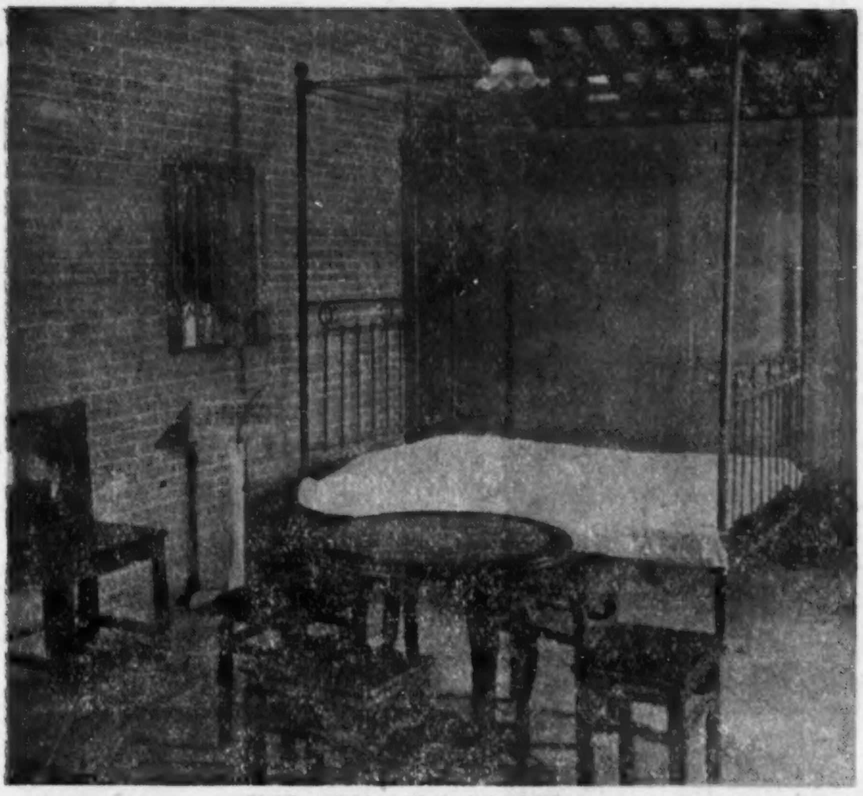
从故居右座楼的一間客房里，可以見到孙中山姐姐妙茜姑太的照片。說明員告訴我，孙中山先生幼年时因为見到纏足痛苦，曾向他母亲提过多次意見。他母亲虽然也同情自己女兒的痛苦，但恐怕不纏足就嫁不出去，終于还是沒有接受孙中山先生的意見。从这里已看到孙中山先生在小小的年紀里已孕育着反封建的思想。

故居左座楼上的一个小房子里，陈列着孙中山先生1892年在澳門行医时的診疗台、診疗椅和小鉄床等。他在澳門、广州贈医施藥，曾治好过不少病人，但后来他認識到挽救少数人脫离疾病并不能根本的解决社会問題，結果决然献身于革命事業。

出了小房子就是孙中山先生的書房。書房的两旁陈列着数張酸枝抬椅，中間是一張云石圓桌子和四張櫈子。靠后是一張大鉄床，左边墙壁上挂着孙中山先生18岁时的照片。講解員告訴我："孙中山先生1892年在澳門、石岐、广州行医时，常常回家住上三两天。他一有空就在書房里閱讀，还經常和陆皓东、楊鶴齡等（都是翠亨村人）在書房里談論革命的理論和工作。談到夜深，大家就一起睡在大鉄床上。"这个書房也可以說是一間秘密的会議室了，撫今追昔，更激發了对于孙先生仰慕之情。

步出騎楼，面对着金檳榔山，山上长滿了松树，講解員不厭煩地向我介紹："七岁至十二岁的时候，孙中山和他的第四姐姐妙茜差不多每天都上这个山打柴，家里的柴草从未有缺过。山的东面那座石砌的坟墓是孙中山革命初期的战友楊鶴齡的坟

1892 年孙中山在澳門时用的診疗台、椅子、小鉄床



故居左座楼上孙中山的書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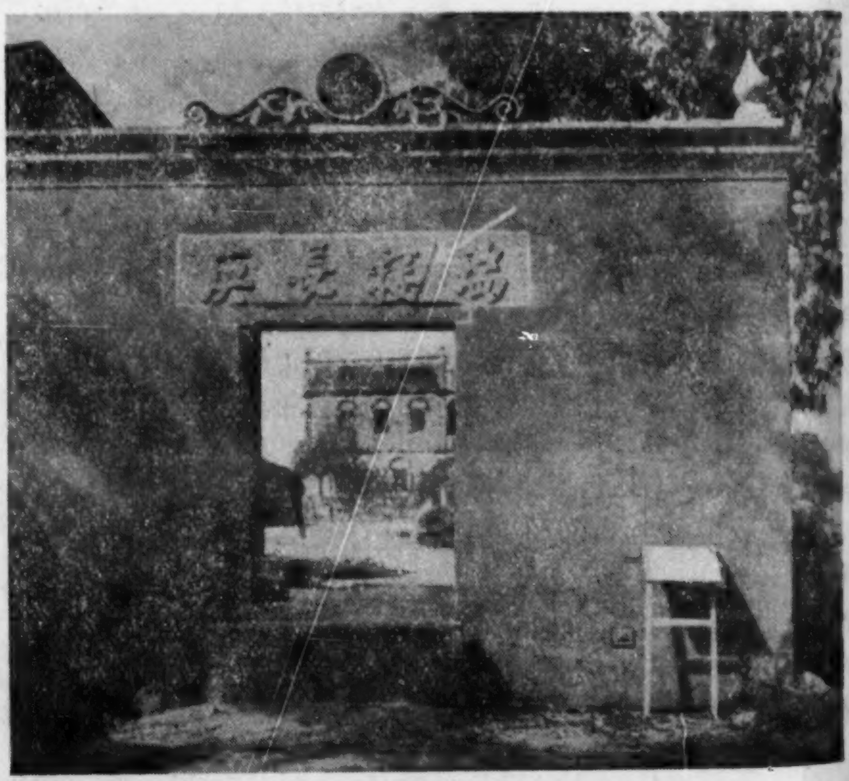
墓。山坡上有一口水井，孙中山每天必到那里挑水。山下是一条小山溪——兰溪，孙中山先生每天在田野間拾完猪叶后，就到那里捉魚、嬉水。”講解員指着一棵大榕树說：“孙中山先生很喜爱活动，經常爬到那棵树上去取鳥窠。”幼年时代的孙中山、陆皓东晚飯后常在这棵树下听老农民們講故事。最使他感动的是太平天国洪、楊革命的故事”。

虽然故居室內的陈列品不多，但却散發着家庭的生活气息，也体現着孙中山先生生活和思想。故居最大的特点是陈列品多数是原物，复制品很少，整个建筑物保存得相当完好。

从故居院子里左面的横門出来，不上一百步有一座石牌坊，上面題着“瑞接长庚”四个大字。石上有一道裂痕，据說是孙中山先生于1892年在村中試驗自己所制造的“地雷炮”（烈性炸藥）时炸开的。当时他为了掩蔽别人的耳目，特地找了一群小孩子跟着他去作試驗，試驗成功后，他感到非常高兴。現在石上的裂痕宛在，到这里参观的人，都在这个遺迹下佳佳脚，在他們的脑子里都涌現出当时孙中山先生炸石牌坊时的画圖。

过了石牌坊，向逸仙农庄办事处轉左，就見到馮氏宗祠。这个小的古祠，里面陈列着十多張长方形的讀書桌子和长条櫈，当中放着一張四方桌子和一張靠椅。这个地方是孙中山先生九岁至十二岁（1875—1878）初入学讀書时的私塾，他曾在这里渡过两年多的讀書生活，当时所讀的是“三字經”“詩經”“礼記”“左傳”等書。老师是教讀不講解的，但他經常要求老师講解，直到徹底懂得为止。听說这个祠堂在解放前村人曾当作了牛栏，解放后在村人民政府的重視下，才逐漸把它修理好，現在文化部門已把它列为遺址加入故居保管了。从馮氏宗祠向前走約两百步路，就到北極殿。殿前的一片广場，是孙中山先生幼年时代和村中兒童嬉游的地方。百年前这座庙宇香火極盛，殿內正中供着北帝，右座放着金花娘娘神象，左座放着天后聖母神象。1884年孙中山与陆皓东带領一群小孩子到此游玩，为了破除迷信，曾經打毁过神像。这一故事至今仍在村子中流傳着。現在为了保护文物，庙內的几个神象仍然保存着，古庙也經过整修保存着原来的面貌。

走过北極殿門，就是村外了。綠油油的一片稻穗，結着結結实实的谷粒。暖風吹拂着一起一伏的稻浪，使整个翠亨村更加美丽。从稻田經过小溪走上去就是犁头尖山，山上埋葬着孙中山先生两位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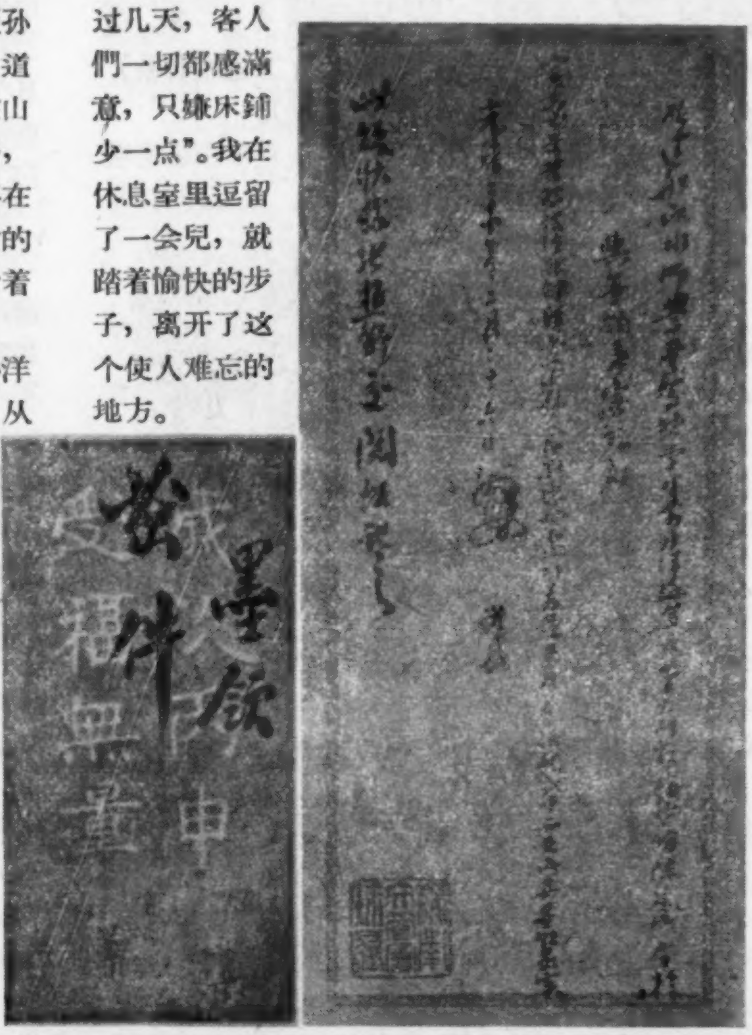


1892年孙中山在此試炸藥的石牌坊，牌坊上的裂縫（箭头所示处）

孙中山童年时代讀書的学堂馮氏宗祠

近战友——孙昌和陆皓东。孙昌是孙中山先生的侄兒，他一直追随着孙中山参加革命工作，1917年叛将龙济光授意部下在黃埔軍港中把孙中山派遣和他談判的使者——孙昌乱槍扫死。为了紀念孙昌，孙中山悲憤地在孙昌坟上題了“为国捐軀”四字。距孙昌坟不远是陆皓东的坟場。四周用石头砌了一道墻，一入墓道，就見到陆皓东烈士的石象屹立在山头上。石象下面的碑文記載着陆皓东烈士的生平，他是孙中山先生革命初期最亲密的战友，1895年在广州第一次起义时牺牲了。当我們讀到他被捕时的激昂慷慨的供詞时，我們感到極大的悲憤。面对着坟墓，更增加对这些革命先行者無限景仰。

折返翠亨村时，負責同志指着故居左側一小洋房对我說：“这座小洋房是去年政府撥款購置的。从前故居內的墻壁上挂滿了孙中山各个时期革命的圖片，为了使故居恢复原状，近年来在党和政府的領导下，把这座小洋房楼下的一部分作为紀念室，陈列圖片和实物”。紀念室內的陈列分为六个部分。在“家庭出身”那个部分里，从陈列中看到了孙中山先生誕生时的泥墻小房子、孙氏族譜、他的伯祖、祖父向祖尝借貸和租田耕种的小册子，他的父亲和他的弟弟跟瑞英祖所訂之开荒合約等。这些文物說明了孙中山先生的家庭出身和他幼年时代表現出来的可貴品質。在“兴中会、同盟会至辛亥革命”这部分陈列中可以看到1905年同盟会在日本成立的照片以及同盟会在南洋群島、檀香山、美洲各地的相繼成立，組織不断在扩大等情况。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实現三大政策时期”部分陈列中，可以見到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無私帮助下，孙中山先生思想上的巨大变化。从他于1925年北上过日本时答記者問和1925年三月十一日“致苏联遺書”等文物上，体現了中苏两国深厚的友誼，給人以深刻的印象。这部分陈列对于孙中山先生后期思想的發展，怎样以俄为师，都作了很好的說明。另外还陈列了孙中山先生90周年誕辰时，全国各刊物、报紙所發表的紀念孙中山先生的文章、紀念章、紀念邮票、孙中山选集、遺墨等。这都有力地說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領导下，孙中山才能得到应有的尊敬，90周年誕辰紀念才能在全国各地隆重举行。小洋房的楼上是招待室，負責同志告訴我：“很多人都觉得翠亨村是一个好地方，假期里来宾特别多，广州市各个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的教工和各地的干部們，他們是經常集体来翠亨村渡假期的。如广州中山医学院、中山大学的教工和我們的友邦越南人民共和国的学生等都在这里住过几天，客人們一切都感滿意，只嫌床鋪少一点”。我在休息室里逗留了一会兒，就踏着愉快的步子，离开了这个使人难忘的地方。



光緒二十四年(1898)清政府出銀二千两緝拿孙中山的密件(复制品

文物工作報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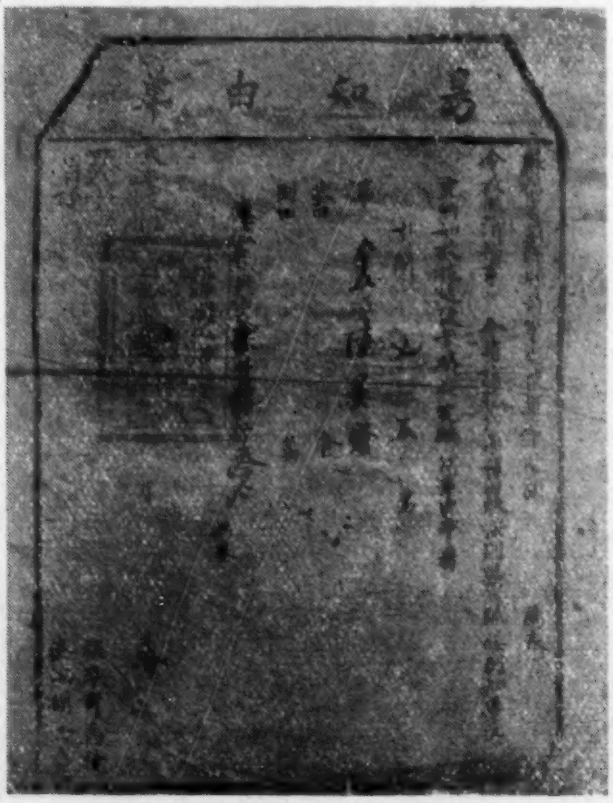
上海市

从廢品中檢出两件太平天国文物

上海市文物整理倉庫三月份从廢品中檢出两件太平天国文物。一件是在中国紡織机械厂廢鉄中發現的一尊大鉄炮，长130.3厘米，重六百四十五市斤，上面鑄有陽文“壬戌十二年十月吉日九門御林陈，正鑄炮刘造”等字样。这是公元1862年（即清同治元年），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所屬鎮守苏州的大将陈坤書（就是后来的护王）所造的。“正鑄炮”是管理鑄炮的官名，刘某名字待考。这尊鉄炮是研究太平天国历史和当时的武装力量的重要材料。它的形式和銘文格式和从前在安徽肥西县發現的一尊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清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所鑄造大銅炮大致相同。

另一件是在該市浙江路文正紙边号廢紙中檢出的一件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即清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苏福省鎮洋县（即現在江苏省太倉县）的“易知由单”（即催納田稅的通知書）。

原件高25.5、寬19.3厘米，毛太紙墨刷墨笔填写，盖有“左貳軍帅圖記”長方朱印。上端印有“易知由单”四个字，下面印有“苏福省鎮洋县前軍左貳軍軍帅張，　为奉　今啓征漕粮事，　今将該花戶承种田亩按則輸賦，接到知单迅完納，如敢抗延致干摘提究办，須至由单者計开七都五圖第本五戶陆彝斋，荃田　　耊，則田　　蕩，应征熟田漕米柒斗肆升叁合，应征自租田米　　共米。太平天国辛酉拾壹年　月　日給。县　旅卒司馬分　發沉擱必究。”（孙洼恩）



易知由单

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易知由单

河北省

李大釗同志的故居开始修复并要建立紀念館

革命先烈李大釗同志之故居在乐亭县大黑坨村，为了紀念他，我們已决定对其故居本着“恢复历史原貌”的原則进行修繕。并对李大釗同志的历史資料广泛进行征集，为建立紀念館打下基础。

省、专、县經多次到現場进行勘查了解，确定修繕內容、方法、步驟，对失存房舍的恢复，决定事先作出模型經群众鑒定后再复建。乐亭县已与有关部門組成修繕委員会及施工所，并由县抽出两名干部专門負責这項工作。十月底部分工程竣工。

省并計划于一九五八年在故居新建大釗同志紀念館，以陈列大釗同志革命活动史料。目前专署已由中央革命博物館索要全部大釗同志資料之照片达二百五十多張，該县現已搜集大釗同志生前生活用具二十多件，除此，专、县正在积極广泛征集有关史料。（边清泉）

內蒙古自治区

內蒙古自治区十年建設展覽会展出了內蒙古三百年来的革命史

在呼和浩特新城西門外，內蒙人民委員会的前面，矗立着一座宏偉壮丽的銀白色大厦，这就是新建的內蒙古博物館。內蒙古十年建設展覽会，已于今年五月在此开幕。內蒙古自治区自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成立，到現在整整十年了。由于中国共产党十年来正确的領导及全区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在各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胜利的完成了推行区域自治的历史任务。为了檢閱自治区十年来的建設成果，特举办內蒙古自治区十年建設展覽会。在博物館2900平方公尺的陈列面积里，共分全区概况、工業、农業、牧業、林業、文教衛生、第二个五年計划等七个館，一个友誼室。介紹了十年来內蒙古人民，如何擺脫落后貧穷的命运，走上了幸福自由繁荣的生活道路。从这里可以看到蘊藏量丰富的矿产，大兴安岭广闊的森林，集二、包兰两条国际綫路的修建，包鋼基地的紧張施工，富饒的草原牧場，肥沃的河套粮川及水利兴修的远景。

概况館的历史部分，展出了內蒙古三百年来的历史。

1. 三百年来蒙族人民遭受的重重压迫：展出清王朝、日本帝国主义、內外反动統治阶級、对蒙族人民进行殘酷的压迫、杀戮、剝削、奴役的实物及圖片等历史資料。有：清帝給烏珠穆沁亲王封誥，清代度支部执照，理藩院則例，垦务奏折，清代历書，康熙平准格尔的碑亭照片，王公的銀印，垦务地圖，封建統治者压迫人民的刑具，人民在帝国主义压迫下的卖身契、日本帝国主义的炼人爐及万人坑等照片，田中奏折，日本奴化教育課本，日本帝国主义掠夺內蒙古物資的統計表、当牛牌，盐碱执照等实物罪証。

2. 历史上蒙族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爭：展出內蒙历史上的革命斗爭和义和团运动有关圖片及史料。展品包括噶尔丹抗清圖，巴拉楚克的塑像，历史上起义的英雄人物陶克陶、达木丁苏倫、旺丹尼瑪等人的照片，义和团起义及嘎达梅林反軍閥斗爭的兵营故址照片，有关嘎达梅林的民歌，內蒙历史上的起义領袖傳略，有关反帝反封建斗爭的历史文献等。

3. 中国共产党領导下的蒙古人民革命运动：展出一部革命文物及圖片，介紹了1924年到1945年間中国共产党領导下的內蒙古革命的历史片段。党領导內蒙古革命的故地，北京蒙藏学校，呼市巧尔气召，中山学院、新城东門外娘娘庙、旧城财神庙包头召梁、温都尔庙及百灵庙起义地点等照片。革命領导同志和革命先烈王若飞、多松年、巴土尔罄（李裕智）、刘洪雄、郭北辰、烏力吉吉日格勒（悉尼喇嘛）等照片、都桔龙签名文件，公文袋、笔袋、馬刀、印盒、水壶、馬鞍、騎兵符号等重要文物。

还有抗日时期，伊克昭盟及大青山的革命史料，如伊盟抗日活动的照片，伊盟抗战示意圖，大青山抗日形势圖，游击队的活动，群众支援，蒙族革命烈士德力登(高鳳英)故居及賈力更烈士等的照片。此外并展出了武器自制手溜彈及独角牛手槍，民兵刀矛；工作用物馬褥、油布、刀筷、医藥仪器、鐮刀、修机械用的銼刀及鉄錘；生活用品灯盞、食物草籽、草叶、軍服、軍鞋、粮票、草票；文件笔記本、标語、布告、青年救国会章程、抗日救蒙会大綱等。并有苏蒙联軍进攻日本及內蒙区庆祝抗日胜利的照片。

另一部分展品是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在內蒙古地区的胜利，展出了自1947年到1957年間，內蒙在各方面建設的偉大成就。（張郁）

宁城县西头道营發現細石器文化遺址

在昭烏达盟老哈河流域上游，宁城县西70公里黑里河的北岸，头道营乡北約3公里，三家松树梁村，發現細石器文化遺址一处。遺址是在村西一个圓形的小土山上，山头的平面像一个甲魚壳，老乡叫它做"王八盖"。山高約15米，山頂地面中間略凸，面积南北60米，东西85米，均成耕地。在遺址东南一带断面上，有十多处灰坑外露，文化層約在0.8至1.8米上下。遺址中拣得石杵，长13厘米，較大的一端，直徑6厘米，形状粗短，好像蘑菇。磨光石斧，石刀及打制石鏃，有孔的石刀及殘石片等十多件。陶片有灰色泥質夹沙繩紋陶，或在增加堆紋上再加划戳的长或圓的連点紋。器形多陶鬲的口緣或鬲足及平底罐。另一种为細泥質紅陶片，多半是在表面上加以磨光，很少紋飾，以敞口器为多。这些陶器殘片，多半与完整或殘缺的石器混杂在耕土中。

在遺址的南面，有一条相隔約4百余米的山沟，在沟南面的前梁上，老乡曾挖掘出一个乱石垒砌的石丘；出土物有銅鼎一个，重5公斤，高20.6、口徑28厘米；蹄足高12厘米；直耳、耳厚2厘米；口复周圍有云雷紋。同时出土有衣甲銅片，衣飾銅扣，圓形衣甲銅牌；三棱銅鏃，棱角尖銳，模制粗糙，它的体积形态，与我們在內蒙区一般常見的銅鏃不同，像这样的古代石丘，在內蒙区常有發見，它的时代可能相当于匈奴早期文化。

石丘附近的地面上，散布着一些泥質夹沙紅陶片，多無紋飾，可能是与王八盖細石器遺址比較晚出的文化遺存。（張郁）

甘肃省

武山洛門鎮的古代石窟

由甘肃省天水专区所屬武山县东行三十里可抵洛門鎮，再涉渭河北行十五里至响河口，往西再至小沟，沟口之断崖处即为有名的花果山，山景秀丽优美，是一名胜地区，巅上旧有庙宇規模很大，于一九五三年被拆除修建学校。再北行三、四里之西崖，上称显聖寺，山崖向东傾斜形成自然的窩形，下有道路可通行，其上有古代壁画及塑像，并似有題記多处，距地面約有三十余米高；壁画之上面有石洞，洞檐已部分坍下，周圍有桩眼多处，以其位居山崖中間，旧有棧道敗坏，故多年無人进入，情况不能确知。

由显聖寺再往北行五、六里之西山下即为水帘洞，傳为古代佛教聖地之一，后道教傳布至此遂居其地，据說原来所存文物十分丰富，后来被火焚燒，現存塑像（佛道教皆有）疑皆为清代物；庙內有清代順治年間的重修水帘洞碑記一塊，尙完整，碑上記述此地为大势至菩薩成道之处。旁有一深

洞，据老道說其內有佛像，即为大势至菩薩的塑像，因洞深且又較暗，故未进入。在水帘洞的东北一角，保存有古代的佛教故事壁画，且为几層相重叠。水帘洞斜对过之石崖即大佛崖，上有石雕佛像三尊，高約十三、四米，約为唐代制作。大佛之上亦有多处木桩，上鋪有木板，但木板多半損坏朽脫。再往上距地面約四、五十米高处，亦有石雕佛像很多（或为石胎泥塑），并有壁画多幅，顏色頗鮮艳。大佛之下距地面約二十米处又有泥塑观音金剛等像很多，其下并列有石雕獅子十余个，形象均極优美。周圍亦有壁画多幅。大佛之北的石崖上亦有塑像及壁画六、七層，虽然損坏的很多，但被保存下来的还是不少。大佛的附近石崖上散存有很多木桩及木桩眼，并有石洞四、五个，其內有無佛像及壁画，尙不得而知。石崖上有石雕佛塔三、四个，頗完整。由此向西約半里許，即为千佛洞古迹的所在，石洞为紅粗砂石質。洞之西壁有泥塑佛像及塑画，壁画亦有为多層相重叠。洞前有一曠場，疑为过去修建庙宇的場所。

由以上的情况看，該地的文物古迹相当多，惟因僻处深山，故知者較少。这些都是祖国的珍貴文化遺产，深望地方有关部門能詳細調查了解，列入应加保护的单位。（巨頭石述，乔今同記）

山东省

山东省博物館举办古画展覽

山东省博物館在本館专題陈列室举行首次古画展覽。展出时間为一个月，十月八日已正式开放，这次展覽的目的有三：

一、配合当前反右派斗爭，以党重視古代文化遺产和文物保护工作的实事有力粉碎右派份子的“不重視保护祖国历史文化遺产”的無耻謊言。

二、發揚我国古代繪画优秀傳統。适应广大美术工作者要求，提供科学研究和学習資料，积極發揮博物館藏品的作用。

三、对广大群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进一步促进人民群众对祖国历史文化遺产的重視和保护。

展覽的內容大都是元、明、清著名画家的作品。如明董其昌題元高克恭的山水。明夏昶的“瀟湘烟雨圖”、周臣的書画、謝时臣的“旅獒圖”、陆治的“秋花圖”、李士达的“江天楼閣”。清初“金陵八家”龔賢、樊圻的山水、“楊州八怪”郑板桥的“墨竹”、“双松”、高鳳翰左手繪的“古木寒鴉圖”。罗聘的“說文統系圖”还有清代王石谷的“天香書屋”、禹之鼎的“王士禎幽篁坐嘯圖”，朱珏的“泰岱大夫松”。著名花鳥画家許仪的“百蝶圖”、边寿民的“蘆雁”以及明人仿宋、元名家的精湛作品等。此外，还有“曲阜孔氏画像专室”和明人画邢玠、黃培肖像等。

（杜显）

江苏省

太湖湖底發現大批石器等遺物

南京博物院太湖地区調查小組于本年5月，前后經过了二次的調查，調查有几十处古代遺址，其中以新石器时代遺址和与新石器时代有关的遺址为最多。这次調查，由于地方人士的反映，我們訪問了停泊在吳县光福附近的震澤县湖中漁業生产合作社的漁船。据該社社长說，他們历年来每逢立秋到立冬是在太湖的衡山、漫山直到五子山等一带打漁，在湖底撈上很多石器，这些地方也就是出石器的地区，它的周圍有200里长，直徑有60里，最深的地方約有1丈6尺。在發現有石器的地方，湖底的泥不是和其他地方一样的潮湿，而是比較坚硬的（漁民們称呼为銅板硬底），这些起伏不平的湖底就如同陆地上的小丘陵一样。

調查中所采集到的标本約有百件，大旣可分为石器、陶器、骨器等类。石器有：石斧、穿孔石斧、石錛、有段石錛、石鑿、穿孔石刀等，其中以有段石錛和石斧为最多；陶器有粗沙灰陶鬲；还有鹿角、兽牙等。

为什么会在太湖湖底發現石器等类遺物？我們初步推測有几种可能：

1. 由于自然界地層的变迁，使古代遺址下沉。

2. 沿太湖周圍有很多的高山地带，这些高山上一部分有可能是古代文化遺址，它們的遺物經过几千年来的雨水冲刷沉到湖底。

3. 太湖在很早以前就和淮河、黃河一样的时常泛濫，淹沒了很多平原、丘陵，因此，也有可能將附近一些丘陵上的文化遺物冲洗到太湖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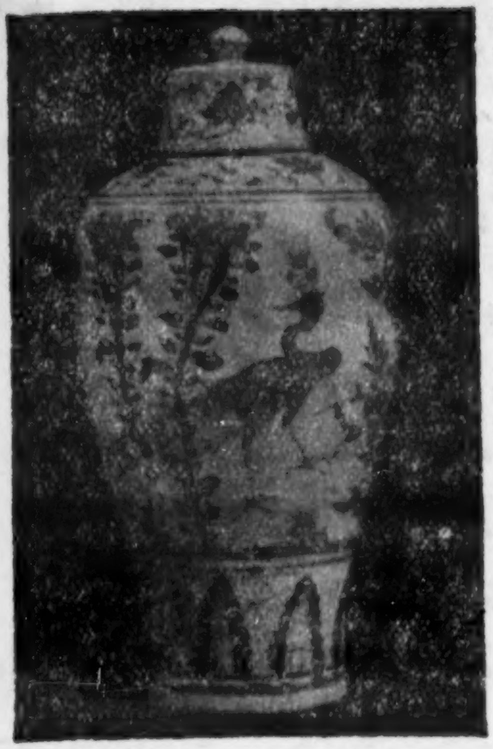
但实际情况，有待深入調查。（柴旺順）

介紹南京博物院举办新收文物展覽会中几件珍貴古瓷

（一）江宁县岔路口六朝早期墓出土青釉堆塑人物楼台瓷罐（缺蓋）：肩以上有重楼双闕，四角檐牙各托“承露盘”一只，屋下环立人像，屋面瑞鳥翔集，飞、鳴、食、宿，生态畢具。器腹压印柿蒂紋与人物圖像。淡茶綠色釉，明潤匀淨。造型优美，从这件文物上，可以看出六朝时期精致、熟練、簡潔、明快、清新、爽朗的塑造艺术風格。

（二）明祭紅碗：白灯草口，鼈口飞边，足有“窑紅”，通体深紅，鮮艳明淨，宝光四溢，即所謂宝石紅是也。本件似应为淺豆青色釉底，开細白片

紋，即通称苹果底是。



宣德民窑青花牡丹孔雀圖梅瓶
（底徑 11.3、通高 40、口徑 5.5 厘米）

（三）南京太平門外鎖金村明初墓葬出土宣德民窑青花牡丹孔雀有蓋梅瓶：浅砂底、磨光，釉汁瑩厚，隐隐現細橘皮紋。青花幽倩，画笔渾朴雄劲，繪連理牡丹一株，鷄冠子二，花叶柔茂，孔雀两只，其一閑步徘徊，徜徉花間，另一只展翅翺翔，盘旋迴舞。

（四）江宁县东善桥响龙山下明駙馬都尉宋琥墓女室（永乐帝女安成公主，正統八年逝世）出土釉里紅三友圖梅瓶：有蓋，釉質細膩滑潤，白如凝脂，有磨光浅砂底，釉里紅窑变墨色，以松、竹、梅三友圖为主題，夾以芭蕉，构圖严正，笔意洒脫自如。

（五）江宁县牛首山弘覚寺塔“龙宫”內發現之明青花瓷蓋罐：釉白肥潤，器身起棱，横截面好像菱花鏡式样，原有五件，两件繪纏枝牡丹者尤佳，浅足砂底，制作及青料色澤与永宣青花瓷絕相类似。据盛时泰牛首山志“正統年間敕賜弘覚禪寺”的記載和这批青花罐伴出的鎏金銅塔銘文“金陵牛首山弘覚禪寺永充供养”、“佛弟子御用监太監李福善奉施”，并青花瓷本身所具之时代特征对照，它們应屬于宣德以后成化以前这一阶段的青花瓷器。（王志敏）

浙江省

紹兴市成立徐錫麟紀念室和秋瑾紀念館

今年是辛亥革命烈士徐錫麟、秋瑾等逝世五十周年紀念。烈士故乡紹兴市人民积極进行各种活动，以紀念。

紹兴市特在現紹兴第一中学分部，即原大通学堂旧址。設立“徐錫麟紀念室”。該学堂为徐烈士手創，用以培养革命志士。現在紀念室中陈列着許多紀念品。其中有徐錫麟烈士及同时被害的馬宗汉、陈伯平三烈士的照片，还有蔡元培撰文的徐烈士紀念碑四方，章太炎題“山陰徐君頌”等。特别珍貴的是徐烈士謀刺恩銘时所用手槍一支和烈士遇难时所穿血衣（仅存半件）。另外还有烈士遇难后被抄出的光复会告示一紙，这些宝貴的文物原为王睨甫等先生所珍藏，后来献給国家保存的。

秋瑾即有名的“鑒湖女俠”，因和徐麟錫共事革命而遇害。秋女俠故居“和暢堂”現已改为“秋瑾烈士紀念館”。紀念館現有三室。第一室依照烈士生平年月順序，陈列了各种照片、实物、文稿等。其中有烈士叔祖秋日覲、父秋寿南、兄秋来子等的画象，有秋烈士生前所作詩稿及烈士离乡赴日时所作律詩。陈列的实物中尙有烈士的玳瑁鐲一付，日本圍巾一条，还有烈士在日本时用来刻印革命傳单的腊紙一刀，各种信札手稿多件。第二室陈列着烈士死后有关的各种紀念資料，其中有魯迅、夏衍等为紀念烈士而著的文章，有兄秋来子作的紀念长歌原稿，有画家李鸿梁先生所作秋女俠的画象和塑象。第三室为烈士生前臥室，有床鋪（原物）、桌子（原物）等，桌上放女俠的私章，墙上挂有各种屏条。据說：秋女俠常在这間臥室里与徐錫麟等共商大計；这屋子通側楼，就是昔日匿藏槍支和秘密文件的地方。

紹兴市还在秋烈士逝世后建造“秋瑾烈士紀念碑”和“風雨亭”。碑座落在軒亭口烈士从容就义的地方；“風雨亭”在著名的臥龙山上。解放后都經过重新修整。（秋鑒）

金华王淮墓

“光緒金华县志”卷十五“金石”中謂：

“故少师左丞相魯国公王淮神道碑：紹兴元年（作者按：紹兴似为紹熙之誤，盖紹兴元年淮未死且未做官）楊万里撰，楼鑰書，陆游題。盖在县二十九都覚报寺。按：石佚文存。”实际上王淮神道碑的“石”并未佚，一九五四年秋，因农民掘用王淮墓中磚石，为金华二中历史教师所知，探訪后报告专署文教科，現已得到妥善存护。

王淮是金华人，生于公元一一二六（宋徽宗宣和八年），死于公元一一八九年（宋淳熙十六年）。他在紹兴十五年（一一四五年）中了进士。据宋史王淮傳載：王淮曾在浙江、福建、江西等地做过官，后来当御史，最后升为左丞相，并封魯国公。在他做了左丞相后，曾提拔有才学的人，如爱国詩人陆游、哲学家陆九渊等做官。“金华县志”“政事”中一則称“凡在樞廷七載，选拔中外諸臣，悉称其职。四方所陈軍务，应之均中事机。孝宗深嘉之。”一則謂：“初上問当世人物，淮举京鏜、謝深甫……呂

祖謙……洪迈……陆游……陆九渊……上皆用之，以故淳熙人物之盛，古今罕有倫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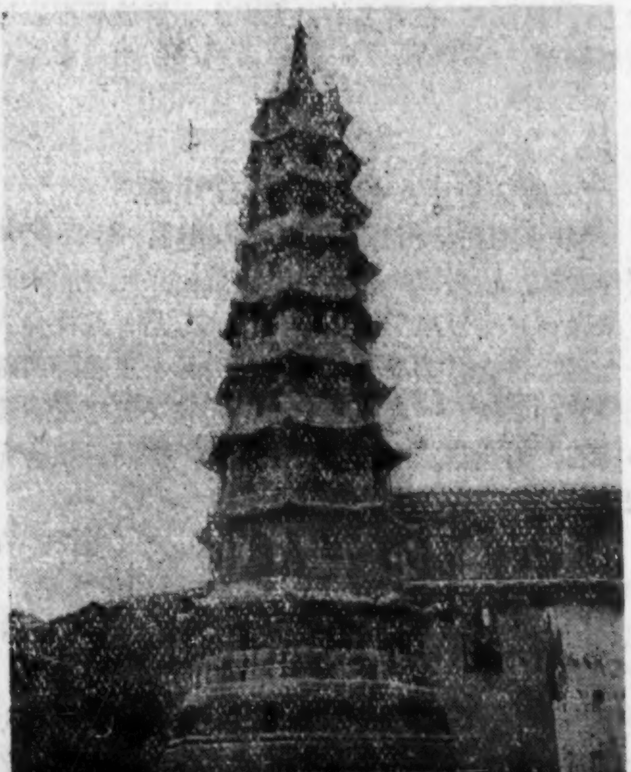
从县志記載及現在墓址看，王淮的墓原来可能很壮丽，周圍是一些小山。紧紧地拱衛着，很有气魄，但因經历了几百年，無人保护，現在是很荒凉的，墓磚已被人拆取，四周没有树木，墓旁的覺报寺也毫無痕迹，但那个神道碑却完整無缺，可謂“碩果仅存”。碑高三・九米、寬一・八二米、厚〇・三一米。除当时有名学者楊万里作的文和大学者兼書法家楼鑰写的字外，正額有陆游所書：“宋左丞相魯国公神道之碑”十一个大字。碑上端雕有两个作下扑状老虎，碑座为二米长的贔屭。墓周用磚砌成，依山而筑成梯形。墓前有长方形祭壇，长一五・八米，上面今尙有八个石础。尙有长二・二米的翁仲四个，倒臥在神道碑前乱草中。碑后田間有石馬二匹倒臥着，长二・一米，雕刻生动，而且大部完整。另有石獅子一头在田埂上，已残缺不全。

王淮墓虽然已很荒凉残破，但从神道碑、残存的文物看，無疑的还是有研究价值，現在政府下令保护是完全正确的。　　　（張永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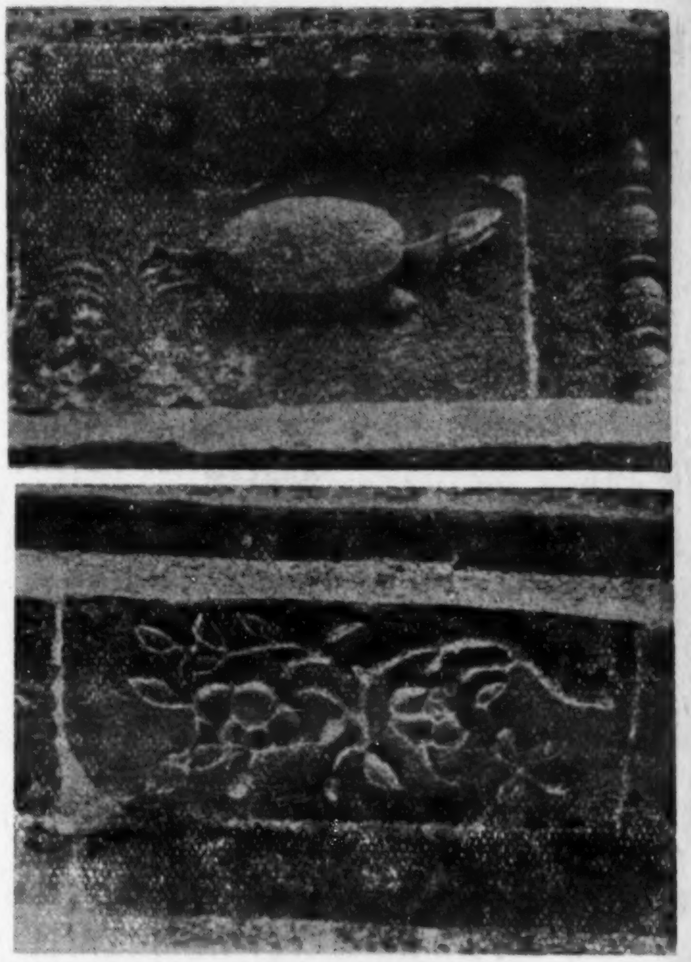
福建省

古田县的古代建筑“吉祥塔”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中旬，福建省文管会干部二人赴福建古田县进行全县文物普查工作在古田县城內三保后街發現了吉祥石塔，据当地群众反映：1935年此塔因塔身崩裂由圓瑛法师按原狀重建。把塔心河卵石換用水泥填塞。拆建过程中还發現有开元通宝銅錢一枚和瓷器佛像等。現在塔的結构已稳固。



吉　祥　塔



吉祥石塔上的雕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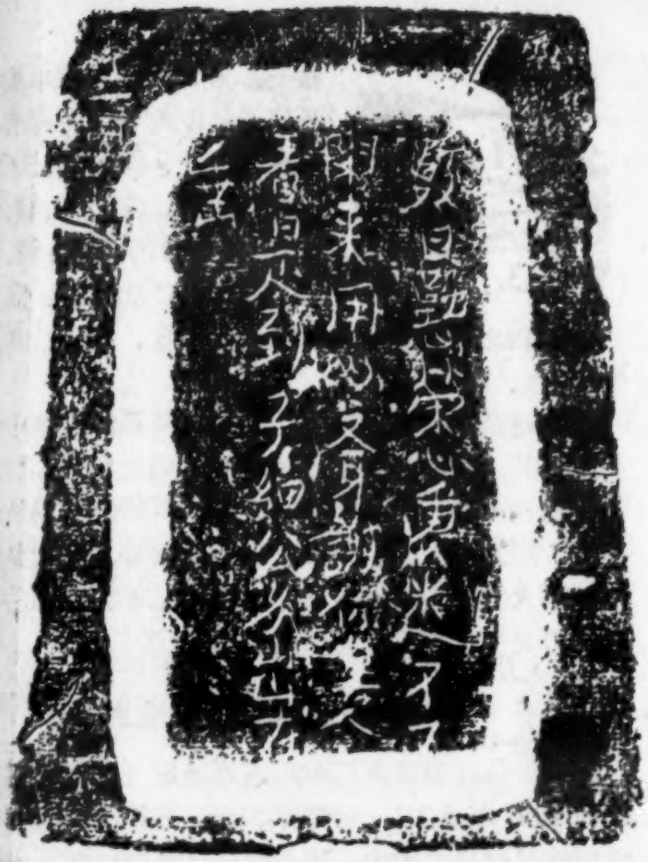
古祥塔原是吉祥寺的附屬物，据志載：宋太平兴国四年間建寺，明成化間住持重修。塔的四周除了工人俱乐部以外，其它全是民房。塔为八角九層实心石塔。高約25米，平面寬7.7米，往上逐層縮小。基座上八面中七面浮雕有：龙、馬、龟、鶴、獅、羊等花紋，其中只西向一面的一塊石板没有雕刻。在第一層八角，浮雕有八尊武神。第二層至第九層的每層八面設龕龕內置一尊約0.20米坐佛。龕外面两旁有人物和花紋雕刻。

塔頂放置着一个石刹，刹尖有几条鉄煉和檐角相連，并悬挂着几个鉄鐸。从造型来看，深厚古朴，是一座很有艺术价值的宋塔。（林登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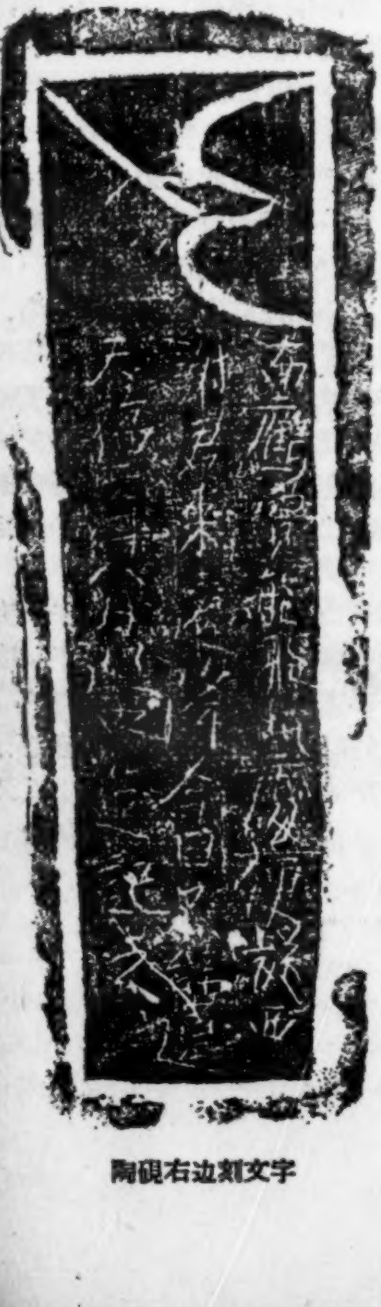
河南省

洛陽清理后晋墓一座

洛陽城西北郊、隴海鉄路北邙山坡上，一九五六年九月配合基本建設，淸理后晋墓一座，墓座北向南，偏东十度，墓上部因施工起土下挖約25厘米，墓口地層堆积無法知道。



陶硯底部刻文字



陶硯右边刻文字

該墓为土洞横室墓。墓室长 2.45 米，寬 1.30米，墓室中放木棺一具（已朽成灰），下鋪極薄青灰一層，骨架头西足东，仰身伸肢，头部巳朽。随葬器物大部放在头部。陶罐一件，斂口，外卷唇，橢圓腹，小平底，灰色，器面塗有白粉，通高14厘米。陶硯台一件，平面呈梯形，长12厘米，台面下凹深 2 厘米。瓷碗一件，侈口，半圓唇，內外皆白釉，壁根內凹，圈足，口徑 11 厘米，高 3.5厘米，足徑 4 厘米。

銅絲二根已殘。

开元錢二枚。

鉄塊一，已殘。

該墓所出土之随葬物，大部为宋墓中常見，陶硯上下边均刻有花紋。左边比較簡单，刻有如回字形紋飾。底部和右边有刻字，有“天福二年八月营造証之”等字。（高祥發）

一塊値得保护的碑文

河南省在文物普查中，在焦作市东墙北村古庙炎帝宮院中發現一塊“炎帝宮記”碑，是明万历三十二年刻，原碑并沒有特殊价値，値得注意的是碑文正面两边空隙处刻有两行小字，是清朝初年补刻的，記載着很重要的历史材料。

原文：

“崇禎五年，流寇九月廿四日破城，六年十二月过河南，十一年至十四年，秋麦被蝗蝻吃尽十五年春蝗又出，幸土蜂咬死，且連年土寇作乱，焚杀劫掠，人逃河南，迴者十死一二。

崇禎十三年閏正月旱，至立秋下雨。八月廿三霜死田禾“冬至”十四年，米麦一千五百一斗，麥草豆、大麦一千一百一斗，糠□、蒺□、蓬科、莉子、□、西瓜、苗典一百五十文一斗，蕎麦种三千三百一斗，綠豆二千文一斗，人吃树叶皮草、栋子等物不足，冬夏之間死亡七分，互相剮吃，白骨遍野，甚至父子兄弟夫妻□母活□□食，事情罕有，异出人姓，以其述如义大略以与世变云”。

碑幢

这段不足二一〇字的碑文，叙述明末崇禎皇

帝在位时的社会情况，是非常珍貴的历史資料，希望当地文化部門認眞保护，以免破坏。

（周到　李德宝）

湖北省

鄖西县發現古文化遺址

湖北省文化局和舞陽专署联合組織的“丹江口水庫文物調查工作队”，四月間，在鄖西县的枣园、火麦沟、广家灣、張家坪等处發現古文化遺址，这些遺址均位于古老的汉江两岸。前三处范圍較小，遺存不多，后一处地面陶片散布和断面文化層堆积，南北長約70米，东西寬約40米。暴露遺物有磨光石硛、繩文陶鬲足、圓錐形和圓柱形鼎足等；此外，还有很多細泥素面紅陶片和少數灰陶片等。可能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居住遺址。（丁安民）

湖南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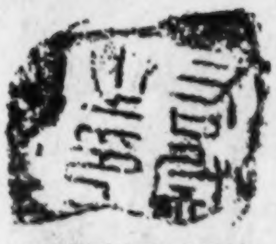
湖南省博物館到少数民族地区征集文物

湖南省博物館在今年二月到四月間，派出干部至省境西、南边远的少數民族地区征集到文物近二百件。其中有鳳凰县公安局清理档案發現的太平天国欽差大臣冬官正丞相張，在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發給貴州陈步高等的貢照及太平天国殿左拾伍指揮曾的安民告示；在江华县李森烈士家征集的“国际工人代表团招待处秘書工作大概經过”原稿，是第一次国內革命战爭时期的文件，用墨汁鋼笔写，記載有招待处职員姓名，国际工人代表团在广州活动的日程及內容，招待处收到文件的統計数字及經費开支数目等。此外，还有辛亥革命时期湖南起义軍的照片、古老的家譜等。（傅靖武）

长沙市岳北乡銀盆岭出土了大批文物

湖南文管会文物清理工作队于去年八月二十二日起至今年三月廿六日止，在长沙市河西岳北乡銀盆岭裕湘紗厂和內衣厂两基建工地，清理了古墓葬一百三十六座，其中战国墓二十五座，西汉墓一〇八座，唐宋墓三座。出土文物一千五百零六件，有玉器七件，鉄器十件、銅器四十件、石器二件、陶器一千四百四十七件。

出土的玉器有：璧、瑗劍珌、劍首、章子等。鉄器有：刀、剪刀、鉄口鋤、鉄碼子、鉄塊等。銅器有：劍、戈、矛、鐏、鏡、法碼、带勾、鋏子、洗、釜、鼎、私章、銅鳥等。石制器有：鏡、璧等。陶器有：灶、釜、甑、水缸、杯、盘、鼎、敦、盒、壶、鐎壶、泥錢等。


“右尉之印”封泥

在这些出土的文物中，有好多是长沙汉墓中很少出土的。如西汉墓中出土的篆体陽文“右尉之印”的封泥在长沙还是第一次出現。还有些紋飾精致的銅鏡、銅鳥、玉印、銅章、彩繪陶器等。特别是西汉墓的大批發現，給我省今后进行整理和研究岳麓区的历史文物提供了可貴的資料。（罗　張）

江西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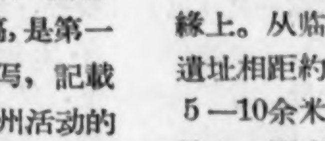
清江临江鎮附近發現古遺址

我于临江鎮磚瓦厂發現古遺址后（簡訊見考古通訊1957年4期），曾繼續調查，在临江鎮南的袁水西岸又發現罗家山、双头山、艾家山、对洲山等古遺址四处。采集陶片三百二十余片，石器十一件。于对洲山南的靠河山，采集陶片二百三十余片，陶网墜二十五个，石器二件。

这五处遺址，均在临江鎮以南沿袁水的西面边緣上。从临江鎮沿袁水南行約8里为罗家山，五处遺址相距約10—300米，距袁水約30—80米，高約5—10余米，几乎成一綫似地排列于袁水岸侧的山坡上。因农耕或雨水侵蝕，遺物露于土面。

采集到的陶片，分細泥紅陶、夹沙粗灰陶、泥質灰陶、青灰硬陶等类，紋飾有繩紋、格紋、籃紋、弦紋、波紋、回字格紋等种，其中还有殘豆柄和扁平式、錐式器脚。陶网墜带圓形，有横直相对凹槽各二道。采集到的石器有鏃、矛、刀、硛、斧和礪石等。值得注意的是，二十五个陶网墜出土于一处，跟散見者不同。

五处遺址的面积均不大，遺物多散見于山头或山脚，但其分布的密集情况，与赣江东岸平原边緣的遺址相同。灰層多遭流失或扰乱，就拾得的陶片来看，是早晚不同的时期遺存。早的可能是新石器时代末期或殷周时期的遺物，晚的可能屬于西汉时期。（張林生）



讀者·作者·編者

应該对刊物和讀者負責

“文参”今年八、九两期相繼登載了何其耀、管勁丞对“文参”七期李鑒昭先生所报导的“江陽县發現古銅制月湖琴盒”消息的糾正，特别是管勁丞先生的文章中，把“月湖”之名的来由作了詳細的考証，香盒的用途也作了一番介紹，“文参”編者为此并向讀者表示致歉，这有力說明了編者、讀者之間的負責精神，使人感到高兴。

乍一看来，李先生报导消息中的失眞，仅是誤把“制”字釋为“琴”字，因此造成錯誤的。可是，問題不单单在此，早在去年夏，“琴盒”出土后，李先生写好在文参七期發表的那篇稿子，打算向外报导，江苏省文管会曾有人告訴他，那不是“琴盒”是香盒，領导上审查了他的稿子以后，沒有同意他向外报导。但其后，改变了审稿制度，凡以个人名义向外發表的稿子由自己負責，不再审稿，李先生就翻出这篇原稿，未作修正，送文参發表了。李先生这种自以为是，不懂装懂，故弄玄虛，譁众取寵的作風，对讀者、对考古研究不負責的态度不是一次了。从李先生在过去“文参”与“考古通訊”上所發表的一些文章看，就可以找到証明。

“江苏睢宁九女墩汉墓清理簡报”一文（見“考古通訊”一九五五年二期）的失实，据和李先生一起清理該墓的李蔚然同志揭發（見“考古通訊”去年二期：“考古工作者应有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風”）：“該文作者为了附会‘九門，的說法，将原始圖表修改（实际上該墓并無九門），造成了文字記录的石柱数与平面圖上的石柱数互不吻合。作者为了夸大該墓的規模，仅根据該墓沒有棺座和發現了两根鉄釘（棺釘）一只六棱圈，便說成是悬棺和悬棺之物，这种說法实在是牵强附会的。为了說明墓主的奢侈，作者甚至把該墓的塡墓用土都說成从远处运来的，把塡墓用的混合土（碎石屑石灰等混合而成的土）也說是‘黃胶土’，把原来有黃胶土的地方，也說是‘附近乃黃沙土’，这除了說明墓主不是一般庶民外，其次只能說明作者已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淖之中了”。

“从文献資料上看汉六朝墓中發現的錢幣出土的織物遺迹应为錢囊”一文中（“文参”去年第四期），在李蔚然同志“試述汉、六朝墓中發現的錢貫”（“考古通訊”今年第四期）一文內，也同有批判李先生說法的：“墓葬中錢幣上附有絲織物的痕迹，并不一定是錢囊的遺迹，而說它为衣物的遺痕比較可靠。李鑒昭先生在写文章时，并沒有从器物的出土情况和观察彼此之間的共同关系这一現象出發，而是把自己的看法限制在一个狭小的圈子里，忽略了錢幣上附有絲織物的眞正原因”。

李先生在闡述汉至六朝墓中發現的青石板用途时（“文参”一九五五年七期：南京市南郊清理了一座西晋墓葬），为了說成这青石板是画眉用物，硬是無中生有的說石板上有黛的遺痕存在。可是在他所介紹該墓出土的青石板上，并無点滴黛的痕迹可見。当他的这一篇报导發表后，旅大博物館曾致函江苏省文管会請代为拍摄有黛痕的青石板的照片，江苏省文管会对此很为难，只好据实答复旅大博物館。

以上几例，我們不难看出，李先生在对文物研究工作上所持有的态度与观点是什么？李先生說过：“有些东西，只要写出来，登出来就行，人家提就提，不必要答复，各人有各人的見解。”

在發表的文章中，甚至一个很短的文物报导消息，是应当根据自己的見解，提出自己的看法。但这見解与看法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要客观的来分析，若为了达到自己主观的見解与看法，甚至不惜影响材料的眞实性，或者故意歪曲，抹煞事实，这都是做一个考古工作者不能容忍的工作作風。我們应該对刊物和讀者負責，願李先生切实改正。

田　心

作者来信

文物参考資料編輯部：

本年第七期文参發表我的“江陰县月城桥發現古銅制月湖琴盒”报导，因疏忽将“制”字的篆文，誤認为琴字，鑄成大錯，以致有劳各地先生及同志們提出指摘正謬，深致歉意！这一字之訛，应由我負責，而由編者向讀者道歉，更感慚愧！

我淺陋無識，写此小文，本来就覺得这物品嫌小，不能容琴的，但又想天下之大，所見者少，容或有之，故而大胆了（原意是打算姑且提出的）。現承明眼人指出釐正，万分感激！以后写文，当主观努力，矜慎处之。专此，致敬礼，并盼賜予披露，作为笔者向讀者更正与道歉。

李鑒昭

考古通訊

“考古通訊”由1955年創刊以来，迄今已經三年了，在这三年中由于党正确的領导和各地考古工作者的大力協助，“考古通訊”取得了一定的成績。自从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爭鳴”这一保証学术的繁荣和發展的方針以来，考古界的学术爭論空气也在逐漸濃厚起来，本刊今年一年中發表的論文和討論文章就比1956年約增加一倍，这充分說明了执行“百花齐放、百家爭鳴”的直接效果。

为了把考古学研究工作和田野發掘工作更向前推进一步，“考古通訊”从1958年起决定改为月刊，这样不但可以进一步滿足各地考古工作者及爱好考古学的讀者的需要，同时也可以更快更多地报导各地調査、發掘的情况和材料，使学术討論可以更广泛地展开。

“考古通訊”准备明年作如下几方面的改进：

一、尽量地和及时地發表科学而新穎的考古学材料；

二、广泛展开我国考古学上的一些重要的、关鍵性的問題的討論；

三、大量地和及时地評价有益的和新出版的考古書籍；

四、創造条件，在可能范圍內全面地反映全国考古工作情况；

五、尽力介紹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的先进的考古学經驗；同时，也介紹一定数量的資本主义国家的考古学情况等等。

目前邮局正在預訂1958年报刊，希望讀者及时預訂。“考古通訊”每期0.48元；半年2.88元；全年5.76元。

考古通訊編輯委員会編輯
科学出版社出版

文物参考資料

（月　刊）

第十一期　（总87号）

1957年11月27日

編輯者　文物参考資料編輯委員会
北京东四头条4号
电話4局1440

出版者　文物出版社
北京东四头条4号

总發行处　邮电部北京邮局

預訂处　全国各地邮局

代售处　各地新华書店

定价每册0.50元

預定价目

三个月三期	1.50元
半年六期	3.00元
全年十二期	6.00元

平邮在內挂号費另加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本刊第十期实际出版日期10月27日　邮局送出日期10月28日　印数8,000　本刊代号2—27

北京市邮局新聞稿件另寄整付許可証第22号